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译 丛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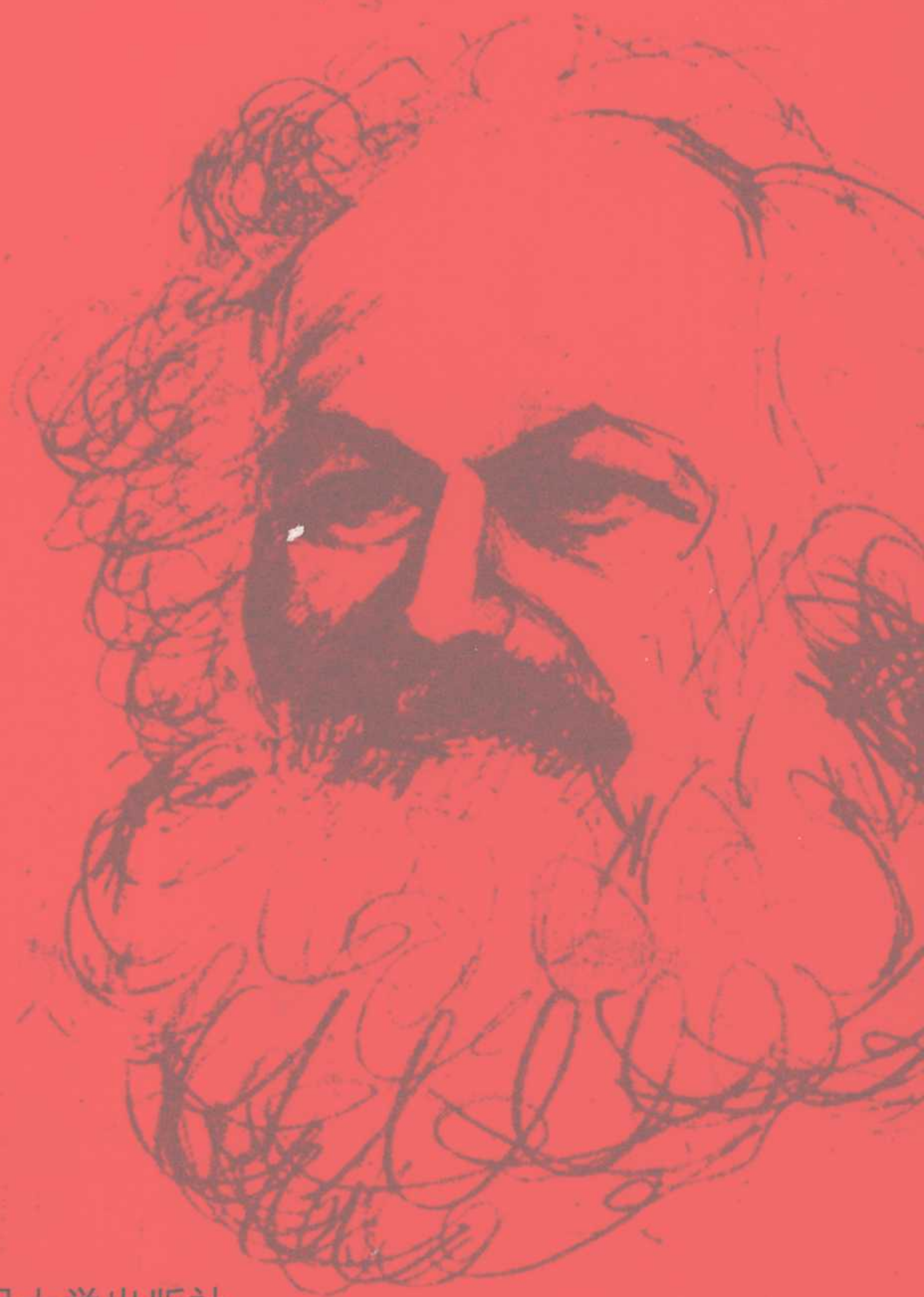
THOUGHTS OF
KARL MARX

马克思思想导论

(第3版)

[英]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著

郑一明 陈喜贵◎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3-2865号

马克思的思想革新了世界的政治图景。戴维·麦克莱伦的这部著作全面介绍了马克思，并为掌握马克思思想的脉络和复杂性提供了基本条件。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THOUGHTS OF
KARL MARX**

查询图书信息，下载教学资源：
<http://www.crup.com.cn/gggl>

ISBN 978-7-300-09219-5/B · 546

ISBN 978-7-300-09219-5



9 787300 092195 >

定价：3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思想导论 (第3版) / [英] 麦克莱伦著; 郑一明, 陈喜贵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978-7-300-09219-5

- I. 马…
- II. ①麦…②郑…③陈…
- III. 马克思主义-研究
-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0373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马克思思想导论 (第3版)

[英] 戴维·麦克莱伦 (David McLellan) 著
郑一明 陈喜贵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30 mm 1/16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16.5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2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编委会

顾 问 徐崇温 李景源 叶汝贤 陈学明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郑一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治河 刘元琪 李惠斌 杨金海 余文烈

陈振明 陆 俊 欧阳英 曹荣湘 鲁克俭



总序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

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

^① [美] 安·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献给我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学生

第一版序言



已有几本书被策划出来作为马克思思想的导论。选集并不能独立担当此任，因为须将它们置于一个语境中，并且连续阅读收益并不大。另一方面，大多数评论对马克思的著作援引得又太少，并将其思想看作一个静态体系，很少顾及其中的变化发展。偶有引用，对马克思知之不多的读者，就无法知道引文的出处和写作背景。故此，本书的前半部分，以编年顺序平实地叙述马克思的著作，并偶或提及某些传记方面的细节，后半部分概述马克思思想的某些核心主题，并列与各章所涉及著作相关的引文，旨在为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在编纂引文的过程中，我对现行译文做了必要的修正，而对尚无译文的部分则直接译出。因为有太多的引文只是简单挪用了莫斯科版《选集》(*Selected Works*)中的材料，所以我尽可能将那些不太著名且尚未译出的段落涵盖进来，如《法兰西内战》(*Civil War in France*)的手稿或马克思对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Statism and Anarchy*)的评论。由于本书只是一个导论，所以必然是肤浅的，所以我附上详细的参考书目。当然，仅限于英文著作。

戴维·麦克莱伦

肯特郡奇勒姆市利特尔科拉夫特

1971年1月

第二版序言



本版充实了第一版的内容。除对全书做了修订之外，我还新增了关于辩证法的一章，扩充了关于《资本论》的那一章，以便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提供一个简单的导论。鉴于近年来涌现出对马克思各方面思想的优秀英文评述，我大量扩充了各种参考文献。我的目的仍然是提供一个全面的、最新的导论。

戴维·麦克莱伦
坎特伯雷市艾维巷
1979年3月

第三版序言



在第三版修订时，我新增了关于意识形态的一章，并在“结论 马克思的遗产”部分增添了一个简要的评论。关于马克思的评述有增无减，所以我大量扩充了各种参考文献，旨在提供一个全面的、最新的导论。

戴维·麦克莱伦
坎特伯雷市艾维巷
1994年

缩略词表



MEW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柏林，1957年）[K. Marx and F. Engels, *Werke* (Berlin, 1957)]

MESW 《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两卷，（莫斯科，1962年）[K.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1962)]

MESC 《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选集》（莫斯科，1965年）[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KMSW 《马克思选集》，戴维·麦克莱伦编，（牛津，1977年）[K.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cLellan (Oxford, 1977)]

目 录



第一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2
第三版序言	3
缩略词表	4

第一部分

第一章 1837—1843 年	3
第二章 1843—1844 年	18
第三章 1845—1847 年	32
第四章 1848—1850 年	43
第五章 1850—1852 年	53
第六章 1853—1859 年	66
第七章 1860—1879 年	83
第八章 1864—1882 年	96

第二部分

第一章 异化	111
第二章 历史唯物主义	126
第三章 辩证法	141
第四章 意识形态	151
第五章 劳动	170

第六章	阶级	182
第七章	政党	194
第八章	国家	205
第九章	革命	221
第十章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236
结论	马克思的遗产	248

第一部分



马克思思想导论

第一章

1837—1843 年



著作

《给父亲的信》 [*Letter to his Father* (1837)]

《博士论文》 [*Doctoral Thesis* (1838—1841)]

《为〈莱茵报〉写的文章》 [*Articles for the 'Rheinische Zeitung'* (1842)]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Critique for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1843)]

传记

1818年，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莱茵兰省的特利尔城（Trier in the Rhineland province of Prussia），在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三，是长子。父系和母系祖辈世代都做拉比。他的父亲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律师，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爱国者，在拿破仑垮台和莱茵兰并入普鲁士之后，反犹太法便实行起来，这威胁到他的职位，他接受了洗礼。1830年马克思进入特里尔中学，在那里度过了五年时光。在1835年毕业考试时，他以理想主义的风格写道：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

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

次年，他进入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成为一名法学院的学生。在这里，他狂热地写诗，比别的学生花钱多（在他父亲看来），酷爱决斗，甚至以“夜晚酒后喧哗扰民”的罪名被关进监狱。一年后，他转到柏林的一所大学读书，这里仍然是黑格尔哲学的天下，他在这里一直待到1841年。在这里，他翻开了新的一页，而且正如他本人后来所说的那样，“完全离群索居”。所有的讲座他都去听。当然，他逐渐退出了官方的大学教育，孜孜不倦地自学，几乎将身体累垮。1835年夏天，他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Jenny von Westphalen）秘密订婚。燕妮的家庭是特利尔城最负声望的家族之一，是马克思家的邻居。这件事再次激发了马克思写诗的热情。在第一年里，他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还寄给父亲一本诗集。这本诗集包括长达300页、对法律概念所做的复杂分类，关于形而上学的新的基本体系，一个喜剧小说，一个悲剧，这些都被转换成黑格尔主义，另外他还写了一篇哲学对话。尽管马克思曾有过从事法律工作的想法，但是他受到柏林大学一群激进知识分子的影响，转而想选择大学教职。他希望通过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的关系在波恩找一个工作。鲍威尔是神学讲师，由于进行了激进的《新约》批评而从柏林调到波恩。为了自己的学术生涯，马克思开始写作枯燥的博士论文，讨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论文送到耶拿大学（University of Jena），为马克思赢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

1841年夏天，马克思到了波恩。由于非正统的观点，鲍威尔被解除了教职。马克思遂转向新闻业。1842年的前几个月，他是在特利尔度过的，为《德意志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写了第一篇文章。这家杂志的主编是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马克思在柏林最要好的朋友卡尔·科潘（Karl Köppen）向他推荐了马克思。4月，马克思回到波恩，开始定期为《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写稿。这是一份刚刚创办的报纸，资金来源于自由派的莱茵河工业家（他们认为这份报纸可以促进自由贸易），而倡办者则是摩西·赫斯（Moses Hess），第一个德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给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从赫斯写给朋友的信中摘录一段话以资证明：



马克思博士是世上最伟大的（或许是最唯一的）天才哲学家，他很快就会吸引所有德国人的眼光，他将给中世纪宗教和政治学以致命的一击。他将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与最敏锐的智慧结合起来。假如将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融为一个人——我是说融合而不是并列——你才会得到马克思博士。^[2]

马克思以一篇论新闻自由的文章和一篇回击反对派报纸（因《莱茵报》发表哲学和宗教方面的新颖意见，这家报纸对其进行攻击）的文章，开始了与《莱茵报》的合作。马克思在特利尔度过了七、八月份，但是由于他父亲于1838年去世，他与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1842年10月，马克思接任《莱茵报》主编职务，发表了一些文章，采取中立立场（较之共产主义而言），抨击了禁止穷人采集木材的法律，揭示了摩塞尔河谷酿酒人的苦难。1843年3月，在抨击了俄国的专制主义之后，报纸被查封。于是，马克思写信给卢格，与他商讨在苏黎世（Zürich）编辑一份激进刊物的计划：“一旦完成协议，我就前往克罗茨纳赫（Kreuznach）结婚。”

巴黎被确定为新刊物的基地，考虑到将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合作，刊物定名为《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1843年6月，在订婚七年之后，马克思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直到10月份他一直住在岳母家里。在这里，他广泛阅读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并就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写了一篇长长的批评文章。10月，他携带已有三个月身孕的燕妮前往巴黎，就任《德法年鉴》的编辑之职。

评 论

直到1843年底，马克思的著作显示了这样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从唯心主义（先是浪漫的唯心主义，然后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到自由理性主义和对黑格尔的批评。在此，马克思思想中的许多重要理论都是第一次产生。

马克思留下的第一批文件就是1835年的中学毕业作文。有些评论家认为，他们在这些论述中看到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因子，例如：“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但是这些作文只是展现了朴素幼稚的唯心主义，他宣布，“人的本性是这样

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3]。

更有意思的是1837年11月马克思写给他父亲的信。这封信描述了他在柏林第一年的学术发展。他主要关心的是极具空想主义风格的抒情诗，对此他做了下列自我批评：

我抨击现在，感情表达不适度或没有形式，什么都不自然，所有的东西都是妄想；我相信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彻底的对立，尽管存在某种热烈情感和丰富的希望，但是修辞性的思考占据了诗性思想的位置。这些就是燕妮收到的最初三卷诗的特征。[4]

他还试着研究法哲学，他的主要难题是“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冲突（这是唯心主义所特有的）。当他发现他的唯心主义与实际的法律毫无联系时（他的唯心主义受到康德和费希特的启发，当然有着内在的联系），便放弃了这个计划。所以，他回到纯哲学，并写了一篇新形而上学，同样因其无用而丢弃了。然而，在他养病期间（因为过度劳累而生病），他“彻头彻尾地了解了黑格尔及其大部分门徒”。尽管他以前“已经阅读了黑格尔哲学的片段而不喜欢它的奇异风格和令人眩晕的旋律”，但是他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了他以前难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鸿沟）的答案。“我抛弃了唯心主义（顺便说一句，我用康德和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滋养了它），而开始追寻它自身之中的思想。如果说以前神是在俯瞰世界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则变成了其中的核心。”这种不情愿的转变因为在大学与一群青年黑格尔派朋友们所进行的讨论而加强了。当时，他说：“我更加密切地将自己与当前的哲学联系在一起，而我以前是想逃避它的。”[5]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马克思写作自己的博士论文。他将论文题献给自己的岳父拜伦·冯·威斯特华伦（Baron Von Westphalen）。威斯特华伦敬仰法国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并且在马克思看来，他“活脱脱地证明了唯心主义并不是臆想的东西，而是真正的现实”。论文的主体比较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运动的理论。马克思批评德谟克利特严格的决定论，并在结论中支持伊壁鸠鲁关于自由的观点——人的意识可以改变自己的环境。

尽管论文本身没有多大意思，但是前言、准备性研究和笔记则更具个性

化。在前言中，马克思解释说，他的论文只是一项更长久工作的准备。那项更长久的工作将在与整个希腊思想的关系中，来研究由伊壁鸠鲁、斯多亚和怀疑哲学所组成的整个学术圈子。马克思继续说道，黑格尔已确切地描述了哲学史上的这些体系，但是（尽管他是一个“思想巨擘”）他既没有详细地描述，也没有意识到它们在希腊哲学史上的重要性。马克思解释说，他增加了一篇附录，来评论普鲁塔克（Plutarch）对伊壁鸠鲁的抨击，因为他希望捍卫伊壁鸠鲁关于哲学和信仰之间存在尖锐对立的观点。这是所有青年黑格尔派（人们就是这样来称呼黑格尔的激进信徒的）关心的事情，因为黑格尔曾经宣称，哲学和信仰形式不同但内容一样，而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信仰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并且将教会对普鲁士控制的放松看作任何进步的前提。马克思回应说：“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6]

准备性笔记指出马克思选择这个课题的原因。作为《新约》批评家，布鲁诺·鲍威尔对希腊哲学感兴趣，并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发现，在“整个”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后的希腊哲学与自己作为后黑格尔哲学家的情况之间存在一种相似。“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他写道，“从天上偷来火种，开始在地上建造房屋并安居下来，哲学发展到冒犯世界的地步，以自身抗衡它所发现的世界。而现在这就是黑格尔哲学”^[7]。

在一篇附注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后黑格尔哲学任务的观点。他解释说，哲学家必须通过运用黑格尔的基本原理来超越黑格尔：



一个哲学家由于这种或那种妥协而造成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他本人也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意识不到的是，这种表面的妥协最终由于自己原理的缺陷或没能充分掌握这些原理而成为可能。因此，如果一个哲学家真正妥协了，那么他的追随者们就应该运用其思想的内核，来阐明他自己所做的表面的表述。这样，良知的进步也就是知识的进步。这并不是对哲学家的良知加以怀疑，而毋宁是解释其观点的表面特征，给予它们以确定的形式和意义，同时也就超越了它们。^[8]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现在必须成为实践的：



有一条心理规律是这样的：一旦理论理性在自身内达到自由，就转变成实践能量，并任意从冥国的阴影里显现出来，面对世界的外部现实……但是哲学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正是这种批判以其本质衡量个别的事物，以思想衡量特殊的现实。但是哲学的这种直接实现，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中是充满矛盾的，而且正是其本质显现于现象中并在现象中留下印迹。^[9]

在进一步的笔记中，马克思对青年谢林（Schelling）的革命思想和谢林最近的演讲进行了比较，尤其抨击说，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只是一种空洞的同义反复。“例如，”他写道，“本体论的证明无非是：我真实想象的东西对我来说是真实的想象。任何一个将游牧部落的上帝带到古希腊的人，都会得到这个上帝不存在的证明，因为对于希腊人来说，他是不存在的：一片特定的土地对于特定的外来神来说，就像理性的土地对于一般的神一样，在这个地方，他的存在便终止了”。马克思认为，在现实中，这些证明只是“对基本的人类自我意识及其逻辑解释所做的证明”^[10]。

这些准备性研究和笔记从未发表，也没有详述，这是马克思有意所为。由于不可能将学术事业与记者工作结合起来，他就把注意力转向别处。这样，他的评论就是支离破碎的和含混不清的；但是它们也很重要，因为它们表明马克思第一次抓住了黑格尔哲学的难题，在他此后的生命中，这些难题一直萦绕着他。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一年里，马克思写了七篇主要的文章。在此，他很少将自己的思想表达明确，因为他通过揭露对手思想中的荒谬之处，从而赋予自己的文章以批判性解释的形式。为此，他运用手头上的任何武器，通常将激进的黑格尔主义与朴素的启蒙理性主义结合起来。

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是为卢格的《德意志年鉴》写的，却由于书报审查而被拒，一年后才发表出来。文章的题目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Comments on the Latest Prussian Censorship Instruction）。马克思揭露了新的书报检查制度的矛盾（它本来是可以缓和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但是，因为它们禁止对基督教信仰的攻击和对“教规、道德和外部尊崇”的冒犯，所以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制度肯定会排斥道德领域的思想巨人——如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并且冒犯教规、道德和外部尊崇。所有这些道德家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

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11]。而且，新制度对于好的法律也是充满敌意的，因为它们惩罚的将是“倾向”和“意图”，而不是行动。在马克思看来，这将造成这样一个社会：一个机关自以为是国家理性和道德的唯一拥有者，而同时“在道德国家里，即使国家的成员反对国家或政府机关，国家的观点还是服从它的成员”^[12]。这样，马克思开始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得出自由民主的结论。

马克思为《莱茵报》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为莱茵省议会中的辩论而作，尤其是为“议会关于新闻和出版自由的辩论”（Debates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Parliamentary Debates）而作。马克思发现，“每一个阶级的特征”“再没有比在这些辩论中表现得更明显了”。这些发言者并不认为自由是每一个理性人的天赋权利；对于他们来说，它是“某些人或阶级的个别特征”。这种态度不能拟定任何法律来统治新闻。因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这样，即使建议让步也是不够的，马克思引用伏尔泰的一句话：“‘自由’、‘特权’这些词语预设了一种征服状态。在总体的奴役状态中是没有自由可言的。”^[13]

在一篇论“历史法学派”的文章中，马克思抨击了自己的一些老教师，尤其是卡尔·冯·萨维尼（Karl von Savigny），他刚刚成为司法部长。历史法学派认为，历史存在是任何法律的首要理由。马克思指出，这种观点既矛盾又倾向于保守现有的政治非理性。

在一篇答“《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社论”的文章中，马克思更加专门地论述了教会和国家的分离。《科伦日报》的编辑反对马克思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观点，提倡在新闻界压制哲学和宗教的讨论，并宣布，信仰的衰落就是古代世界的毁灭。马克思的想法正好相反：“不是古代宗教的灭亡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是古代国家的灭亡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14]基督教国家的理想与理性的自由并不相容。在文章的结尾，马克思以黑格尔的方式描述了这种自由：



但是，如果以前的宪法教授是从内在冲动构造国家的——无论是野心还是社交性格甚至还是理性（是个体理性而不是社会理性）——那么更深刻的现代哲学概念则从所有人的思想演绎出国家。它认为国家是这样一个有

机体，在其中，必须实现司法、道德和政治自由，并且每一个公民通过遵循国家的法律，只遵循自身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15]

1842年，马克思被迫第一次讨论社会主义思想。《奥格斯堡报》(*Augsburger Zeitung*)指责《莱茵报》“与共产主义调情”。马克思的回答是矛盾的：



《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于像勒鲁(Leroux)、孔西得朗(Considérant)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Proudhon)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的女人想得到比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具有比说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才能，那她也会承认的……我们坚信，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发展；因为，实际试验（甚至是由大众进行的）一旦变得危险，就会由大炮回答它们；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理性将我们的良知铆定于其上的那种思想，是不撕心裂肺就无法挣脱的锁链；它们是这样的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们才能征服它们。^[16]

在为《莱茵报》所写的最后一批文章中，马克思讨论了“莱茵省议会关于盗窃林木的会议录”(Proceedings of the Rhenish Parliament on Thefts of Wood)和“摩泽尔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The Poverty of the Moselle Wine-growers)。他后来说，这些主题“第一次使我关注经济学问题”^[17]。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意识到法律的制定是如何密切地与统治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森林拥有者的利益相联系的。马克思在文章结尾，比较了独立观察家的印象和古巴原始人的信仰，前者认为林木是莱茵人的偶像，而后者相信上帝是西班牙人的偶像。

关于摩泽尔地区的文章详细地论证了《莱茵报》关于这一地区贫困状况的警告。马克思特别强调了经济条件作为政治活动决定因素的重要性：



人们在考察政治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为，而且就像呼吸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观察看起来首先只是个人的活动所赖以进行的那些关系。^[18]

当《莱茵报》即将被关闭的时候，马克思趁机辞职，正如他所说，“从公共舞台退入书宅”^[19]。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Kreuznach）居住了一个月，写成了一篇长达150页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关于民主、阶级和推翻国家的观点开始成形。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基本批判是，正如在宗教中人创造了创造者上帝而人又依赖于他一样，黑格尔从国家观念出发，并让所有其他东西——家庭和各个社会群体——依赖于这种观念。马克思说：



思想被彻底主观化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被理解为它们的内在虚构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真正是积极的形式；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可是由于思想被主观化了，所以现实的主体——市民社会、家庭等等——就变成思想的非现实客观环节，指的是别的东西。^[20]

马克思对黑格尔采取这种方法是受了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朋友的启发，那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费尔巴哈宣布，上帝只是愿望的一种投射，这种愿望是人发现自己无力实现的，所以说，人是真正的主语而上帝则是“谓语”。^[21]费尔巴哈最近将这种分析运用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而现在马克思则将这种分析运用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他这样说：



重要的是，黑格尔总是将观念转变为主语而将特定的现实主体……转变为谓语。但是，发展总是发生在谓语一边。^[22]

马克思手稿的其余部分将这种一般分析应用于黑格尔讨论的三个特定问题，即民主、官僚政治和选举权。

在对民主的评论中，马克思所概述的观点，是人道主义的，因为人被看作社会的基本因素；是自由主义的，因为人被看作一个自由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人被说成一种公共的存在；最后，马克思通过预言国家的灭亡而超越了共和主义。他说：



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国家的主体性方面；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的人；……最近，法国人以这样的方式构想了这一点：政治国家消失于真正的民主制。只要这样的政治国家，即作为制度的政治国家，不再适用于整体时，那么这一点才是真的。^[23]

黑格尔宣布，官僚政治拥有国家和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调解功能。然而，马克思认为，官僚政治促进政治分裂（对于它自身的存在来说，这是基本的），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了社会：



国家的目的（他写道）变成了行政办事机构的目的，反过来也一样。官僚政治是无人能逃脱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信息的等级制。上级认为下级洞察了详细情况，而下级认为上级洞察了普遍的东西，他们就这样互相欺骗。^[24]

黑格尔过分重视进入官僚政治的竞争本质，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

……在真正的国家中，问题不在于每个市民是否有可能献身于作为特殊等级的普遍等级，而在于这一等级是否有能力成为真正普遍的等级，即成为一切市民的地位。^[25]

在手稿的结尾处，马克思解释了他是如何思考关于克服社会分裂的问题的，答案在普遍选择权里可以发现。

这里并不涉及：市民社会应该通过议员行使立法权，还是全体人员都应该单个地行使立法权。这里涉及的倒是：扩大选举并尽可能普及选举，即扩大并尽可能普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论在法国或在英国，这都是围绕着政治改革进行的争论焦点。^[26]

马克思继续用他复杂的语言，描述普遍选举权如何通过将人作为公共存在的社会本质带回到社会，来造成市民社会的改革。人的社会本质被窃取，而转交给制度领域，从而对人的真正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只有在不受限制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市民社会才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自身的抽象，上升到政治存在，作为自己真正普遍的和基本的存在。但是，这种抽象之完成同时也就是抽象之扬弃。市民社会使自己的政治存在成为现实的存在，成为真正的存在，它也就使自己的市民存在成为非根本的存在，从而与自己的政治存在相对立。随着一方的分离，另一方，即它的对立面也就垮台了。在抽象的政治国家中，选举改革就是市民社会的瓦解。^[27]

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由三个因素构成：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经济理论。通过对黑格尔政治哲学进行费尔巴哈式的批判，

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第一个因素；后两个因素是他在巴黎得到的。

[注释]^①

[1]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L. Easton and K. Guddat (New York, 1967) p.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459~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M. Hess, *Briefwechsel*, ed. E. Silberner (The Hague, 1959) p. 80.

[3]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p.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457、459页)

[4] K. Marx,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1977) p. 6. (以下写为 KMSW.)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9~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 KMSW, p.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5、16页)

[6] KMSW, p.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2页)

[7] KMSW, p. 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36页)

[8] KMSW, p. 1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74~75页)

[9] KMSW, pp. 13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75页)

[10] K. Marx, *Early Texts*, ed. D. McLellan (Oxford, 1971) p. 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00~101页)

[11] *Ibid.*, pp. 29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19页)

[12]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L. Easton and K. Guddat (New York, 1967) p. 8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21页)

[13] K. Marx, *Early Texts*, p. 3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76、197页)

[14] *Ibid.*, p.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13页)

[15] KMSW, pp. 19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28页)

[16] KMSW, p. 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95~296页)

[17] KMSW, p. 38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8] KMSW, p. 2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363页)

[19] KMSW, p. 38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411页)

[20] K. Marx, *Early Texts*, p. 6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

① 本书注释中所列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版文献，均为译者所加，加了“参见”二字的，译文与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所不同，不加“参见”二字的，译文与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完全相同。

卷, 10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1] 关于费尔巴哈, 详情参见 Z. 汉菲 (Z. Hanfi) 为《炽热的小溪: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著作选》[*The Fiery Brook: Selected Writing of Ludwig Feuerbach* (New York, 1972)] 所写的引论, 以及 M. 沃特福斯基 (M. Wartofsky) 的《费尔巴哈》(*Feuerbach*, Cambridge, 1977)。

[22]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p. 15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2版, 第3卷, 14页)

[23] *KMSW*, p. 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2版, 第3卷, 40、41页)

[24] *KMSW*, p. 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2版, 第3卷, 60页)

[25]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p. 1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第307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26] *KMSW*, p. 3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396页)

[27] *KMSW*, p. 3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2版, 第3卷, 150页)

参考文献

译本

Letter to His Father, Doctoral Thesis, Newspaper articles

Excerpts in:

K. Marx,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L. Easton and K. Guddat (New York, 1967).

K. Marx, *The Early Texts*, ed. D. McLellan (Oxford, 1971).

Doctoral Thesis

D. Livergood, *Marx's Philosophy of Action* (The Hague, 1967)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975) vol. I.

K. Marx,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ed. J. O'Malley (Cambridge, 1970).

K. Marx, *Early Writings*, introduction by L. Colletti (London, 1975).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975) vol. 3.

评论

H. Adams, *Karl Marx in his Earlier Writings*, 2nd ed. (London, 1965)

L.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1969) Ch. 2.

S. Avineri, 'The Hegelian Origins of Marx's Political Thought', *Review of Metaphysics* (Sept. 1967).

- S.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1968).
- C. Bailey, 'Karl Marx on Greek Atomism',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1928).
- R. Berki, 'Perspectives in the Marxian Critique of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Z. Pelczynski, ed.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1971).
- D. Campbell, 'Rationality,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Marxist Critiques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quiry*, vol. 28. (March 1985).
- L. Colletti, Introduction to K.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1975).
- L. Dupr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New York, 1966).
- D. Duquette, 'Marx's Idealist Critique of Hegel's Theory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1. (Spring 1989).
- R. Garaudy, *Karl Marx: The Evolution of his Thought* (London, 1967).
- P. Gottfried, 'Marx, Hegel and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Modern Age*, vol. 22. (Spring 1978).
- S. Hook, *From Hegel to Marx* (Ann Arbor, 1968) Chs 3 and 4.
- D. H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an Dialectic* (Carbondale, 1972) Chs 1 - 3.
- G. Hu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in Marx',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8 (Summer 1987).
- R. Hunt, *The Political Ideals of Marx and Engels* (Pittsburgh, 1974) Chs 2 and 3.
- W. Johnston, 'Marx's Verse of 1836—37',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April 1967).
- E. Kamenka,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London, 1962).
- A. Liebich, 'On the Origins of a Marxist Theory of Bureaucracy in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Political Theory*, vol. 10 (February 1982).
- P. Linebaugh, 'Karl Marx, the theft of wood, and working class composi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current debate', *Crime and Social Justice*, vol. 6 (Autumn-Winter 1976).
- H. Lubasz, 'Marx's Initial Problematic: The Problem of Poverty', *Political Studies*, vol. 24 (March 1976).
- A. McGovern, 'Karl Marx's First Political Writings. The *Rheinische Zeitung* 1842—1843', in *Demythologizing Marxism* (Boston, 1969).
- D. McLellan,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 (London, 1969).
- D. McLellan, *Marx before Marxism* (London, 1970).
- H. Mewes,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s in the Early Work of Karl Marx' *Social Research*, vol. 43 (Summer 1976).
- J. O'Malley, introduction to K. Marx,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ed. J. O'Malley (Cambridge, 1971).
- J. O'Malley, 'Marx's "Economics" and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An Essay on

Marx's Hegelian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 24 (March 1976).

J. O'Malley, 'Methodology in Karl Marx', *Review of Politics* (1970).

R. Payne, *The Unknown Karl Marx* (London, 1972) Chs 1–3.

V. Perez-Diaz, *State, Bureaucracy and Civil Society: 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Karl Marx* (London, 1978) Ch. 2.

M. Rose, *Reading the Young Marx and Engels* (London, 1978).

Z. Rosen, *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 (The Hague, 1977).

E. Sherover-Marcuse, *Emancipation and Consciousness* (Oxford, 1986).

J. Siegel, *Marx's Fate* (Princeton, 1978) Pt. 1, Chs 1–3.

G. Teeple,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s, 1842—1847* (Toronto, 1984).

R. Tucker,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Cambridge, 1961) Pt 2.

第二章

1843—1844 年



著 作

《1843 年通信》 [*A Correspondence of 1843* (1843)]

《论犹太人问题》 [*On the Jewish Question* (1843—1844)]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Towards a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troduction* (1844)]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1844)]

《对〈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的批判性注释》 [*Critical Notes on 'The King of Prussia and Social Reform'* (1844)]

传 记

1843 年 10 月，马克思到达巴黎，在拉丁区住下来，与同事卢格、海尔维格 (Herwegh) 和其他德国流亡者同住一座房子，以此作为共产主义生活的实验。《德法年鉴》的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出版于 1844 年 1 月。上面刊登了马克思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是他带到巴黎的，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他到达后写的。马克思依然阅读有关法国革命的资料，而他的朋友们推断，他打算写一部关于国民议会的历史的书。同时，他与“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建立了联系，这是一个秘密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 1836 年。他还参加工人们的聚会。马克思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倾向导致了他与卢格的决裂。卢格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一种企图将所有人降低

为劳工的期望。

而在巴黎，马克思开始关注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借助法文阅读他们的著作。在1844年5月的一封信中，卢格描述了马克思狂热的学习方式：



马克思具有一种特殊的天赋，非常适合学习和写作，但是在新闻方面几乎完全不行。他大量阅读；他以非同寻常的强度工作，并有一种关键的才能，那就是：有时陷入荒唐的辩证法，但是他什么也没完成，总是中断并重新投入无穷无尽的书的海洋里。^[1]

出了第一期之后，《德法年鉴》就停刊了：编辑们发生了强烈的分歧；法国社会主义者惊诧于它对暴力和无神论的宣传而拒绝合作；而德文版本被没收得越来越多，导致财务困难。同时，马克思计划写一系列专论，讨论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并开始收集第一个专论的材料。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巴黎手稿》（*Paris Manuscripts*）。这篇手稿摘录了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描述了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将替代当前的异化社会，并批判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s*）。另外，马克思还花费大量时间阅读海涅和海尔维格的诗作，并通宵与蒲鲁东（杰出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巴枯宁（流亡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讨论黑格尔的辩证法。

1844年7月，马克思在《前进报》（*Vorwärts*）上发表文章，抨击卢格关于德国不可能发生革命的观点，从而将两人的决裂公开化。9月，恩格斯从他父亲设在曼彻斯特的工厂里工作之后回到大陆。以前在马克思当《莱茵报》的编辑时，他们就见过面，不过马克思对他很冷漠。但现在，经过14天几乎连续不断的讨论，他们发现，他们的思想非常接近，于是决定立即合作写一本书。

评 论

《1843年通信》是杂志的未来投稿者之间的书信来往，在《德法年鉴》上作为第一项内容发表出来。它表明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早在1843年5月的信中，马克思就暗示了经济状况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



工商业的制度，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创造，它只是存在和享乐而已。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是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多，那末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2]

在1943年9月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定义了他为杂志设想的政策：“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参与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以及改革人们的意识（不是通过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教条，而是通过“分析那神秘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3]）。

马克思写了两篇文章，来评论布鲁诺·鲍威尔论犹太人问题的著作，以此开始了他的“无情的批判”。在此，通过批判鲍威尔，马克思批判了自己的唯心主义政治思想。这些思想表现在为《莱茵报》所写的那些文章之中。

马克思的文章总的主题是，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进行对比。前者解放人类就像解放宗教一样无济于事，而后者只有通过国家和金钱的消失才能达到。

犹太人要求宗教的解放。鲍威尔对此的回答是，如果没有政治的解放，宗教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不再歧视犹太人，国家必须不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回答不彻底：鲍威尔只是批判了基督教国家，并没有批判国家本身；这样，他并没有看清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的联系。简单来说，将宗教从政治领域剔除出去，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美国已实现了这一点，但仍以笃信宗教而臭名昭著。



但是由于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那么这个缺陷的根源只应该到

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4]

政治解放的限度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公民得不到解放的条件下国家可以摆脱宗教。的确，宗教的存在是预设的，正如为了废除私有财产作为选举的资格而预设了私有财产的存在一样。这类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分裂为双重人格：其本质的公共、社会方面，以一种不真实的形式，仅仅存在于制度和“公民身份”的言辞这一层面上，而在他真实的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孤独的个体，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战争。



人过着双重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其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5]

然后马克思讨论了鲍威尔的这一观点：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都不能宣布人的普遍权利，因为他们将自己宣称为特殊和唯一的人类。然而，马克思拒斥整个人权观念，这种讨论包含了他对古典自由主义原理最易理解的批评。他以引用美国《人权宣言》开始，来揭示这些权利不仅与宗教相容，而且实际上还保证其自由活动。对于马克思来说，人权是市民社会原子化的、相互敌对的个体的权利。在引用1793年法国大革命宪法之后，他说：



自由这项人权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

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享受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6]

马克思继续对比了中世纪和1789年之后的社会，前者的封建社会至少还包括了某些公共的因素，而后者则将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领域看成其中立的基础。在第一篇评论的结尾处，马克思概述了自己对问题的解答：



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还原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自我中心主义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还原为公民、还原为道德的人。

现实的个人必须使抽象的公民回归自身，并且在自己的个人经验生活、个人劳动和个人关系中，必须成为类存在；人必须将自身的力量看作社会力量，并以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它们，因而不再将社会力量和自身相分离。只有实现了这一点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7]

在对鲍威尔的第二篇文章所做的评论中，马克思讨论了鲍威尔的这一观点：为了实现解放，犹太人还必须把自己从基督教（它比犹太教离解放更近一步）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再次颠倒了鲍威尔对问题的理论表达，他问道：为了废除犹太教，需要克服什么样的特定社会因素？在德语中，犹太教的另一层意思是“商业”。马克思利用犹太教的双重意义，发现犹太教植根于商业精神中，尤其植根于对金钱的重视。这使得他第一次勾画出异化劳动理论。这个理论将成为他的思想核心。



金钱是一切事物普遍的、自我构成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存在的异化本质；这个异化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向它膜拜。^[8]

在对鲍威尔的观点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经从政治领域转入他后来认为最基本的领域，即经济领域。尽管他宣布了人类彻底解放的目标，但是他仍然不得不确认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这是下一篇文章的任务。

马克思为《德法年鉴》所写的第二篇文章是他生平所写的最辉煌的著作之一。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作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引论（他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想发表的，但是没能发表）。以论宗教的著名警句开始，马克思提出了德国除在哲学领域之外都处于落后地位的问题，并以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结局而结束全文。

对马克思来说，宗教异化是他早已超越了的问题。他开始的几句话总结了已成为历史的东西：



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反宗教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但是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充满宗教精神气息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有情，是无灵魂环境的灵魂。它是人民的鸦片。……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9]

马克思认为，“对政治的批判”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按照法国的标准，德国尚处于前 1789 年时代。政治评论家的责任就是宣传这一事实，直到它令人不堪忍受为止。



不能使德国人有一点自欺和屈服的机会。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

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10]

德国的一个希望就在于它的政治哲学,那是非常进步的;德国人思考的正是其他民族已经做过的。所以,对这种超越了它的哲学和进步的批判,至少在理论上将展示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但是,为了有所成效,哲学需要相应的实践活动。所以,马克思提出这样的问题:



德国能否进行一场与其原则相一致的实践,也就是说,它能否进行一场革命,不但把德国提高到现代民族的行政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民族即将达到的人性水平呢?^[11]

马克思的回答表现了他激进的人道主义倾向: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 *ad hominem* (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 *ad hominem* (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2]

困难显然在于发现为革命所必需的“一种被动因素,一个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部分的革命,让“大厦屹立不倒”的革命,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部分革命的根本(马克思主要思考的是1789年)就是,一个特殊阶级发现自己能够将自身与整个社会的目的和愿望看成是一致的。而在落后的德国,任何阶级都不适合实现这一点。所以,马克思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在哪里呢?”然后,马克思做了回答,这种回答采

取的几乎是宣言的方式：



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

.....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3]

革命动力的问题既已明了，马克思再次“退回书宅”，投入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结果就是《巴黎手稿》。这些手稿包括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异化劳动，第二部分讨论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第三部分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

在讨论异化劳动的那一部分，马克思先是从自己这一段时间阅读的书籍中，摘录或注释了讨论资本、工资和地租的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恩格斯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启发。马克思这样总结自己从阅读中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可怕的恢复；最

后，资本家和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4]

马克思接着分析了他认为是资本主义根源的现象和他称为异化劳动的现象。异化劳动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联系，就如同与一个异化对象的联系一样；它矗立在他面前，将一种独立于生产者的力量强加于他。第二，正是在生产活动中，工人与自身相异化，因为工人不把自己的工作看作自己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在这种活动中没有舒适感。第三，工人的工作并不代表人（作为“类存在”）的协调活动，在这种工作中，人的“类生活”（‘Species-life’），即他的社会本质，从自身被剥夺。第四，人发现自身与其他人相异化。马克思描述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



诚然，我们从政治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当然，后来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15]

这种分析代表了马克思观点的消极方面，积极方面包含在马克思同时所写的关于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笔记中。在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相互欺骗和掠夺之后，马克思以哲学的和几乎是抒情的口气，勾勒了他关于真正的人类社会的概念：



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

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 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 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性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16]

在《手稿》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中，马克思描述了自己对异化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共产主义是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傅立叶和圣西门思考的结果，它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马克思称为“粗陋的共产主义”。在这种共产主义中，“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那么厉害，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17]。它是对所有文化和文明的否定，尤其是意在以公妻制代替婚姻。共产主义的第二个阶段，不是仍然希望保留国家（无论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就是至少仍然怀有私有财产的观念。马克思在描述第三个也即最后一个阶段的共产主义时，其语气几乎是神秘的：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是作为人的完全的、自觉的复归的共产主义，这种复归为作为社会的即人的存在的人自身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对抗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8]

然后，马克思论及真正共产主义的特征：在其中，社会生产人而又被其生产；人与自然的恰当关系保留下来，人统治自然，从而达到“完成了的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这使人能够以完全的而不再是片面的方式来把握自己的本质；最后，这个过程可以用唯一的科学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种融合来研究。马克思在这部分的结尾处以一种令人不满意的方式，试

图驳斥亚里士多德对上帝存在的证明，然后又戛然而止并宣布，无神论已经与社会主义的人无关，正如对私有财产的否定与共产主义者无关一样。


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这种辩证法见于黑格尔最著名的著作《精神现象学》。马克思先是赞扬了费尔巴哈的成就，尤其是他表明黑格尔的哲学不过是理性化的神学而已，并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出发点，发现了真正的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态度是矛盾的：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9]

但是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是从唯心主义立场看待的：“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20]然而，马克思从“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21]出发，将自己的观点定义为一贯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它既避免了唯心主义也避免了唯物主义。其余部分包含对黑格尔的基本批判所做的一个含糊的和令人费解的证明，即黑格尔错误地将异化和对象化（物质对象的存在）看成是一致的，并因此认为仅仅在心灵中就可以克服它。

在1844年7月反对卢格的文章中，马克思继续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开始的有关政治国家的讨论。所需要的不是政治叛乱，而是社会革命，关于民主制度，任何值得做出的概念都必须超越政治国家。



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壳。^[22]

[注释]

- [1] A. Ruge, *Briefwechsel etc.*, ed. P. Nerrlich (Berlin, 1886) I, p. 343.
- [2] KMSW, p. 36. (此处所注出处只查到第二段, 没查到第一段, 两段引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414~415页)
- [3] KMSW, p.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416、418页)
- [4] KMSW, pp. 43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425页)
- [5] KMSW, p. 4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428页)
- [6] KMSW, p. 5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438页)
- [7] KMSW, p. 5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443页)
- [8] KMSW, pp. 60 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448页)
- [9] KMSW, pp. 63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452~453页。此处引文在中译本中是不连续的)
- [10] KMSW, p.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455~456页)
- [11] KMSW, p. 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2版, 第3卷, 207页)
- [12] KMSW, p. 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460~461页)
- [13] KMSW, pp. 72 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466~467页)
- [14] KMSW, p. 7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42卷, 89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5] KMSW, p. 8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2版, 第3卷, 277页)
- [16] KMSW, pp. 121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42卷, 37页)
- [17] KMSW, p. 8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42卷, 117~118页)
- [18] KMSW, p. 8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42卷, 120页)
- [19] KMSW, p. 10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42卷, 163页)
- [20] KMSW, p. 10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42卷, 161页)
- [21] KMSW, p. 10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42卷, 167页)
- [22] KMSW, p. 12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488页。此处引文在中译本中是不连续的)

参考文献

译本

A Correspondence of 1843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L. Easton and K. Guddat (New York, 1967).

K. Marx, *The Early Texts*, ed. D. McLellan (Oxford, 1971).

K. Marx, *Early Writings*, introduction by L. Colletti (London, 1975).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975) vol. 3.

On the Jewish Question

K. Marx, *A World without Jews*, ed. D. Runes (New York, 1959).

K. Marx, *Early Writings*, ed. T. Bottomore (London, 1963).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L. Easton and K. Guddat (New York, 1967).

K. Marx, *The Early Texts*, ed. D. McLellan (Oxford, 1971).

K. Marx, *Early Writings*, introduction by L. Colletti (London, 1975).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975) vol. 3.

K. Marx,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ed. J. O'Malley (Cambridge, 1994).

Towards a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troduction

K. Marx and F. Engels, *On Religion* (Moscow, 1954).

K. Marx, *Early Writings*, ed. T. Bottomore (London, 1963).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L. Easton and K. Guddat (New York, 1967).

K. Marx, *The Early Texts*, ed. D. McLellan (Oxford, 1971).

K. Marx, *Early Writings*, introduction by L. Colletti (London, 1975).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975) vol. 3.

K. Marx,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ed. J. O'Malley (Cambridge, 1994).

Economics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K.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trans. M. Milligan (London, 1959).

K. Marx, *Early Writings*, ed. T. Bottomore (London, 1963).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L. Easton and K. Guddat (New York, 1967).

K. Marx, *The Early Texts*, ed. D. McLellan (Oxford, 1971).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975) vol. 3.

K. Marx,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ed. J. O'Malley (Cambridge, 1994).

Critical Notes on 'The King of Prussia and Social Reform'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L. Easton and K. Guddat (New York, 1967).

K. Marx, *The Early Texts*, ed. D. McLellan (Oxford, 1971).

K. Marx, *Early Writings*, introduction by L. Colletti (London, 1975).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975) vol. 3.

K. Marx,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ed. J. O'Malley (Cambridge, 1994).

评论

- H. Adams, *Karl Marx in his Earlier Writings*, 2nd ed. (London, 1965).
- L.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1970) Ch. 2.
- C. Arthur, *Dialectics of Labour, Marx and his Relation to Hegel* (Oxford, 1986).
- S. Avineri, 'Marx and Jewish Emancip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64).
- S.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1968).
- K. Axelos, *Alienation, Praxis and Techne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Austin, 1976).
- T. Bottomore, introduction to K.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1963).
- J. Carlebach, *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 (London, 1978) Ch. 8.
- L. Colletti, introduction to K.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1975).
- L. Dupr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New York, 1966).
- D. Fischman, 'The Jewish Question about Marx', *Policy*, vol. 21. (Summer 1989).
- E.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1961).
- R. Garaudy, *Karl Marx: The Evolution of his Thought* (London, 1967).
- M. Godelier,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London, 1972).
- D. H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m Dialectic* (Carbondale, 1972) Ch. 2.
- D. Ingram, 'Rights and Privileges: Marx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vol. 35 (February 1988).
- E. Kamenka,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London, 1962).
- L. Kolakowski, 'Karl Marx and the Classical Definition of Truth', in *Revisionism*, ed. L. Labedz (New York, 1962).
- H.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1969).
- E. Mandel, *The Genesis of Marx's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1971) Ch. 2.
- D. McLellan,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 (London, 1969).
- D. McLellan, *Marx before Marxism* (London, 1970).
- J. O'Malley, Introduction to Marx,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1994).
- J. Plamenatz, *Karl Marx's Philosophy of Man* (Oxford, 1975) Pt. 1.
- N. Reeves, 'Heine and the Young Marx', *Oxford German Studies* (1972/3)
- D. H. Ruben, *Marxism and Materialism* (Hassocks, 1977) Ch. 3.
- D. Struik,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London, 1959).
- G. Therborn,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Birth of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vol. 79 (1973).
- R. Tucker,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Cambridge, 1961).

第三章

1845—1847 年



著 作

《神圣家族》 [*The Holy Family* (1844—1845)]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Theses on Feuerbach* (1845)]

《德意志意识形态》 [*The German Ideology* (1846)]

《给安年科夫的信》 [*Letter to Annenkov* (1846)]

《哲学的贫困》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1847)]

传 记

1845年1月，法国政府迫于普鲁士的压力，签发命令，驱逐《前进报》的主要合作者，因此，2月份马克思离开巴黎前往布鲁塞尔（Brussels）。临行前，他完成了与恩格斯的第一部合著，名为《神圣家族》。这个书名特指马克思以前的同事布鲁诺·鲍威尔及其朋友。马克思还与达姆施塔特出版社签订了一份合同，准备出版一部论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著作。

恩格斯在他们共同的朋友们中间组织了一次捐款，来支付此次驱逐给马克思造成的财务费用。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居住下来，一住就是三年，他继续经济学的研究。1845年夏天，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在那里开始了两人持续不断的合作，直到马克思去世。他们先是前往英国，研究那里的状况；在伦敦，他们会见了正义者同盟的流亡成员，包括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1845年10月，在第二个女儿劳拉出生后，马克思申请移民美国，尽管他在这年年底声明放弃自己的普鲁士公民身份，但是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

行动。在1845年最后三个月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忙于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反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Stirner）的另一本长长的小册子。

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最近去过伦敦的机会，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网络，使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能够交流彼此思想和活动。3月，在布鲁塞尔委员会中，马克思和魏特林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然后在前往比利时的路途中继续争论。马克思反对魏特林号召工人立即发动革命暴动的做法。据魏特林说，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必须先掌权”^[1]。委员会做出了有利于马克思的决议。5月，蒲鲁东被邀请在网络中代表巴黎。蒲鲁东的回答很友好，但是包含这样的话：“我们不要把自己树立为新的不宽容的主人吧，我们不要成为新宗教的信徒吧，尽管这种宗教可能是一种逻辑的或理性的宗教。”^[2]达姆施塔特出版社催促马克思提交他已答应提交的手稿，但是恩格斯从巴黎传来消息说，蒲鲁东新近出版了一本经济学著作，于是这项工作就此搁置下来。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安年科夫是一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俄国流亡者），马克思简明扼要地描述了自己对蒲鲁东的著作的最初反应。1847年初，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以此来回答蒲鲁东的这部以“贫困的哲学”为副标题的著作。伦敦正义者同盟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扩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6月，同盟的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尽管马克思因为缺钱未能成行，但是恩格斯却参加了大会。马克思继续为德国报纸写稿，并在布鲁塞尔宣传会议上发言。


评 注

1. 《神圣家族》

这部著作包含许多讽刺的并经常是夸张的争论，这些争论没有多少长久的意义。鲍威尔的信徒对欧仁·苏（Eugène Sue）的小说《巴黎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Paris*）做出过评论。马克思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这些评论。这一部分尤其没有长久的意义。这些评论以黑格尔的方式试图说明，苏的小说包含着揭开现代社会秘密的钥匙。马克思以长长的篇幅既批评了这种虚幻的解释，又批评了小说家本人的道德化语气。这部著作中真正有意义的三个部分是：马克思回答鲍威尔对蒲鲁东的抨击的那一部分、讨论大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那一部分以及讨论唯物主义的那一部分。


(i) 马克思赞扬蒲鲁东是第一个质疑私有财产的存在并认为它对社会造成

了非人道后果的思想家。然后，马克思简述了自己对私有财产和无产阶级之间关系的观点：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3]

有人批评说，社会主义著作家们通过将这种历史作用赋予无产阶级，似乎把他们看作神。马克思对此的回答是：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因此在历史上被迫有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行动已在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当前市民社会的整个组织中被无可辩驳地、明显地预示出来了。^[4]

(ii) 鲍威尔想把自己的哲学强加于人民大众，并认为社会动力观念甚至是人格化的历史本身。马克思的观点则相反：“历史……并不利用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像它是一个特定的人一样：它只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5]或者说“观念从来不超越既定的情境，它只是超越关于既定情境的观念。观念绝对什么也不能实现。为了成为现实，观念要求人运用实践的力量”^[6]。在鲍威尔看来，知识精英的观念由于与大众联系而受到威胁，并且他相信法国革命的观念被大众的热情所毁坏。相反，马克思认为，这些观念并不足以渗透大众，而资产阶级能够使法国革命符合自身的利益。鲍威尔重视

体现于法国革命中的“人权”。但是马克思继续讨论《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主题，从而宣布只有无情的自我中心主义才真正得到了解放。

(iii) 在法国唯物主义的重要性问题上，马克思也不同意鲍威尔的观点。鲍威尔认为，法国的唯物主义运动是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一元论的直接继续。马克思希望强调像爱尔维修（Helvétius）和霍尔巴赫（Holbach）这样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反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方面。他追溯了18世纪社会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学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的影响：



既然人从他所获得的感觉和经验的世界中吸取自己的一切知识，那就必须这样安排经验的世界，使人在其中体验和获得真正适合人的东西，使他意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一切道德的原则，那就必须使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通过逃避这种或那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通过维护自己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该惩罚个人的犯罪行为，而应该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应该向每个人提供表现其存在的生命力的社会空间。既然人是由他的环境塑造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社会的力量为准绳。^[7]

《神圣家族》出版时并没有多少人阅读，它当然也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但是，后来的“唯物主义历史概念”的几个主题第一次在这部著作中出现，而马克思在12年后重新阅读这本书时这样评论说：“我惊喜地发现，尽管崇拜费尔巴哈让我感到非常有趣，但是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著作而羞愧。”^[8]

2.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春天，马克思对自己的“费尔巴哈崇拜”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并写了11篇文章，这些文章构成《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第一篇文章包含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批评的本质：“以前所有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就是，对事物、现实和感性，只

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在第二篇文章中，马克思概述了自己关于理论和实践统一性的学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在第三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不足：“关于环境的改变和教育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接下来的文章详细描述了马克思拒斥费尔巴哈对宗教的“静态”态度，最后一篇文章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

3. 《德意志意识形态》

正如后来马克思所写的那样，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10]。这部著作分三个主要部分：一部分论费尔巴哈，一部分论马克思·施蒂纳，一部分论“真正的唯物主义”。在这三部分中，第一部分是重要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先是取笑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主张，他们将其描述为“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11]。然后，这部分的主体分三部分：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对比中，来总体地陈述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历史分析；描述当前的社会状态及其不久的将来——共产主义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先是陈述了他们的总体观点，因为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首次简明扼要的陈述，所以值得大段地引用：



我们所由开始的前提不是任意的前提，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形成抽象的现实前提。它们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生活的物质条件，包括他们发现已经存在的和他们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式来检验。

当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人类个人的存在。因此，

第一个要确立的事实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的真实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在其中发现自身的各种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一旦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通过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现实的物质生活。

人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在存在中发现的和必须再生产的现实生活资料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该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虑。宁可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是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的本性取决于决定他们生产的物质条件。^[12]

他们继续论述：“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13]他们揭示分工是如何导致城镇和乡村的分离，然后又导致工业劳动从商业劳动中分离出来的，等等。接着，他们简述了与分工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所有制发展的不同阶段：部落所有制，封建或等级所有制，公社和国家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来简述他们的结论：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都是不断地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有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4]

然后，他们简要重述了自己的总体方法，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并揭示分工通过导致私有财产，是如何造成了社会不平等、阶级斗争和政治机构的建立的：



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共同体的形式。然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证明的各阶级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些阶级是由分工决定的，在这些大众中形成，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由此可见，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公民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15]

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向共产主义革命的紧迫性。“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他们写道，“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16]。至少就生产工具来说，即将到来的革命将是一次彻底的革命：“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须从属于每一个个人和所有人的财产。个人控制现代普遍相互作用的唯一方式，就是使它服从所有人的控制。”^[17]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8]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结构做过多讨论。当然，他们强调了分工的消失：“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独占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他希望的任何部门内实现自己，社会调节着总的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只要我有想法，就不会永远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9]

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很没有意思。其中有冗长而令人生厌的对施蒂纳《自我和他我》（*The Ego and his Own*）的抨击。施蒂纳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基本的和唯一的现实就是自我，这个自我必须拒斥所有意识形态和体制。^[20]再就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摩西·赫斯和他的信徒们）所做的结论。他们在费尔巴哈的启发下，将社会主义变成一种伦理理想，而马克思认为它是一种经济现实。

4. 《哲学的贫困》

1846年夏天，马克思收到蒲鲁东的经济学新著，在给俄国记者安年科夫的信中首次赞扬了这部著作。在此，马克思坚持认为，社会组织和政治意识形态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处于人们的控制之外：



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21]

马克思将这封信中的思想接续下来，在一篇对蒲鲁东的全面答复中进行了详细阐述。这部著作于1847年发表，它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第一次公开发表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没能找到出版商来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拉萨尔（Lassalle），这个19世纪60年代杰出的德国社会主义领导人提到这部著作时说，在前半部分，马克思是一个具有李嘉图倾向的社会主义者；而在后半部分，马克思是一个具有黑格尔倾向的经济学家。

李嘉图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以包含于商品中的劳动时间为基础；蒲鲁东建议，商品的价值应该这样构成：一个生产者的产品应该可以与包含相同劳动时间的另一产品进行交换。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变成交换相似劳动质量的工人，就可能实现社会改革。然而，马克思认为，如果这样假设，即阶级矛盾可以通过一项基于某种想象的和谐与平等理想的蓝图就可以消除，那么这只是资产阶级的幻想。对于蒲鲁东的等价交换来说，金钱不能成为工具，因为它只是一种社会关系，并且反映一定的生产方式。在当前条件下，供需之间的恰当平衡是不可能的，因为大规模的工业不能等待需要，被迫以稳定增长的数量生产，这样就造成当前的危机。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马克思讨论了他所认为的蒲鲁东的“伪黑格尔主义”（pseudo-Hegelianism）。蒲鲁东宣布，应当描述正题和反题中的经济思想革命，以便将它们发展为协调的合题。^[22]马克思批评蒲鲁东没有意识到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达。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他写道),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布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在获得新的生产力的过程中,人们改变了自己的生产方式,在改变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过程中,人们改变了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23]

马克思接着批评蒲鲁东在分工、机器、垄断和土地上的非历史观点。最后,马克思拒斥蒲鲁东对罢工和同盟的反对。他认为,它们是社会和政治革命不可或缺的工具:“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24]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综合论述,并且他建议将这本书与《共产党宣言》一起作为《资本论》的引论。

[注释]

[1] Cf. Hess, *Briefwechsel*, p. 151.

[2] Quoted in P. Hauptmann, *Marx et Proudhon* (Paris, 1957) p. 57.

[3] KMSW, p. 13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 KMSW, p. 13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45页)

[5]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Holy Family* (Moscow, 1956) p. 12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18页)

[6] Ibid., p. 16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52页)

[7] KMSW, p. 15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66~167页)

[8] K. Marx and F. Engels, *Werke* (Berlin, 1956 ff.) XXXI 290. (以下作 MEW)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1 卷，29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KMSW, p. 1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 卷，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 KMSW, p. 3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13 卷，1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1]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2nd ed. (Moscow, 1968) p. 2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 卷，19 页)

[12] KMSW, pp. 160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1 卷，66~6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KMSW, p. 16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 卷，24 页)

[14] KMSW, p. 16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 卷，28~29 页)

[15] KMSW, p. 1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 卷，37~38 页)

[16] KMSW, p. 1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 卷，76 页)

[17] KMSW, p. 17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 卷，76 页)

[18] KMSW, p. 1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 卷，40 页)

[19] KMSW, p. 1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1 卷，85 页)

[20] 关于施蒂纳，详情参见 R. Paterson, *The Nihilistic Egoist* (London, 1971)。

[21] KMSW, p. 19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27 卷，47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 值得指出的是，人们对马克思的普遍误解是，马克思以正题、反题和合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但是他以这种话语进行讨论且旨在驳斥蒲鲁东的这一用法，此处是唯一的一次。

[23] KMSW, p. 20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 卷，14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4] KMSW, p. 2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 卷，198 页)

参考文献

译本

The Holy Family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Holy Family* (Moscow, 1956).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L. Easton and K. Guddat (New York, 1967) (excerpts).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975) vol. 4.

Thesis on Feuerbach

K. Marx,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ed. T. Bottomore and M. Rubel (London, 1956).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L. Easton and K. Guddat (New York, 1967).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975) vol. 5.

The German Ideology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L. Easton and K. Guddat (New York, 1967) (excerpts).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Moscow, 1968).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ed. With further selections and an introduction by C. Arthur (New York and London, 1971).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975) vol. 5.

K. Marx,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ed. J. O'Malley (Cambridge, 1994).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K. Marx,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Moscow, n. d.).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L. Easton and K. Guddat (New York, 1967) (excerpts).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London, 1975) vol. 6.

评论

C. Arthur, introduction to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and London, 1971).

C. Arthur, *Dialectics of Labour: Marx and His Relation to Hegel* (Oxford, 1981).

K. Axelos, *Alienation, Praxis and Techne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Austin, 1976).

G. Cohen,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68).

O. Hammen, 'The Young Marx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0).

E. Mandel, *The Genesis of Marx's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1971) Ch. 3 and Ch. 4.

J. O'Malley, Introduction to Marx,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1994).

N. Rothenstreich, *Basic Problems of Marx's Philosophy* (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 1965).

D. Sayer, 'The Critique of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Capitalism, Communism and the State in Marx's Writings of the mid-1840s',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3. (May 1985).

P. Thomas, 'Karl Marx and Max Stirner', *Political Theory*, vol. 3 (1975).

还可参见第二部分第二章“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参考书目。

第四章

1848—1850 年



著 作

《共产党宣言》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雇佣劳动与资本》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1849)]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Address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Communist League* (1850)]

传 记

1847年11月，马克思设法与恩格斯一起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届年会。同盟意在变得开放和民主（与其前身正义者同盟相反）。这样，同盟决定阐明那种被设想为“游荡于欧洲”的“幽灵”的所有真正本质。这项工作落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肩上。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和巴黎的摩西·赫斯都拟订了一份草稿；恩格斯冠之以《共产主义原理》（*Basic Principles of Communism*），以问答的形式写出。最后一稿的大部分内容都来源于此。事实上，这个版本几乎完全没有发表：马克思忙于自己的其他活动，只是在中央委员会的最后敦促下，他才写出来。1848年1月底，《共产党宣言》被送到伦敦，2月在那里出版。尽管它后来成为阅读量最大的共产主义文献，但实际上，在首次出版时它并没有给人们多少印象。

在《共产党宣言》问世时，马克思正在革命的巴黎。受到意大利城市暴动的影响，2月22日在巴黎发生激烈的起义。中产阶级的国民警卫队对抗国王路易-菲利浦，逼其逊位，并组成一个新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具有自由

主义倾向并包括一个更激进的社会主义派别。这个政府邀请马克思回巴黎。当时比利时政府因为马克思违反不参与政治新闻的承诺而刚刚对他下达驱逐令，于是马克思欣然接受这个邀请。那里的德国工人准备组成军团，去解放德国。马克思一到达巴黎，就反对这种胡思乱想：他说，他们的任务是留在巴黎，支持那里的革命。


3月，革命延伸到德国。柏林发生暴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决定做出让步。他宣布赞同以一个联邦制的德意志帝国取代现存的联盟，组成民选的国会，实行新闻自由。他组成康普豪森（Camphausen）领导下的自由政府，并选出议会来起草新宪法，这项任务将拖延了一个夏天。在德国的骚乱开始时，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人到达科隆（Cologne）。6月，马克思在那里开办了一份新的报纸《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并担任主编。他总共为报纸撰写了80篇文章，并广泛游历。8月，马克思到达柏林，在那里遇到巴枯宁。9月，他到达维也纳（Vienna）。

然而，1848年夏天，反革命发动第一次反击。6月，巴黎同时发生的群众起义被军队和国民警卫队血腥镇压下去了，迫使议会政府以武力回击。在德国，议会丧失了群众的支持，而威廉四世再次巩固了统治。马克思被政府驱逐，《新莱茵报》以红色印刷的最后一期也就此停刊。马克思到达巴黎，法国政府允许他留在法国，条件是他得去莫尔比昂（Morbihan）居住，那是布列塔尼（Brittany）的沼泽地区。马克思转而决定前往伦敦。拉萨尔，一个志同道合的社会主义者，在莱茵兰的朋友们中间发起一次捐款活动来资助马克思的行程。8月，马克思离开法国。9月，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与他同行。

评 论

《共产党宣言》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作为阶级社会的社会史，这部历史从中世纪开始，以预言无产阶级对当前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第二部分描述了无产阶级中的共产党人的立场，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责难，然后描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特征，胜利的无产阶级将采取的措施，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第三部分扩展到对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和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最后一部分简述了共产党人对其他对立政党的策略，并以呼吁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号召作结。


开始语描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方法的特征：



至今一切现存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总之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

他们继续写道，现时代是一个独特的时代，因为阶级对立已经简化成现在的两大相互对立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起源于封建社会，得益于美洲的发现、世界市场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将其阶级和观念的统治强加于世界各地。从历史上来看，资产阶级曾是最革命的阶级：“它创造了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哥德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同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2]但是这种进步不得不继续：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正如资产阶级造成封建社会垮台一样，现在它正准备着自身的垮台，“像一个魔术师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3]。因为资产阶级不仅创造了他们灭亡的武器，他们还使掌握这些武器的人们即无产阶级产生了。

然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质。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物。尽管他们工作的时间更长，但是机器的使用和分工越是增加，工人得到的工资越少。中层阶级的下层被迫成为无产阶级：



中层阶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沦落为无产阶级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够经营大工业，经不起大资本家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各个阶级的人口补充起来的。^[4]

无产阶级经历了几个阶段：首先，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恢复丧失了的中世纪工匠的地位；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开始组成工会；最后，阶级斗争变成政治斗争。当斗争接近决定性时刻时，瓦解过程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一

小部分，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一小部分，就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中的其他阶级都不能担负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中层阶级的下层实际上是反动的，因为他们试图倒转历史的车轮；“危险阶级”（dangerous class），也就是那些社会渣滓，是从社会下层产生的消极腐化的人群^[5]，极易被反动阴谋所收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来总结这一部分：



资产阶级不情愿推动的工业进步，却使工人们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6]

在第二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共产党人和全体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共产党人并不与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就是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与其他工人阶级团体的区别是双重的：他们是国际主义的，并且他们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重要性。他们的思想不是发明的或发现的；他们只是表达了现存的阶级斗争中的实际关系，并且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消灭私有制。

然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责难。

第一种责难是，共产党人希望消灭“人们亲自获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7]。他们回答说，小工匠和小农的财产正在被资本的力量所消灭；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财产；资本，作为集体产品和所有社会成员活动的结果，应该集体所有。私有财产是资产阶级财产，所有反对消灭这些财产的观点都是资产阶级的观点。

与此类似，消灭家庭就是说，消灭资产阶级家庭，它们的对立面就是无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实际丧失以及公娼制。

所谓“公妻制”的真实含义是，消灭妇女只是作为生产工具的地位。当前的体制只是公娼制和私娼制。

有人还说，共产党人是想消灭国家和民族。但是工人根本没有国家。现代工业正在消灭民族之间的区别，随着阶级对立的消失，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仇恨也将结束。

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责难不值得认真思考：

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吗？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8〕

讨论了这些责难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简述了一旦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将要采取的措施：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9〕


接下来是一项计划，包括废除地产和继承权，征收所有税，集中信贷和交通运输，实行工厂的国有制，并实行免费教育。他们做出结论说：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全部生产集中在整个民族的庞大联合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有组织地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权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迫于环境的压力而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因此消灭旧的生产条件，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条件的同时，就从总体上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的存在条件，从而也就废除了它作为一个阶级所拥有的优越性。

为了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及其各阶级和阶级对立，我们将拥有这样一个联合体，在其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0〕


第三部分是对三种社会主义的批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和空想的。第一种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这是贵族为报复资产阶级取代自己而成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思想。与封建社会主义手联手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马克思斥之为“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肝火神圣化的一种圣水罢了”^[11]。第二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要以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Sismondi）为代表。这一学派对现代生产方法的内部矛盾有着深入的分析；但是它的积极主张是反动的，它希望恢复手工业的联合行会和农业的宗法关系。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中，第三种是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人是德国哲学家，主要是费尔巴哈的追随者，他们阉割了法国社会主义，使之变成一种形而上学体系。这在像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在那里，哲学家并不代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因此，他们宣称代表的



……不是坚持真实的要求，而是坚持对于真理的要求，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人性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是不属于任何阶级，并且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哲学冥想的渺茫太空。^[12]

评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第二部分，是指向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一部分很简短。蒲鲁东是这种倾向的主要代表，而马克思已对他的理论做过大量的考察。在此，他只考察：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要现代社会条件的所有优越性，但又不要由此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要现代社会，但是不要它的革命和导致解体的因素。他们只要资产阶级而不要无产阶级。^[13]

这样，这些所提倡的改革绝不会影响劳资关系，但是至少可以减少并简化资产阶级政府的成本和管理工作。

在此讨论的最后一个学派是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批判的一空想的”学派。他们产生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早期的、不发达的

阶段。这些著作家赞赏阶级对立，但是因为无产阶级发展得仍然不够充分，没能成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手段，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和小型的实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拒绝政治的，尤其是革命的行动。他们的乌托邦形成于无产阶级仍然不够发展的时期，“是与这个阶级最初本能地向往总体社会重组相一致的”^[14]。但同时，这些乌托邦还包含批判的因素：既然它们攻击现存社会的每一项原则，他们就充满对工人阶级启蒙来说有价值的资料。但是，随着现代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成形，这些乌托邦就丧失了所有实践的价值或理论的合理性。这样，“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也曾经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却就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15]。

《宣言》的第四部分也即最后一部分，阐述共产党人对各种敌对政党的态度：在法国，他们支持社会民主党；在瑞士支持激进党人；在波兰支持农民的革命；在德国支持资产阶级。然而，在德国，他们从没有停止向工人阶级灌输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仇恨的最清醒的可能认识。共产党人主要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德国，那里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宣言》这样结尾：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条件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6]

马克思将自己在布鲁塞尔散发给工人的文章，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在此，马克思详述了生产资本的增加对工资的有害影响，第一次清晰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的学说，简述了工人后备军的思想——这个思想将在《资本论》中得到详述。

以马克思为主编的《新莱茵报》所追求的方针是，反对许多德国激进分子所倡导的联邦主义。德国统一要通过反对俄国的“革命战争”来实现。马克思宣布：在反革命成功之后，“只有一个手段，可以缩短旧社会死亡的痛苦和新社会的血腥诞生，只有一个手段——革命恐怖主义”^[17]。

如何实现这一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的任务。这篇文章写于1850年，确定了无产阶级斗争应遵循的策略。

所要实现的是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组织，以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人政党的创立；他们倡导以城镇议会、俱乐部和武装委员会等形式，重新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府。



革命的工人将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一起去反对他们共同所要推翻的派别，但是那个派别只要产生自己的利益，就会来反对革命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8]

在小资产阶级有限的要求实现以后，在两党之间产生公开的分歧：



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使革命永远持续，直到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被迫退出他们的统治地位，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手中。^[19]

无产阶级面临的可能是长久的斗争，但是成功的第一条件就是独立的组织。《告同盟书》这样来结尾：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20]

《告同盟书》当然包含看起来很接近布朗基（Blanqui）的观点，并且有人认为，在1850年上半年，马克思采纳了布朗基主义的态度。然而，没有必要接

受这一观点：马克思此处的方法与他以前和以后的方法是非常一致的。^[21]

[注释]

- [1] KMSW, p. 22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65~466页)
- [2] KMSW, p. 2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69页)
- [3] KMSW, p. 2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71页)
- [4] KMSW, p. 22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74页)
- [5] KMSW, p. 2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77页)
- [6] KMSW, p. 23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78~479页)
- [7] KMSW, p. 23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80页)
- [8] KMSW, p. 2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88页)
- [9] KMSW, p. 23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89页)
- [10] KMSW, pp. 237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90~491页)
- [11] KMSW, p. 23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93页)
- [12] KMSW, p.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96页)
- [13] KMSW, p. 24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98页)
- [14] KMSW, p. 24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501页)
- [15] KMSW, p. 2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501页)
- [16] KMSW, p. 24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504页)
- [17] KMSW, p. 27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5卷，543页)
- [18] KMSW, p. 27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19] KMSW, p. 28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292页)
- [20] KMSW, p. 28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299页)
- [21] 在此问题上，尤其要参阅参考文献中列出的 wolf 和 Avineri 的著作。

参考文献

译本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d. H. Laski (London, 1961).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oscow, 1962) vol. I.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d. A. J. P. Taylor (Harmondsworth, 1969).

The Birth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d. D. Struik (New York, 1971).

K. Marx,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introduced by D. Fernbach (London, 1974).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d. D. McLellan (Oxford, 1993).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oscow, 1962) vol. I.

Address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Communist League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oscow, 1962) vol. I.

K. Marx,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introduced by D. Fernbach (London, 1974).

评论

S.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1968).

R. Blackburn, 'Marxism: Theory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 Reader in Marxist Politics*, ed. R. Blackburn (London, 1977).

J. Cunliffe, 'Marx's Politics: The Tensions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olitical Studies*, vol. 30 (December 1982).

H. Draper, 'Marx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Cahiers de l'ISEA* (1962).

D. Fernbach, Introduction to K. Marx,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London, 1974).

O. Hammen, *The Red 48ers: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New York, 1969).

R. Hunt,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Pittsburgh, 1974).

H. Laski, introduction to K. Marx,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London, 1961).

N. Levine, *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els* (New York, 1975).

J. Maguire, *Marx's Theory of Politics* (Cambridge, 1978) Chs. 2 and 3.

B. Nicholaievsky,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956).

D. Struik, *The Birth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1971).

A. J. P. Taylor,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Harmondsworth, 1969).

Y. Wagner and M. Strauss, 'The Programm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it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Political Studies* (December 1969).

B. Wolfe, *Marxism: 100 Years in the Life of a Doctrine* (London, 1967) Pt. 4.

For general background to the 1848 revolutions, see: W. Langer, *Political and Social Upheaval 1832—1852* (New York, 1969) and J. Sigmann, *1848: The Romantic and Democratic Revolutions in Europe* (New York, 1973).

第五章

1850—1852 年



著作

《法兰西阶级斗争》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50)]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

传记

马克思一家到达英国后，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圭多（Guido）很快就降生了。1850年，由于没有能力支付租金，他们从坎伯韦尔（Camberwell）的住处被赶出来，在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的德国饭店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住了一周，然后搬到索候的迪恩大街（Dean Street, Soho）的两个小房间里，以后6年他们都在那里居住。

马克思创立了一份月刊，名为《新莱茵报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Review*），试图继续自己的新闻活动。这本刊物在英国编辑，到德国去销售。马克思写了三篇文章，来重新考察1848年革命的重要性，后来以《法兰西阶级斗争》为书名出版，而这三篇文章最初就刊登在《新莱茵报评论》上。马克思还忙于政治活动，尤其是重组共产主义者同盟。上一章引用的《告同盟书》就是这种活动的一部分。4月，与法国革命领导人布朗基的追随者会晤，并组成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Revolutionary Communists*），它的章程的第一条这样说：“协会的宗旨是推翻所有特权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直到共产主义实现为止，

共产主义是人类大家庭最终的组织形式。”^[1]

然而，到秋天，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加剧。一部分人实际上无视环境，主张立即采取革命行动；而马克思（继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认为，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相对繁荣的经济条件下，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在向中央委员会所做的发言中，马克思指出了两种观点的区别：“我们对工人们说：‘你们必须忍耐并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以便改变环境，以便使自身能够掌握政权。’相反，你们却说：‘我们必须立即夺取政权，不然我们就去睡大觉好了。’就像民主派将‘人民’一词仅仅用作一个词语一样，现在有人也将‘无产阶级’一词这样来使用……”^[2]由于面临在这个问题上将遭失败的前景，马克思设法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总部迁到科隆，这意味着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的解体。11月，《新莱茵报评论》出了最后一期便停刊了，原因是没有资金，也没有读者。恩格斯看到在伦敦没有进一步活动的余地，便前往曼彻斯特（Manchester），在他父亲的工厂里担任一个职务，直到1869年为止。

1851年的最初几个月里，马克思放弃自己活跃的生活，在大英博物馆里进行大量的阅读。年轻的德国流亡者皮佩尔（Pieper）（他有时担任马克思的秘书）这样写道：“马克思过着非常孤寂的生活，他仅有的朋友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谁要是到他那里去，那他不是用客套话来应酬，而是跟你谈经济学范畴的问题。”^[3]马克思一家几乎长期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圭多于1850年夭折，而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弗兰西斯卡（Franziska）生于1851年，第二年就夭折了。更为复杂的是弗雷德里克（Frederick）的出生。他是马克思与女仆海伦·德穆特（Helene Demuth）的私生子，他一直健康地生活到20世纪。1851年，马克思的潜心研究被家庭纠葛之外的两件事所打断。第一，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成员被捕，一些文件被发现，其中包括1850年马克思的《告同盟书》。一场政治审判正在大张旗鼓地准备着。马克思花费了大量时间搜集证据，来驳斥诉讼指控，其中许多指控纯粹是伪造的。第二，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激进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的编辑查尔斯·德纳（Charles Dana），邀请马克思担任这家报纸的欧洲通讯记者。马克思同意了，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唯一的固定收入就来源于每周为这家报纸所写的文章。实际上其中许多文章是由恩格斯写的。

同时，在法国，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 Napoleon Bonaparte）（他是前任皇帝的侄子，1848年底以绝大多数票当选总统）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保证他在下一个十年中连任总统。一年后，他宣布第二帝国的诞生，从而使自己的贵族政权名正言顺。马克思为一家名为《革命》（*Revolution*）

的纽约杂志写了一系列文章，分析了这次政变的社会经济背景。他将这些文章称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暗示拿破仑一世的篡夺政权。

评 论

几乎是一到达伦敦，马克思就对 1848 年革命进行了历史和社会学的研究，以分析法国无产阶级暂时失败的原因，以及未来革命所要吸取的教训。首先是法国的历史（这总是马克思喜欢阅读的主题）启发了他思考阶级斗争的政治意义。这些思考产生了三部主要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下面就讨论前两部著作，最后一部著作将在本书第一部分第八章中来讨论。

对于《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说，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尝试用自己的唯物主义概念，根据一定的经济条件，来解释一部分当前历史”^[4]。但是不仅如此，它还是一本政治小册子。马克思开宗明义地表明自己对反动派近期胜利的态度：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 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其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即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做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党。^[5]

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分析了七月君主政体下的法国阶级结构，尤其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冲突。在马克思看来，自从七月革命以后，在皇位之后真正掌权的是由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和大土地所有者所

组成的金融贵族。工人零星的反抗容易被镇压，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被排斥在政权之外，这意味着唯一真正的对立面就是工业资产阶级。结果则是，七月君主政体不过是一个股份公司，国家不断处于破产的边缘，以便金融贵族利用小投资者的破产做投机买卖。

马克思继续写道，普遍不满发展成革命，是因为1845年和1846年马铃薯病虫害和庄稼歉收，以及英国工商业的总危机。尤其是第二个原因意味着资产阶级被抛回本国市场，随后的竞争和大量的破产充分鼓舞着人们起来革命。在二月街垒战后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



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6]

在这个临时政府内，如果希望工人代表拥有真正的权力，事实证明那是幻想。尽管有着口头的甚至组织上的让步，但是他们仍然处于完全边缘的地位：



工人与资产阶级协力进行了二月革命；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身边捍卫自己的利益，——须知他们确实把一位工人安插在临时政府里面坐到了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哩。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本身已是用资产阶级方式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设在这些部近旁的无产阶级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虚弱无能的部，只能是一个仅有善良愿望的部，只能是一个卢森堡委员会。正如工人们相信能与资产阶级并存的情况下解放自己，同样，他们也以为能够在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存的情况下在法国国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所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所制约的。难道法国能够打破这种生产关系，而挑不起一场对于统治世界市场的英国具有强烈影响的欧洲革命战争吗？[7]

即使在法国国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经济条件远没有成熟，当然在巴黎暂时的成功是可能的；因为金融贵族没有允许工业资产阶级形成生产资料。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还没有实现广泛的民族存在，封建社会最后的残余还没有消失，法国工业基本上仍然是孤立的。因此，临时政府的任务不可能是对世界进行革命性的转变，而只能使自身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这种适应最接近法国金融措施：它们不是让法国银行破产，以摧毁金融贵族，而是通过向农民征税来买得资本家的自信。因为向工人做出的允诺将付出高昂的代价，来维持最重要的信誉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一部分无产阶级来反对另一部分无产阶级，于是政府就通过将流氓无产阶级招募到特别组成的别动队中，来收买他们。

五月选举通过恢复议会（它只是创造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结束了临时政府的矛盾立场。令人绝望的工人六月起义从一开始就是毫无希望的：



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直接的、公开的要求并没有驱使无产阶级去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没有能力担当这个任务。“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声明说，共和国对它的幻想不得不予以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唯有它的失败才使它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许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那些形式丰富而内容琐碎甚至具有资产阶级特征的要求，无产阶级想使二月共和国做出的那些让步，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8]

但是无产阶级并不是1848年6月唯一不同的集团。在帮助镇压了工人之后，小资产阶级怀着恐惧发现，他们将自己送到了自己的债权人手中。当秋天颁布的新宪法并没有提供持续的解决办法时，它就被仍然赋予下层阶级的政治权力和保留给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力之间的矛盾弄得残废了：



这个宪法要使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

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却通过普选权使他们拥有了政治权力。而它批准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拥有旧的社会权力，却又剥夺了其维持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基础受到威胁。它向一些人要求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而向另一些人要求不要从社会的复辟退回到政治的复辟。^[9]

在马克思看来，12月总统大选中路易·拿破仑的绝对胜利，表明农民对富人共和国的反叛。因为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10]的唯一人物。但是拿破仑对于其他阶级也有吸引力。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的当选意味着拒绝资产阶级共和主义以及为自己六月失败复仇；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它意味着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统治；而对于大资产阶级来说，拿破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自己摆脱了联盟，他们曾经是迫于潜在的进步因素而加入这个联盟的。马克思做出结论说：这样，“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11]。

然后，马克思描述了1849年上半年议会和波拿巴的部署导致议会中较激进的派别以宪法来责难波拿巴的经过。当似乎只有波拿巴和议会中的保皇派大多数是宪法的权威解释者时，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走上街头，但是他们的反抗被镇压下去了。然后，马克思问，为什么工业资产阶级在1848—1849年没能扮演他们在英国扮演的那种进步角色。他的回答是：



在英国，——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敌手比较起来都是小资
产者，——我们确实看到工厂主，例如有个科布顿、有个布莱特带头对银
行和交易所贵族举行十字军讨伐。为什么在法国没有这种情形呢？在英国
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则是农业。英国工业需要
free trade [自由贸易]，而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
外还需要全国性的垄断。法国工业并不支配着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厂主
并不支配着法国资产阶级。他们为要捍卫住自己的利益，使之不受资产阶
级其他各集团侵害，就不能像英国工厂主那样站在运动的前头从而把自己
的阶级利益提到第一位上；他们必须跟随在革命后头，并为那些与他们阶

级的共同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务。在2月间，他们没有了解自己的地位，但2月已叫他们学乖了。究竟是谁最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胁呢，难道不是雇主，即工业资本家吗？所以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秩序党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完全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12]

马克思继续分析了反对党，即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并发现它跟秩序党一样是利益的联合。马克思特别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前者要求实行信贷制度、累进税制和对继承权的限制等，它是空论的社会主义（doctrinaire socialism），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成自身的自由历史运动，它就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达：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环节，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和阶级要求，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会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图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领导人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假装坚持社会革命的一个过渡点而反对另一个过渡点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共产主义周围，对此资产阶级自己发明了一个名字，把它叫做布朗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的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点，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13]

1850年秋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之后，马克思在前三篇文章的基础上又加上第四篇文章，语气更加沉静。这篇文章以评论未来的革命来结束了这一系列文章。革命并没有在某个时期发生，因为法国随着英国（这就像规律性一样）进入了繁荣时期。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有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现在，大陆秩序党的各派代表既纵情争吵又相互妥协，远远不能提供新的革命契机；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并且十分资产阶级化（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在这个基础上碰钉子。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像新的危机一样是确定无疑的。^[14]

马克思论当前法国政治的第二篇著作，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他最杰出的小册子。篇名暗示着拿破仑·波拿巴 1796 年的政变，而马克思意在考察路易·波拿巴 1851 年 12 月模仿性政变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篇著作第二版前言中，马克思将自己的方法比作由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和蒲鲁东就同一主题所写的另两部著名著作的方法：雨果将自己局限于痛苦和智慧的漫骂，而蒲鲁东试图将政变说成是以前历史发展的结果，以为政变的主人公作历史辩护而结尾。“相反，”马克思写道，“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15]。

马克思一开始论证就提到黑格尔的评论，即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了两次，并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的，而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的。两个波拿巴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继续写道：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变革自己和各种事物并创造某种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

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16]

然后，马克思将这种思考运用于1848年革命，并区分了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和19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前者的速度和光辉使它们是短命的，后者由于不断的打扰和自我批评而具有缓慢的彻底性。转向最近的政变时，马克思发现这个民族用来解释浑然不知的借口是不可接受的：



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17]

然后，马克思概括了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讨论的时期。波拿巴的成功在于他在“慈善会”的伪装下组织了巴黎流氓无产阶级，并担任他们的领袖。然而，这股临时力量还不得不与有利于波拿巴的长期因素作对照。第一个因素就是旧金融贵族，他们“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的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其中的原因是明显的：



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18]

工业资产阶级也把拿破仑看作能够结束近期骚乱的人。对于这个阶级来说，“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19]。当贸易情况良好的时候，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政治争论，生怕贸易受到打扰；当贸易情况不好的时候，他们就责怪政治环境的不稳定。1851年，法

国的确经历了一场不大的贸易危机，这场危机再加上不断的政治动荡，使商业资产阶级大喊“宁要以恐怖告终，而不要没完没了的恐怖”^[20]——波拿巴很理解这种叫喊。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深入考察了波拿巴政权的阶级基础。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似乎是不存在的：“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21]

这种解释是，革命已经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善，然后撤销它，现在它使行政权力完善了，然后就摧毁它。马克思概述了这种官僚的历史：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伊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22]

在1789年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官僚准备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在路易·菲利浦和议会共和国统治之下，国家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在波拿巴二世统治之下，“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23]。然后，马克思立即这样证明这一点，他说：“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24]因为小农居住的太分散了，他们利益的统一性并没有创造一个团体。这样：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25]

但是拿破仑所依赖的农民承担着抵押债务，这种债务的利益相当于全部英国国债每年的利息。除此之外还有赋税：



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26]

最后，军队便从农民青年的花朵堕落为“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27]。这样，在马克思看来，拿破仑一世三个主要观念——让农民拥有小块土地，征收赋税以支持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及从农民中招募庞大的军队——在路易·波拿巴的统治之下最终堕落了。然而，中央集权是必需的，并且它将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



打碎国家机器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制只是中央集权制低级和粗糙的形式，它仍然与其对立面，与封建主义相近。当对拿破仑复辟失望时，法国农民将不再相信对小块土地的拥有，建立在小块土地所有制之上的整个国家大厦将会坍塌，而无产阶级革命将获得响应，没有这种响应，在一切农民国家里，它的独唱将变成天鹅死前的哀鸣。[28]

可能重要的是，这一段落以及将中央集权作为进步因素的强调，在1869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中被删掉了。

[注释]

[1] MEW VII 55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605页)

[2] KMSW, p. 288. (此处所注出处有误且引文与中译本有所不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618页)

[3] MEW XXVII 1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188页)

[4] MEW I 118. (此处所注出处有误，据英文引文译出)

[5] KMSW, p. 2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11页)

[6] KMSW, p. 2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17页)

[7] KMSW, p. 29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20页)

- [8] KMSW, p. 29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36~37页)
- [9] KMSW, p. 29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48页)
- [10] KMSW, p. 29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50页)
- [11] KMSW, p. 29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50~51页)
- [12] KMSW, p. 29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91~92页)
- [13] KMSW, p. 29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104页)
- [14] KMSW, p. 29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114页)
- [15] MESW I 2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16] KMSW, p. 30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85页)
- [17] KMSW, p. 30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 [18] KMSW, p. 30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199页)
- [19] KMSW, p. 30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200页)
- [20] KMSW, p. 30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205页)
- [21] KMSW, pp. 315 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215页)
- [22] KMSW, pp. 315 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215页)
- [23] KMSW, p. 3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216页)
- [24] KMSW, p. 3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216页)
- [25] KMSW, p. 3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217~218页)
- [26] KMSW, p. 3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221页)
- [27] KMSW, p. 3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223页)
- [28] MESW I 340. (本段在中译本中不存在，此处据英文译出)

参考文献

译本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oscow, 1962) vol. I.

K. Marx, *Surveys from Exile*, introduced by D. Fernbach (London, 1973).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10.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oscow, 1962) vol. I.

K. Marx, *Surveys from Exile*, introduced by D. Fernbach (London, 1973).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oscow, 1962) vol. II.

评论

- D. Fernbach, introduction to K. Marx, *Surveys from Exile* (London, 1973).
- P. Hayes, 'Utopia and the Lumpenproletariat: Marx's Reasoning in *The Eighteenth of Louis Bonapart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0 (Summer 1988).
- J. Maguire, *Marx's Theory of Politics* (Cambridge, 1978) Ch. 4.
- F. Mehring, *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 (London, 1936).
- B. Moss, 'Marx and Engels on French Social Democracy: Historians or Revolutionari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6 (October-December 1985).
- V. Perez-Diaz, *State, Bureaucracy and Civil Society: 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Karl Marx* (London, 1978) Ch. 3.
- R. Price, *The French Second Republic* (London, 1972).
- I. Zeitlin, *Marxism: A Re-examination* (New York, 1967).

第六章

1853—1859 年



著 作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Revelations Concerning the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1853)]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 [*Articles in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1852—1862)]

《经济学手稿 (1857—1858 年)》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7—1858)]

《政治经济学批判》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

传 记

马克思的“流亡中的不眠之夜”实际上从 1853 年就开始了。19 世纪 50 年代早期，马克思一家的命运降到最低点。1852 年他的女儿弗兰西斯卡去世了。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蕙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1] 1855 年，当他八岁的儿子埃德加 (Edgar) 死去时，马克思遭到一生中最沉重的打击。几个月后，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说：“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像第一天那样的强烈。”^[2] 1856 年，由于继承了燕妮母亲的财产，经济状况改善了，他们从迪恩大街的公寓搬进梅特兰公园路 (Maitland Park Road) 租住的房子里。那是伦敦当时高楼林立地区的北郊。

这些年来马克思唯一固定的收入来源就是他每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篇或两篇文章。这是美国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激进报纸。其中一些文章，尤其是那些论述军事问题的文章是由恩格斯代写的。起先，他们讨论的是英国政治，但是很快就拓宽了讨论范围，将欧洲和国际状况也纳入讨论之列。这些文章写得很活泼，是这家报纸最具通俗性的版面之一。然而，马克思把自己的新闻工作主要看作是不务正业：“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3]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1852年底，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支部的领导人被捕，这实际上意味着同盟活动的终止，共产主义者同盟遂宣告解体。当他们遭到审判时，马克思花费了大量时间搜集证据，证明同盟只是一个秘密宣传团体，并不是真的要密谋推翻现政府。当法庭无视这些证据而对被告人判罪时，马克思以“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为题，发表了这些证据。

早在1851年，马克思就宣布即将出版一部多卷本的《经济学》。但是他发现很难将自己的材料整理成适合出版的形式，科隆审判的政治暗示使出版社在决定是否接受这本著作时很谨慎。直到1852年，马克思放弃了寻找出版社的努力，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不再从事经济学的研究。然而，1857年的经济危机使他重新焕发了热情。秋天，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被迫以谋生的工作来打发日子。我只能留出晚上的时间从事真正的工作，即使在这个时间里我还要受到疾病的打扰……我没有任何新闻，因为我过着隐士般的生活。”^[4]“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5]成果性的工作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6]。但是，马克思不能对他所编辑的700页潦草的稿子加以整理，只好将“初步的几章”，加上一个总的前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于1859年出版。就像以前的10年一样，马克思被国内的动乱和难民政治所打断，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经济学研究。

评 论

从1857年到1859年，从许多方面来说，这都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他写了四篇稿子，都各有特色：一篇是他为想要写的六卷本《经济学》

所写的“总导言”，一篇是后来命名为《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草稿，一篇是序言，以及一部著作的前几章——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Towards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 《总导言》

这篇文章本来是想作为《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导言的，但是并没有发表，“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7]。

三个部分之中的第一部分题目为“一般生产”。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将自己探索的主题定义为“社会决定的个人生产”^[8]。他拒绝像斯密、李嘉图和卢梭那样以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人作为出发点：“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9]然后，马克思指出，重要的是将一切生产所共有的一般因素孤立出来，以便不忽视时代之间的基本区别。像J. S. 穆勒这样的现代经济学家在试图将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描述为不变的社会规律时，他们都忽视了这一点。马克思引用了两个例子：像穆勒这样的思想家由没有所有制就没有生产这样的同义反复出发，草率地将一种特殊形式的所有制即私有制预设为基本的，而历史则将公有制指示为基本的。第二，有人倾向于假设，当前生产所赖以发生的法律体系是以永恒的原则为基础的，而没有意识到“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10]。马克思这样概括第一部分的内容：“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1]

第二部分的题目是“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在此，马克思意在驳斥这样的观点，即可以彼此孤立地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种经济活动。马克思首先宣布，在某种意义上说，生产与消费是一致的，因为人们谈论消费时要说生产性消费，而谈论生产时要说消费性生产；每一方事实上是产生另一方的手段；进一步来说，每一方都包含着对方的存在形式。马克思以类似的方式拒斥了这一观点，即分配形成一种与生产并列且外在于生产的独立领域。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领域——他在其中进行生产——的地位，因而分配先于生产”^[12]。民族征服或革命，以其财产分配，似乎也是先于和决定生产的。与此相似的是交换，在马克思看来，交换看起来是生产的构成部分。“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

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的不同方面。”^[13]

第三部分的题目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并且非常抽象。马克思希望树立这样的观点：讨论经济学的正确方法是，从价值或劳动这样的简单抽象概念出发，并由此扩大到人口或阶级这样的更大的经济观察实体。相反的情况是17世纪的特征；但是下一个世纪的思想家则遵循了“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14]。

然后，马克思将货币和劳动作为简单抽象概念的例子，他希望以此展开自己的分析。他宣布，这两者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语境下思考的人才有望理解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正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5]。马克思继续写道：“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16]。然后，马克思以五个部分概括了自己的《经济学》的尝试性计划，在结尾时讨论了这一问题，即在与产生希腊艺术的社会经济背景迥然不同的19世纪，希腊艺术为什么大受赞赏。

2. 《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手稿》的两个部分是“货币章”和“资本章”，其他一些小标题也让人以为是严格的经济学论文。但是，实际内容比标题所暗示的要广泛得多。有意思的是，正如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实际所做的那样，《手稿》一开始就是对其他人思想的批判：当马克思通过抨击其他人来得出自己的观点时，他总是很高兴。《手稿》开头的几页批评了改革主义经济学家凯里（Carey）和巴师夏（Bastiat）。马克思颇具文采地说，他们分别为19世纪中期的美国人和蒲鲁东的信徒注入了邪恶（和道德）。但是在10来页之后，马克思写道：“进一步追踪这种废话是不可能的。”凯里和巴师夏被“放弃”了，而马克思在一些不重要的思想上磨砺了自己的工具之后，便继续开辟自己的道路。手稿的杂乱特性、所讨论主题的多样性和风格的高度浓缩，使人们很难对这些内容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概述，更难以对其进行解释了。

然而，有些东西看上去很显眼。首先，与1844年手稿保持一种风格和思想的连续性，两部著作最明显地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如果1844年手稿是黑格尔主义的，那么《手稿》恰恰也是如此。异化、对象化、占有、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的一般本质或社会本质等概念，都同样出现在1858年。在

《手稿》开始的部分，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进行了以下评论，这种评论让人完全想到他在1844年对货币具体化的评论：



经济学家们自己说，人们信任对象（货币），而作为人并不互相信任……货币只能拥有社会属性，因为个人已经异化了自己与一件东西的社会关系。^[17]

或者在以后的部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



但是，如果资本这样表现为劳动产品，那么劳动产品也表现为资本——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产品，不再表现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表现为资本；对象化的劳动变成主人，对活劳动发号施令。它同样表现为劳动的结果，它的产品表现为相异的财产，一种与活劳动相对立的独立的存在方式，一种等量的价值；劳动产品，即对象化的劳动，作为一种相异的力量从活劳动中获得自己的灵魂。如果从劳动的立场来考察的话，那么劳动就表现为生产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其方式是：它将客观条件下自身的实现作为相异的事实而加以拒斥，并且它将自己置于非物化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是由于反对这一事实的需要而获得的，而这一事实是与它相异的，并且不属于它而是属于别的东西）的地位上；它将自己的事实不是树立为它自己的实体，而是为别的东西将自己存在的事实树立为实体，这样也就将自己存在的事实树立为别的东西的实体，或者树立为与自己相对立的其他实体。^[18]

在这方面，《手稿》中最显著的一页就是为《经济学》草拟的计划，它所用的语言可能就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

但是还存在显著的不同。1844年，马克思就已阅读了一些经典的经济学家著作，但是还没有时间将这些知识融入对黑格尔的批判之中。结果，1844年手稿就分成两个部分，正如原编辑者所加的题目——“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表明的那样。到了1857—1858年，马克思已经吸收了李嘉图和

黑格尔（有意思的是，《手稿》里并没有提到费尔巴哈）的思想，并且他已经可以进行自己的综合了。按照拉萨尔的话来说，他是“一位黑格尔倾向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倾向的社会主义者”^[19]。

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手稿》包含着对马克思成熟理论的第一次详细论述。此处有两个关键的重点变化。首先，马克思现在不是像他以前那样分析市场的交换机制，而是从考察生产开始。其次，他现在说，工人出卖的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这两点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剩余价值理论。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不是由交换创造的，而是由这一事实创造的，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发展使资本家能够享有工人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并以此生产出远远超过这种劳动能力交换价值（仅仅等于工人生存所需的食物）的价值。事实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所有因素都在《手稿》中得到详细论述了。但是，既然这些因素在《资本论》中以大量的篇幅得到论述了，那么《手稿》更有意思之处就在于马克思在其宏大的事业中没有再次继续发展的那些论述。

因此，《手稿》为马克思的异化图景新增加的理论就是，马克思试图将它深深植根于历史之中。资本（同时也是明显的“异化力量”）完成了非常积极的使命。在短短的时间里，它就迅速发展了生产力，以历史创造的需要取代了自然需要，并产生了世界市场。因此，它是过去的局限性和未来难以预测的财富之间的转折点：



这种生产的全面性虽然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异化，但是也首次产生出个人的关系和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的关系的丰富性，并且还没有把这种关系作为同他自身对立的权力和独立的社会关系来确立。试图复归于那种原始的丰富性是可笑的，因为这等于相信那种原始的丰富性的彻底消耗具有连续的必然性。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20]

资本主义产生的思想就像资本主义本身一样是暂时的：在此，马克思表达了自己对“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最简洁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尽管自由竞

争在资本主义初期是必需的，但是它最终必定会阻碍它的发展。以此，马克思暗示：



将自由竞争看作人类自由的最终发展是荒谬的；将对自由竞争的否定看作对个人自由以及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产品的否定，也是荒谬的。我们只关心有限基础上的即资本统治基础上的自由发展。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对所有个人自由的最完全的压制，并使个性完全服从于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采取物质力量的形式，甚至采取独立于有关个人的压倒性对象的形式。关于自由竞争是什么的发展，唯一合理地回答了中产阶级预言家对它的神化或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混淆。如果说，在自由竞争的限度内，个人通过追求纯粹的自身利益而实现了他们的社会或总体利益，那么这仅仅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他们将压力彼此强加于对方，他们之间的冲突只能再次使他们有条件发生相互作用。而且，这个幻想——竞争是自由个性的虚假的绝对形式——一旦破灭，这就证明竞争的条件，即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已经被感觉和认为是一种阻碍了，因为它们的确已经是这样了，并将更加变成这样。自由竞争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后形式，因而是人类自由的最后形式这种断言，意思只是说，中产阶级的统治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当然，这是昨天的暴发户们非常乐观的想法。^[21]

这种丰富的历史内容意味着，与马克思达到自己哲学和经济学思想的综合之前相比，《手稿》在继续探讨《巴黎手稿》的核心主题时，论述这些主题的方式更加“成熟”了。

理解资本主义矛盾本质（以及它为非异化社会所包含的可能性）的关键，就是时间观念。“所有经济学，”马克思说，“都可以还原为对时间经济学的最终分析”。资本主义利润就建立在剩余劳动时间的创造上，然而同时，资本主义财富把人们从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资本本身是“永恒的革命”：



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

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2]

但是，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导致它的解体。它的财富是建立在机器的引进基础上的，而机器的引进是跟随在自动化的引进之后的（马克思在此的预见是非凡的），这就导致劳动在社会财富生产中所起的日益减少的作用与资本主义剥削剩余劳动的必然性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这样，资本既有着巨大的创造性，又有着巨大的浪费性：



资本是体现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努力将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将劳动时间确立为财富的唯一手段和源泉。这样，它减少必要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劳动时间的剩余形式；因而，它日益将剩余劳动时间确立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

一方面，它带来了科学和自然的所有力量，以及社会合作和商业的所有力量，为了创造相对独立于所用劳动时间的财富。另一方面，它试图以劳动时间来衡量这样创造的大量的社会力量，并将它们限制在所需的狭隘范围内，以便保存作为价值早已被创造出来的价值。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社会个性发展的两个不同方面——只表现为资本的手段，并且只是使其从狭窄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的一种措施。但是，事实上，它们是摧毁这种基础的物质条件。^[23]

像这样的段落充分清楚地表明，像劳动价值理论这样的明显纯粹的经济学原理并非凯恩斯或熊彼特所理解的经济学原理。把马克思当作一般的经济学家来阅读，在某种程度上必定误解他的思想。正如他本人在1844年早期所宣布的那样，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学和伦理学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手稿》表明，无论他早期的著作还是晚期的著作都是这样的。

在这种状态下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引导人类发展的力量将被机器完全接管，从而排斥人类：



这样，科学在机器中表现为与工人相异的、外部的东西：活劳动被纳入独立活动的对象化劳动之下。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由资本的需要所决定的，工人似乎就是多余的。^[24]

在自动化时代，科学本身是造成异化的最大因素：



工人的活动（仅限于抽象意义上）在所有方面是由机器的运动所决定和管理的，而不是相反。促使机器的无生命部分以其结构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正常工作的知识，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却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机器本身的动力，通过机器对工人产生作用。^[25]

但是，生产力的巨大扩张并不必然带来个人的异化：它提供了机会，使社会变成由“社会的”和“普遍的”个人（与《巴黎手稿》中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个人相类似）所组成的社会。马克思这样描述了从个人向社会生产的过渡：



因此，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崩溃了，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发现自己被剥掉贫穷化的、对立的形式。然后，个人可以自由发展。不再有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到最低限度的问题。这种降低的结果是，由于所有人都享有自由时间，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发展自己的艺术、科学等教育……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太局限于他们关于一个阶段上社会历史发展的传统观念了，以至于在他们看来，社会劳动力对象化的必然性与其异化（与活劳动相关）的必然性是不可分割的。

但是，由于活劳动丧失其直接的、个体的特征（无论是主体性的还是完全外部的），由于个体活动变成直接一般的或社会的活动，生产的物质因素就丧失了这种形式的异化。这样，它们作为财产，作为社会有机体被生

产出来，在其中，个体作为个体被再生产出来，不过他们是作为社会个体被再生产出来的。

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在他们的生产性生活过程中，他们这种存在状态的条件，只能由历史的经济过程所确立：这些条件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它们只是同一条件的两种不同的形式。^[26]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手稿》中，这种转变的动因，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从没有被提及。

马克思在《手稿》中几乎令人作呕地回到“普遍个体”这个概念。它是马克思版本的乌托邦的核心；就像在《巴黎手稿》中一样，此处同样清晰地以千禧年降福的方式把共产主义颂扬为“历史之谜的解答”。马克思说，内在于资本中的普遍趋势创造了



生产力的发展，也即一般财富的发展，并将其作为基础，这种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趋势具有一般本质的性质，同时创造了普遍商业，这样就创造了世界贸易，并将其作为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体普遍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个体的现实发展，是对每一个被设想为界限而不是神圣边界的界限持续不断的破坏。个体的普遍性不是被思考或想象出来的，而是个体的真实和理想关系的普遍性。因此，人们就能将自己的历史理解为过程，并将自然（也包括对自然的控制）设想为自己真实的身体。发展过程本身被确立起来，并被理解为前提条件。但是，必要和首要的情况是，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应该成为生产的条件，而不是确定的生产条件被树立为一种边界，超出这个边界生产力就不能发展。^[27]

马克思很少讨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形式，对他而言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他愿意将自己暴露于“唯心主义”的指控之下，即编造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基础的思想。与《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处于马克思预言的核心）中的著名段落相比，《手稿》中的某些段落表达了更好的思想。核心因素之一就是时间，因为“普遍个体”的发展首先依赖于他所支配的自由时间。在马克思的乌托邦中，时间具有本质的特征：



如果我们假设了公共生产，时间的决定性当然就是基本的。为了生产小麦、牛等等，耗时少的社会就要求比其他形式的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使用更多的时间。对于单个个体来说，他的发展、他的享受和他的活动的普遍性就依赖于节省时间……

根据公共生产，第一个经济学规律就是时间的节省，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时间的系统分配。这个规律的确变得更重要。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根本不同于以劳动时间来衡量交换价值。参与同一活动部门的不同个体的工作，以及不同的劳动，不仅在量上是不同的，在质上也是不同的。事物之间仅仅是量的区别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事实上，它们的质是相同的。这样，只有它们具有相等的和同一的质，时间的单位才可以从量上来衡量。^[28]

这种自由时间完全是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在过去，机器是与工人相敌对的力量；在未来，它的功能将彻底改变：



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把从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那么，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作为活劳动的异己的财产和敌对的力量，才能产生出来；换句话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是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要素。但在第一种场合，机器的分配，也就是它们不属于工人这一情况，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在第二种场合，改变了的分配将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29]

马克思拒斥亚当·斯密将工作看作一种必要强制的观点。但是他不同意傅立叶的这一思想，即工作可以成为一种游戏。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的观点真实反映了劳动



并没有创造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当它放弃了田园生活的条件时，它就丧失了这些主观和客观的条件），这些主观和客观条件可以使劳动变得有吸引力并能达到个人的自我实现。这并不是说，像傅立叶以女店员为例所表达的那样，可以将劳动变成只是一种玩笑，或娱乐。真正自由的劳动，比如说作曲，是非常严肃的，并且要求花费很大的努力。与物质生产相关的劳动只有（1）具有社会本质，（2）具有科学特征，同时是总体的工作时，也就是说如果它不再以人类努力被实现为确定的、经过训练的自然力量，并且（不再仅仅是自然的、原始的力量）变成主体在生产中控制所有自然力量的活动时，它才具有这种特征。^[30]

马克思展望这样一个时代：那时，生产不是依赖于雇佣劳动的数量，而是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总体水平；那时，对财富的衡量是雇佣劳动时间和产品大小之间的极不成比例；那时，“人们作为生产过程的监控者和管理者”。到那时，人类的真正解放才会发生：



在这种重新定位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支柱的东西既不是工人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他的工作时间，而是对他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他对自然的理解和将自然当作一种特殊力量所进行的控制；总之，是社会个体的发展。

对他人劳动时间的占有（今天，财富就依赖于此），与重工业本身所创造的新发展的基础相比，似乎是一种痛苦的基础。

一旦劳动（以其直接的形式）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源泉，那么劳动时间就不再而且必然不再是衡量的标准，这样交换价值就必然不再是使用价值的衡量标准。少数人的不劳动不再是总体人类精神力量的发展条件，同样，大众的剩余劳动也就不再是总体财富的发展条件。^[31]

这样，在《手稿》中，启发马克思的预言所具有的本质至少被勾勒出来了：在公共生产中，工作质量决定其价值；随着交换价值的消失，货币也会

消失；自由时间的增加为个体的普遍发展提供了契机。

3. 《政治经济学批判参考文献》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一开始就列出了将涵盖他的《经济学》的六个卷目：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这些著作的“全部材料”，马克思写道，“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32]。

接下来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自传，马克思强调了他在《莱茵报》从事新闻工作的重要性，这使他洞察到“物质利益”和“经济问题”的重要性。然后，他就退回到书宅，考察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这种隐退的结果是：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将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称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33]

然后，马克思以其著名的和经常被引用的段落，总结了他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这个总结包含四个要点：

(i) 生产关系的总和——人们组织社会生产的方式和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构成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现实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

(ii) 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将超出生产关系，并且生产关系将成为桎梏。这个阶段为社会革命时期开辟道路。

(iii) 在旧的社会秩序消失之前，这些生产力不得不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下尽最大可能地发展。

(iv) 可以将亚细亚的^[34]、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看作社会经济组织的几个演进时代。那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最后一些创造分裂社会的生产关系，随着它们的结束，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也将

结束。

马克思增加了一些更具传记色彩的细节，将他的观点描述为“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最后引用但丁反对精神妥协的话作为结束。

这篇《序言》之后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只是“一些初步的章节”。事实上，一章是论商品的，一章是论货币的。由于商品和货币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在《资本论》中以大量篇幅来讨论，对马克思此处观点的描述可以留到下一章进行。

[注释]

[1] MEW XXVIII 1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8卷，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2] Ibid. 6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8卷，626页)

[3] MEW XXVIII 59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8卷，599~600页)

[4] MEW XXIX.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527~5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Ibid., p. 2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19页)

[6] Ibid., p. 5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546页)

[7] KMSW, p. 338. (此处所注出处有误，应为 p. 3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7页)

[8] KMSW, p. 34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KMSW, p. 3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21页]

[10] KMSW, p. 3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25页]

[11] KMSW, p. 3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25页]

[12] *Marx's Grundrisse*, ed. D. McLellan (London, 1971) p. 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33页]

[13] KMSW, p. 35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36页]

[14] KMSW, p. 3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38页]

[15] KMSW, p. 3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43页]

[16] KMSW, p. 3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45页]

[17]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rlin, 1953) p. 78. (此段引文中译本中不存在，据英文引文译出)

[18] K. Marx, *Grundrise*, p. 10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450页]

[19] Lassalle to Marx, 12, May 1851.

[20] K. Marx, *Grundrise*, p. 7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109页]

[21] KMSW, p. 37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160~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2] KMSW, p. 3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393页]

[23] KMSW, pp. 380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19页]

[24] KMSW, p. 37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11页]。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马克思说，他认为自动机械的原始模式就是钟表。马克思从恩格斯那里了解到关于自动纺纱机的大量信息(以及工厂生活的其他方面)。在这些实际问题上，他经常请求恩格斯的帮助。他向自己的朋友坦白：“我理解数学定律，但是对于最简单的技术事实(在此，观察是必需的)，我就像一个最不学无术的人一样迷惑不解……”(MEW XXX 320)

[25] KMSW, p. 37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08页]

[26] KMSW, pp. 380, 38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18、361页]

[27] K. Marx, *Grundrise*, pp. 121 f.

[28] KMSW, pp. 361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120页]

[29] KMSW, pp. 385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362页]

[30] KMSW, p. 36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113页]

[31] KMSW, p. 38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18页]

[32] KMSW, p. 3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7页)

[33] KMSW, p. 38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8页)

[34] 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散见于他的各个著作中，详情可参见：L. Krader,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Assen, 1975); U. Mell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London, 1977)。

参考文献

译本

Selections from Journalism

K.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ed. S. Avineri (New York, 1968).

K. Marx, *Surveys from Exile*, introduced by D. Fernbach (London, 1973).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Grundrisse)

Marx's Grundrisse, ed. D. McLellan (London, 1971) (Selections only).

K. Marx, *Texts on Method*, ed. T. Carver (Oxford, 1975) (contains *Grundrisse* introduction).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8 (London, 1985).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K. Marx,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I. Stone (Chicago, 1904).

K. Marx,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ed. M. Dobb (London, 1971).

The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is also available in the *Moscow Selected Works*, McLellan *Selected Writings* and other anthologies.

评论

T. Carver, introduction to K. Marx, *Texts on Method* (Oxford, 1975).

R. Daniels, 'Fate and Will in the Marxian Philosophy of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60).

V. Kiernan, 'Marx and India',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7).

L. Krader,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Assen, 1975).

A. Lallier, *The Economics of Marx's Grundrisse: An Annotated Summary* (London, 1989).

G. Lichtheim, 'Marx and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Karl Marx*, ed. T. Bottomore (Englewood Cliffs, 1973).

E. Mandel, *introduction to Marx's Grundrisse* (London, 1971).

S. Moore, 'Marx and the Origin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quiry* (Autumn 1971).

M. Nicolaus, 'The Unknown Marx', *New Left Review* (1968).

M. Nicolaus, introduction to K.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A. Oakley,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tellectual Sources and Evolution* (London, 1984).

J. Plamenatz, *German Marxism and Russian Communism* (London, 1954).

A. Prinz, 'Background to Marx's Preface of 1859',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69).

R. 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1977).

M. Sawyer, *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The Hague, 1979).

D. Sayer, *Marx's Method* (London, 1979) Ch. 4.

J. Seigel, *Marx's Fate* (Princeton, 1978) Ch. 10.

L. Seve, *Man in Marxist Theory* (Hassocks, 1978) Pt. 2.

F. Tökei, *Essays on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Budapest, 1979).

H. Uchida, *Marx's Grundrisse and Hegel's Logic* (London, 1988).

R. Weiner, 'Karl Marx's Vision of America: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Sketch',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2 (October 1980).

第七章

1860—1879 年



著 作

《福格特先生》 [*Karl Vogt* (1860)]

《剩余价值理论》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1862—1863)]

《资本论》第三卷 [*Capital*, vol. III (1865)]

《工资、价格和利润》 [*Wages, Price and Profit* (1865)]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1865)]

《资本论》第一卷 [*Capital*, vol. I (1867)]

《资本论》第二卷 [*Capital*, vol. II (1869—1879)]

传 记

马克思没能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继续下去，因为他用1860年一整年的时间来答复卡尔·福格特(Karl Vogt)对他本人和他的“政党”发起的攻击。他唯一的财务来源仍然是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数量越来越少)。在福格特事件上，查尔斯·德纳写信支持马克思说：“你不仅是最有价值的撰稿人之一，还是最好的有偿撰稿人之一。”他唯一的判定就是，马克思“表现得太关心德国的统一和独立了”。内战的开始意味着马克思完全停止给报纸写稿了。1861年，他前往荷兰，说服叔父将他母亲的财产预付给他，然后继续到德国，与拉萨尔商讨恢复他的普鲁士公民身份并在柏林共同创办一份报纸。这两项计划都失败了。

还是在1860年，马克思回到他的“第三章”，并在次年4月写信给拉萨尔说：“关于我的书，两个月是完成不了的。为了不至于在去年饿肚子，我不得不做最可鄙的工作，并经常连续几个月不能写东西了。另外，我的特点是，如果我看到有些东西是在四周左右以前完成的，我就发现它令人很不满意，并彻底重做。无论如何，这本书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丧失什么。”同年，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这件事对他的家庭生活的影响：“我妻子每天都告诉我说，她希望她和孩子们都死掉，而实际上我不能反对她，因为我们忍受的羞辱、折磨和恐惧其实是无可名状的。”这些麻烦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唯一一次发生严厉争执的起因。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对玛丽·白恩士（Mary Burns）——恩格斯事实上的妻子——的去世极为冷漠。由于拉萨尔非常成功地组织了德国工人，马克思的沮丧愈加强烈。马克思认为，拉萨尔对俾斯麦采取了太多的调和态度，在1862年拉萨尔到伦敦拜访马克思时，这种意见分歧导致了他们的决裂，这种决裂持续到1864年拉萨尔的去世。

1864年，马克思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他母亲去世后给他留下400镑，而按照他的朋友威廉·沃尔弗（Wilhelm Wolff）的遗嘱，他又得到两倍于这个数目的款项。马克思一家搬到位于哈弗斯托克小山（Haverstock Hill）的更宽敞的房子里。同年，国际成立，此项工作“像梦魇一样压到我身上”，而马克思认为，与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相比，这只具有次一级的重要性。

1866年，马克思最后决定开始《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草拟。尽管遭受着失眠、疾病和重新负债的痛苦，他还是在1867年4月设法完成手稿，并亲自到汉堡，将手稿送给出版商。马克思写道，这部著作



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嘲笑所谓“实际”的人们及其智慧。如果一个人甘愿成为牛，他自然就无视人类的痛苦，而只照顾自己的皮毛。但是，如果在写完我的书，或至少写完我的手稿之前，我随时准备屈服，我的确甘愿自视为“不实际的”人。

当他在8月改正了最后的校样之后，他写信给恩格斯说：



我只感谢你使这一点成为可能！没有你为我做出的牺牲，就不可能完成三卷著作的艰巨劳动。我满怀感激地拥抱你！

9月，《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出版了一千册。

评 论

理解《资本论》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基本上说，马克思写作《手稿》的时候，就考虑将自己的《经济学》分为六卷，第一卷就定名为《资本》。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这卷书的第一次分期发表，并将以“论一般资本”那一部分作为结束。马克思在这一部分上的写作被1860年他与卡尔·福格特的争论所打断，当1861—1863年马克思开始写作这一部分时，他发现（他常常是这样）他已写出了大量的手稿（大约3000页的打印稿），这部手稿很难出版。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历史性的，讨论的是过去的价值理论；实际上，考茨基（Kautsky）在1905年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出版了这部手稿，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自1863年以后，马克思从事《资本论》三卷书的写作，这些是实际上出版的著作。^[1]第三卷主要写作于1863—1865年，在最后起草第一卷之前。至于第二卷的手稿，马克思是在最后起草第一卷之前和之后写作的。这样，尽管第一卷已完成了，但是本来打算随后完成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没有完成；整部著作之后将是其他的著作。

在这项艰巨的任务中，马克思生前所完成的唯一部分——《资本论》第一卷——包括两个很不相同的部分。前九章极具抽象性质，而其余部分则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有些地方写得非常生动，可读性很强。

不仅这种抽象的方法使前面的几章非常难读，而且其中还有黑格尔特色。在德文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解释说，他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是通过将其颠倒过来，在“神秘外壳”内部发现“合理内核”的。^[2]在同一篇跋中，他说他甚至是极力“卖弄黑格尔所特有的表达方式”。使《资本论》开头部分难读的第三个因素是，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对于19世纪中期的经济学家来说相当熟悉，但是随后就为正统的经济学派所放弃。自从19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开始，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已转而通过假设私有制、利润以及或多

或少的自由市场，来考察给定的资本主义体系，构建其模型，并在只考虑价格的情况下，来探讨这个模型的功能。这个“边际主义”经济学派没有与价格不同的价值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方法是肤浅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他之所以认为它在表面意义上是肤浅的，是因为它只是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生产方式。第二，这种方法把资本主义体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而马克思希望分析“给定的社会有机体的产生、存在和灭亡以及它被另一个更高的秩序所代替的情况”。

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马克思沿用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这些概念仍然是被广泛接受的经济分析工具），并运用这些概念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结论。李嘉图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做了区分。一个物品的交换价值与其价格不同，它是由体现于生产物品的劳动数量所构成的。当然，李嘉图认为，价格实际上趋向于交换价值。这样，与后来的分析不同，一个物品的价值是由生产环境来决定的，而不是由需求环境来决定的。马克思沿用了这些概念，但是在试图表明资本主义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历史上相对的阶级剥削体系时，他通过引入剩余价值概念来取代李嘉图的观点。剩余价值被定义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和生产劳动力（也就是劳动者的生存）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因为劳动力的交换价值等于为生产这种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的数量，这通常比这种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的交换价值低得多。

第一卷的理论部分很容易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重写了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外部对象的意义上，分析了商品及其价值。马克思确立了两种价值：交换价值，即某种东西的有用性；交换价值，由注入对象中的劳动数量所决定。劳动也具有二重性，因为它既能创造使用价值也能创造交换价值。既然“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东西”^[3]，并且它们唯一共有的东西就是劳动，那么劳动必然是价值的源泉。但是，显然有些人比另一些人工作得更快或更熟练，所以这个劳动时间必然是一种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接下来的是难懂的论价值形式的部分，第一章结尾是描述了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马克思将其说成是“商品拜物教”。这个段落让人想到在《巴黎手稿》甚至是在《关于詹姆斯·穆勒的笔记》(Note on James Mill)中对异化的描述。在此，马克思说：“要找一个譬喻，我们必须求助于宗教世界的幻境。在那里，人脑的产品，好像是赋有生命，互相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存在物。在商品世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4]

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章讨论了交换并描述了作为商品流通手段的货币，它

是商品价值的物质表现和价值的一般尺度。

第二部分是讨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一小部分。在资本时代以前，人们出卖商品得到货币是为了购买更多的商品。在资本时代，人们不再是为了购买而出卖，而是购买是为了卖得更贵一些：他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是为了通过这些商品增加货币。

在第三部分，马克思引入剩余价值概念，恩格斯将这一思想说成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中的主要发现。^[5]马克思区分了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和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前者是“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对此，马克思说：“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6]这种变化就是剩余价值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就是围绕它而展开的。基本的一点是，与仅仅足以在生产中体现其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时间相比，资本家让工人工作更长的时间：如果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是一天4镑（大约是维持其生存和健康的价值）而工人工作8小时体现在产品中的价值是4镑；那么，如果他工作10小时，最后两小时生产的就是剩余价值——在这个例子中是1镑。

接下来，马克思这样详细论述了这种剩余价值的本质：



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7]

这样，剩余价值只能产生于可变资本，而不是不变资本，因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如果用 v 代表可变资本， c 代表不变资本， s 代表剩余价值，

那么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的三个重要比例就是： c/v 是“资本的有机构成”； s/v 是剥削率； $s/(c+v)$ 是利润率。简单来说，马克思认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随着机器的引进，劳动时间将会缩短，这样就会创造较少的剩余价值。当然，机器会增加生产，而殖民地市场会吸收一些剩余价值，但是这些只是减轻剂，而最终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这前九章由一个对资本主义起源所做的细致的历史描述来补充，此处比在任何其他著作中更好地说明了马克思的方式和方法。马克思尤其率先使用了他所得到的、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官方统计信息。如果有读者发现《资本论》的开头部分太沉闷，最好还是遵循马克思对库格曼夫人(Mrs. Kugelmann)^[8]的建议，从“工作日”、“机器和大工业”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三章开始读起。在“工作日”这一章，马克思详细描述了在有害健康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对男人、女人和儿童所造成的“肉体和精神退化”^[9]，以及与此有关的痛苦斗争。这种斗争试图通过对工作时间的数量加以法律的限制并通过工厂法案，来获得某种缓和。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尽管看起来好像是资本家和工人在自由市场上交换契约，但实际上则是单方面的交易：



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10]

在《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马克思继续对资本主义进行控告，描述了机器对工人的损害以及资本主义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11]然而，在总结自己的结论时，马克思表明，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的观点并非完全是否定性的：



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的技术必然性和内在于资本主义形式之下的社会特征之间的这个绝对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稳定和保障，怎样通过夺走劳动工具不断威胁着从他手中夺走生活资料，通过压迫他的各项身体功能不断威胁着使他变成多余人；我们已经看到，在创造畸形即工业后备军（使之处于痛苦之中以便总是听从资本的支配）的过程中，在不断从工人中选出牺牲品的过程中，在最大限度地盲目浪费劳动力的过程中，以及在社会无政府状态（它将任何经济进步都变成社会灾难）所引起的毁坏过程中，这个对立怎样肆无忌惮地发威施暴。这是消极方面。但是，如果说一方面是劳动的变换现在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强行实施，那么另一方面，大工业又以其灾难迫使人们必须认识到，工作的变换最终要适应变化了的工作，最终要尽最大可能发展变化了的才能，这是一条基本的生产规律。对于社会来说，使生产方式适应这条规律的正常作用，已变成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的确，在死刑的威胁下，大工业迫使社会以全面发展的个人（他适应于各种劳动，随时可以面对任何生产的变化，对于这种人来说，他所执行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功能只不过是以许多种方式使他自由发挥自己的自然的和所要求的能力而已），来取代今天只承担单项工作的工人（这种人因终生只重复一项且同样乏味的操作而遭受摧残）并将他们降低为人类的废物。^[12]


第一卷以“资本主义积累”这一长篇大论的部分作为结束。这是本书最绝妙的一部分。资本家成为“积累激情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冲突”的牺牲品，被迫创造“产业后备军”或由暂时的失业工人所组成的巨大蓄水池，来应付市场的变动。以下是马克思的长远预言：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


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3]

马克思以响亮的宣言综合自己的分析：



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这个规律总是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保持平衡，它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它确立了贫困的积累，以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4]

这种判断得到一系列详细研究的支持，这就是对过去20年英国工人阶级、英国农业无产阶级以及爱尔兰的痛苦状况的研究。这部著作以下面这一著名的段落结束：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5]

后面的两卷，还只是草稿，缺乏第一卷光彩夺目的神韵。但是，这里有一个长篇章节，名为《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看来马克思是想把这一章放在

第一卷的结尾，但是在最后还是压下来了。在这一章里，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在整个过程中是如何再生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关系的。此处特别有意思的是对异化和资本主义趋势的评论。异化是包含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中的；而资本主义的趋势是：在生产领域“尽可能减少挣工资人的数量”，而在纯服务企业中增加工人的数量。^[16]

第一卷讨论的是生产，而第二卷和第三卷考察的是，当资本家出售他的产品获得金钱时，在工厂之外发生了什么。在第二卷中，马克思描绘了销售、利润和为下一个生产过程再投资的循环运动，以及潜伏在经济危机之下的复杂因素。由于这一卷具有技术理论的特点，所以它非常没有意思。


第三卷第一部分多少有点像最后一稿，但是此后这本书逐渐接近尾声，却并没有最后结论。这一卷首先讨论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以及价值和价格的关系。许多阅读了第一卷的人曾经问道，以下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来衡量的，它们就应该与市场价格非常不同。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转化难题”。特别是，假定不同的企业有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人们就希望将投资转移到有着最大劳动成本因而有着最高利润的企业。最终，不断的竞争就会将这个企业的利润率降下来，而平均利润率就会在整个经济中确立起来。但是，这种价格的变化似乎暗示着，相对价格并不反映相对劳动成本，而价值理论并没有解释真实的生产现象。对此，马克思提供的唯一答案就是这样的断言：价值是“价格变动所围绕的重心，围绕这个重心价格的升降趋向一种平衡”，尽管个别商品的价格或许不同于它们的劳动价值，但是事实上，整个价值等于整个价格。^[17]他继续写道：“不管价格是怎样调节的，结果总是这样：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因为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18]但是，这种价值规律的优势是非常近似的：“一般价值规律只有以非常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现行的趋势起作用，作为不断变动的永远不可确定的平均值起作用。”^[19]然后，马克思比在第一卷中更详细地解释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构成了第三卷的核心。马克思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达了这个规律：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也是其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一般平均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凝结在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之中的物化劳


动的量相比,是不断减少的。所以,这种活劳动中物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投入的总资本的数量和价值相比,也必然是不断减少的。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20]

然后,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危机的本质。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要扩大生产而不考虑消费水平,但正是消费水平决定着这种扩大生产的活动是否可行。马克思就追溯了这个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是为资本而进行的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不仅仅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运动,这些限度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促使生产为自身的目的而趋向于无限度的扩大,趋向于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所使用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21]

结论是:



所有真正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生产力的趋势相对比的大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而资本主义生产只能以整个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为限制。^[22]

然后,马克思分析了能够减缓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主要是增加剥削,可变资本降价,人口过剩以及对外贸易),并试图表明,这些因素只是短期的减轻剂。^[23]接下来的是论生息资本和地租的两个部分,本卷以论阶级的、极不完整的一部分作结束。还没有人“不同意”《资本论》中的理论假设或长远预言——但愿是因为它们不易被最终驳倒:劳动价值理论被认为是洞察了资本

主义体系运行机制的理论。马克思的著名预言只是建立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抽象模型基础上的，而这个模型在一定条件下几乎可以无限地变化，并且像所有模型一样，它必然被评价为毫无成果。然而，内在于劳动价值理论之中的困难——尤其是提到转化难题和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时——使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常常被称为“新李嘉图派”）以纯数量的方式来重述马克思的理论。

[注释]

[1] 这些著作包括名为《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重要部分，它本来是为《资本论》第一卷而写的，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版。它现在是作为Penguin/Viking英文版的附录。

[2] K. Marx, *Capital* (Moscow, 1954) I, 19 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Ibid., p.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50页)

[4] Ibid., p. 7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89页)

[5] Cf. F. Engels, *Anti-Dübring* (Moscow, n. d.) p. 28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 K. Marx, *Capital* (Moscow, 1954) I, 20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235页)

[7] Ibid., p. 217. Cf. also vol. I, ch.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243~244页)

[8] K. Marx to L. Kugelmann, MEW XXXI 575 f.

[9] K. Marx, *Capital* (Moscow, 1954) I, p. 2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274页)

[10] Ibid., p. 3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334~335页)

[11] 在这个论点上比较 K. Marx, *Capital* (Moscow, 1954) I, p. 506.

[12] Ibid., pp. 487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534~535页)

[13] Ibid., p. 6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707页)

[14] Ibid., p. 64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708页)

[15] Ibid., p. 763. 这个段落之后，接下来的是讨论殖民化的简短一章。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怕以这种响亮的口气作结束会引起书报检查官的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831~832页)

[16] 这个手稿现在是作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本Penguin版的附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7] K. Marx, *Capital* (Chicago, 1909) III, 21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8] Ibid., p. 2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200页)

[19] K. Marx, *Capital* (Moscow, 1971) III, p. 161. 详情尤其可参见: R. Meek, 'Some Not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in *Economics and Ideology* (London, 1967); D. Laibman, 'Values and Prices of Produ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37 (1973—1974); W. Baumol,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s: What Marx "Really" Meant (A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2 (1974)。

[20] K. Marx, *Capital* (Chicago, 1909) III, 24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237页)

[21] K. Marx, *Capital* (Moscow, 1954) III, 24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第278~279页)

[22] Ibid., p. 260.

[23] 进一步参见 P.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1942) pp. 100 ff.; G. Hodgson, 'The Theory of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New Left Review*, vol. 84 (1974)。

参考文献

译本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K.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3 vols (Moscow, 1954—1969).

Capital

K. Marx, *Capital*, 3 vols (Moscow, 1954).

K. Marx, *Capital*, introduced by E. Mandel (London, 1976—1978).

Marx's Capital: A Student Edition, ed. C. Arthur (London, 1992).

Capital: An Abridged Version, ed. D. McLellan (Oxford, 1995).

Wages, Price and Profit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62) vol. I.

评论

L. Althusser and 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1970).

A. Bose, *Marxian and Post-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975).

T. Carver, 'Marx's Commodity Fetishism', *Inquiry*, vol. 18 (1975).

S. Clarke, *Marx's Theory of Crisis* (London, 1994).

G. D. H. Cole, *The Meaning of Marxism* (Ann Arbor, 1964) Chs 8 and 9.

M. Dobb, *Marx as an Economist* (London, 1943).

- * M. Eldred and M. Roth, *Guide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1978).
- * B. Fine, *Marx's Capital* (London, 1975).
- * B. Fine and L. Harris,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1976).
- R. Garaudy, *Karl Marx: The Evolution of his Thought* (London, 1967) Pt. 3.
- N. Geras, 'Marx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ed. R. Blackburn (London, 1972).
- M. Godelier,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Capital*', in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ed. R. Blackburn (London, 1972).
- E. Hunt and J. Schwartz (ed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London, 1967) Pt. 3.
- B. Katz,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Marxian Theories of Class Struggle and Social Change* (Westport, 1989).
- E. Mandel,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1969).
- E. Mandel, introductions to *K. Marx, Capital* (London, 1976—1978).
- R. Meek,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London, 1956).
- M. Morishima, *Marx's Economics* (London, 1967).
- J. Schu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1943) Ch. 3.
- Science and Society* (1967): centenary number on *Capital*.
- P. Sloan, *Marx and the Orthodox Economists* (Oxford, 1973).
- T. Smith, *The Logic of Marx's Capital: Reply to Hegelian Criticisms* (Albany, 1990).
- I. Steedman, *Marx after Sraffa* (London, 1978).
- W. Suchting, 'Marx, Popper and Historicism', *Inquiry*, vol. 15, 1972.
- V. Vygotski, *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Berlin, 1973).
- * A. Walker, *Marx: His theory and its Context* (London, 1978).
- R. Wolff, *Understanding Marx, A Critique of Capital and its classical antecedents* (Oxford, 1985).
- I. Zeitlin, *Marxism: A Re-examination* (New York, 1973).
- J. Zeleny, *The Logic of Marx* (Oxford, 1980).

标有 * 号的书籍可作为引论来读。

第八章

1864—1882 年



著 作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章程》 [*Inaugural Address and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1864)]

《两篇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 [*Two Addresses on the Franco-Prussian War* (1870)]

《法兰西内战》 [*Address on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1871)]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Comments on Bakunin's Statism and Anarchy* (1875)]

《哥达纲领批判》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1875)]

《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通知》 [*Circular Letter to the Leaders of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879)]

《致维拉·查苏利奇的信》 [*Letter to Vera Sassoulitch* (1881)]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 [*Preface to the Second Russian Edi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82)]

传 记

马克思生命中最后 15 年的作品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对国际的参与以及社会主义政党的成长。1864 年，马克思应邀参加在伦敦圣马丁堂 (St Martin's Hall) 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此次会议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协会的章程和成立宣言就是由马克思撰写的。在以后的几年中，马克思

继续作为国际的领导人物，就大陆运动（尤其反对工人协会由国家资助的思想），波兰独立（作为反对俄国野蛮行为的堡垒），支持爱尔兰地方自治，缩短工作日，将土地转为公共所有等事件起草国际的各种声明。这种工作占去了马克思的大部分时间。1865年，他写道：“与写作这部书（即《资本论》）的工作相比，国际协会占去我大量的时间，因为实际上我承担着所有的事务。”^[1]然而，在1870年，国际内由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追随者所引起的分裂就已经变得明显了。至于他们一致坚持的学说，巴枯宁的追随者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甚至革命工人的国家，倡导阶级平均主义，并建议以阴谋方法来达到这些目的。

在国际存在的时期里，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普法战争及其余波。1848年革命以后欧洲所享受的稳定被“铁血宰相”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扩张主义政策所打扰。1866年，普鲁士迅速击败了奥地利，宣布成立联合德意志帝国，但不包括奥地利。1870年，俾斯麦挑起普法战争，迅速击败并擒获路易·拿破仑。马克思代表国际总委员会就这次战争签发了三篇宣言：第一篇宣言简短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即这场战争是德国的防御战争，法国的失败将导致法国国内革命；第二篇宣言批评普鲁士在拿破仑战败后继续进行战争，宣布普鲁士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只能种下未来战争的种子，并最终促使巴黎工人支持在拿破仑战争后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第三篇宣言，也是最长的宣言，名为《法兰西内战》，是在巴黎工人反对临时政府的起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镇压之后立即写成的。这篇宣言的前两稿都保存下来了。

到了1872年，国际内部与巴枯宁的争论变得非常激烈，马克思被迫建议将国际的所在地迁到纽约，从而结束了协会的活动。

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马克思病情严重，以至于不能进行长时间的写作。他把时间花在从大量的阅读中做笔记和广泛的通信上。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一家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恩格斯来伦敦生活，并给马克思一份年金，使他一家得以搬到哈弗斯托克小山的一座大房子里。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一边为《资本论》第二版及其法文译本而忙碌，一边起草对德国社会主义者共同纲领的详细批判。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者在哥达召开代表大会，将拉萨尔派同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和倍倍尔（Belbel）领导的爱森纳赫党（Eisenach party）合并起来。1891年，恩格斯以《哥达纲领批判》为题将这些批判发表出来。尤其是在晚年，马克思开始对俄国产生特别的兴趣。在他晚年的通信中，有一些信件非常平稳地评

价了俄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将共产主义建立在现有的农民联合基础上的可能性。

1881年,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去世。马克思没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两年后,即1883年3月,马克思与世长辞。

评 论

马克思以争辩的陈述开始他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并试图以材料来证明这一点,后来他将这些材料用到《资本论》中。这种不幸的状况多少被《十小时工作日法案》(Ten Hours Bill)和联合运动所减轻。国际的成立将推进这种斗争,既鼓励不同国家的工人支持彼此的斗争,又在国际事务中维护“道德和正义的简单定律”。在总章程的导言中,马克思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并且要“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进一步来说,工人的经济屈从是所有其他形式的奴役之根源,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2]。马克思还加进了关于真理、正义、权利和义务的一些术语,以取悦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们,但是他对恩格斯说,这些术语“这样放进去无伤大雅”^[3]。1871年国际伦敦支部为加强对工人独立行动的要求,在章程中加进这样的声明:“无产阶级只能将自身建设为一个独立的政党,与有产阶级组成的所有旧政党相对立,才能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4]

在马克思就普法战争为国际总委员会准备的第一篇宣言中,他宣布这场战争是德国的防御战争,但警告德国工人不要让战争丧失其严格的防御特征。在第二篇宣言(写于普鲁士胜利之后)中,马克思坚持认为,普鲁士要求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将“在其内部埋下新的战争的种子”^[5],并怀疑法国最近宣布成立的共和国不仅仅是一个临时政府。总委员会的第三篇宣言题为《法兰西内战》。马克思以一篇长长的、带有嘲讽意味的梯也尔传记开始了这篇宣言。梯也尔是临时政府首脑,在巴黎公社建立之后逃到凡尔赛(Versailles)。马克思接下来将公社的井然有序和宽厚仁慈与凡尔赛政府犯下的残暴罪行做了对比,并质问:“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6]他引用公社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回答道:“巴黎的无产者拥有绝对的权利通过夺取政府的权力来掌握自己的命运。”^[7]马克思继续写道:“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8],并详细分析了从绝对君主时代到第

二帝国的结束这一段时间里中央集权的历史发展。马克思的结论是，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因为公社是受1848年2月革命启发的、积极形式的共和国。它通过果断地处置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所有特征——军队、警察、官僚、牧师和立法机关——来使自己符合这个称号：常备军队为武装的人民所取代；让所有教会实行政教分离，并没收教会的基金；免费教育向所有人开放；地方官员和法官将是由选举产生的、对选民负责的，并且是可撤换的。马克思这样总结这种管理：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9]

然后，马克思把公社当作整个法国政治组织的榜样来进行讨论。在此，他使用了条件时态，因为这些思想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公社将成为地方政府（从大工业中心到最小的乡村）的形式。每一专区的乡村公社将由代表会议（在中心城镇召开）进行自治；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无论是地方代表还是全国代表，都应遵守选民的一般训令，并随时可以被选民撤换。马克思继续写道：“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将不会受到压制……而将由公社的即严格负责的官吏来行使。”^[10]民族统一将不会遭到破坏，但是国家将不再是寄生性的，因为合法职能将交给负责的社会公仆。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做一次决定，让统治阶级的成员在议会中

向人民说假话，而应该是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投票是为任何个别的雇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和管理者。大家知道，公司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知道如何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11]

巴黎公社不会与中世纪的公社相混淆，因为它打破国家政权而中世纪公社则支持国家政权。公社也不会与反对中央集权的古老斗争（基本上是反动的）联合。公社



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2]

另一方面，公社的方法是尝试性的而不是教条的：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 *par décret du peuple* [靠人民的法令] 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13]

马克思继续描述公社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较下层的中产阶级是公社的热情支持者，因为帝国在经济上让他们破产，在政治上排斥他们，在道德上打击他们。对于农民来说，公社将降低赋税负担，并摧毁地方官僚的暴政。公社是法国社会所有“健康因素”的代表，同时是“强烈的国际主义的”，它的官员中就包括了德国人和波兰人。

在转向公社所采取的实际措施时，马克思说道，它最大的社会措施就是

它自身的运转；它的特殊措施——废除熟练面包师的夜班，镇压因任意的罚款而减少工资的习惯，将关闭的工厂交给工人协会，以及对过剩私有财产进行各种轻度的削减——都是由人民统治的人民政府的措施。当然，也有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因素渗透到公社里，但是犯罪率的总体下降则是显著的。

宣言的其余部分重述了凡尔赛政府的虚伪和它进入巴黎时的残暴行径。

尽管马克思对当时纯粹的工人阶级政府所进行的评论非常有意思，但是仍有一个问题尚未回答，那就是马克思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赞成巴黎公社。当然，在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之后的环境下，是不能做赞扬性评论的。马克思以前所写的宣言草稿保持了更多的沉默，恩格斯后来写道：“在《法兰西内战》中，公社的无意识趋势被赞扬为或多或少有意识的计划，在那种环境下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的确，马克思后来甚至说，公社“不是社会主义的，它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14]。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采取了边注的形式，包含两个要点：一是批判纲领对分配国家产品的建议，二是批判它关于国家的观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反对试图将“那些教条，那些在一定时期内还有一定意义而现在则变成无用的文字垃圾的思想”^[15]重新引入政党。马克思发现劳动所得属于社会这样的公开宣言并不是革命的，因为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利用”^[16]。而且，他批评纲领没有对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一起进行抨击。关于“公平分配”和“平等权利”的论述是含混不清的；关于工人应该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些建议，表明他们完全无视资本更新、社会服务管理和救济贫困等的必要费用。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所得”这个词语将是无意义的，因为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7]


然后，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

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8]。在这个社会里，个体生产者



向社会提供了某种东西和一定量的劳动，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他从社会那里领回相应的证明。用这种证明， he 可以从消费资料的社会存储里取得与同量劳动一样多的东西。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19]


当然，马克思继续写道，这种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以一种相等的标准进行衡量，而人们的能力、家庭状况等是不一样的，这样不平等就产生了。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0]

马克思这样总结自己对这一部分纲领的批判：



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21]

《哥达纲领》的另一部分倡导“自由国家”以及“废除工资制度连同工资铁律”。马克思的第二个基本批判就是针对这一部分的。马克思回答说，工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就弄清了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22]

《纲领》对这个难题的解答像它的表述一样是被误导的：是国家资助的工人联合而不是社会的革命性转化。

在转向对“自由国家”的建议时，马克思有力地宣布，这不应是可担当“社会主义者”之名的工人的目的。马克思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他并没有专门回答这一问题，但是他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3]

在马克思看来，《纲领》所包含的事实上只是“为人所熟知的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普选制，直接立法，大众权利，民兵，等等。在进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其中许多已经实现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马克思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特别关注俄国社会革命的前景。尽管1863年波兰起义的挫败暂时抑制了马克思的希望，但是他与俄国的联系加强了，他的乐观主义也增加了。俄语是《资本论》被最早翻译成的语言。然而，马克思对俄国革命可能性的态度是矛盾的。在1877年答复米凯洛夫斯基（Mikhailovsky，俄国人民党党员，他指责马克思具有历史宿命论观点）时，马克思写道：



我的批评者如何将这种历史图画运用到俄国的情况上呢？答案只能是：如果俄国步西欧国家的后尘逐渐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年里她朝这个方向做了不少努力——如果她不把一大部分农民转变为无产阶级，她就不能成功；此后，一旦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她就像其他世俗的民族一样，将经历资本主义无情的规律。^[24]

在四年后给维拉·查苏利奇（Vera Sassoulitch）的信中，马克思说：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25]

在这封信的一个草稿中，马克思甚至走得更远：



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26]

这一观点在马克思最后发表的著作中得到简要重述。这就是1882年马克思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在其中，马克思宣布：“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7]

[注释]

- [1] MEW XXXI 10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102页)
- [2] MESW I 3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15页)
- [3] MEW XXXI 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17页)
- [4] MESW I 38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4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5] Ibid. p. 49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288页)
- [6] Ibid. , p. 5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355页)
- [7] Ibid.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355页)
- [8] KMSW, p. 5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355页)
- [9] KMSW, pp. 541 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358页)
- [10] KMSW, pp. 542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359页)
- [11] KMSW, p. 54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360页)
- [12] KMSW, p. 5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361页)
- [13] KMSW, p. 5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362~363页)
- [14] KMSW, p. 594. (此处引文与所注出处的原文不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154页)
- [15] KMSW, p. 5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16] MESW II 1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16页)
- [17] KMSW, pp. 567 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0页)
- [18] KMSW, p. 5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1页)
- [19] KMSW, p. 56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1页)
- [20] KMSW, p. 5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2~23页)
- [21] KMSW, p. 5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3页)
- [22] MESW II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8页)
- [23] KMSW, p. 5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31页)
- [24] KMSW, p. 571.
- [25] KMSW, pp. 576 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69页)
- [26] KMSW, p. 5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441页)
- [27] KMSW, p. 58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51页)

参考文献

译本

Inaugural Address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62) vol. I.

K. Marx,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introduction by D. Fernbach (London, 1974).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62) vol. I.

K. Marx and F. Engels, *Writings on the Paris Commune*, ed. H. Draper (New York, 1971).

K. Marx and F. Engels, *On the Paris Commune* (New York and London, 1971).

K. Marx,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introduction by D. Fernbach (London, 1974).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62) vol. II.

K. Marx,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Introduction by D. Fernbach (London, 1974).

Preface to the Second Russian Edi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62).

评论

S.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1968) Ch. 8.

R. Blackburn, 'Marxism: Theory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 Reader in Marxist Politics*, ed. R. Blackburn (London, 1977).

J. 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 1967) vol. I.

H. Collins and C. Abramsky, *Kar Marx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London, 1965).

D. Fernbach, introduction to K. Marx,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London, 1974).

M. Johnstone, 'The Paris Commune and Marx's Concept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Massachusetts Review* (Autumn 1971).

E. Kamenka (ed.) *Paradigm for Revolution? The Paris Commune 1871—1971* (Canberra, 1972).

B. Knei-Paz,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 (Oxford, 1978). Appendix entitled 'Marx on Backwardness and on Russia'.

J. Maguire, *Marx's Theory of Politics* (Cambridge, 1978) Ch. 7.

R. Morgan,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s an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ambridge, 1965).

J. Sanders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London,

1969).

T. Shanin,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London, 1983).

G. Stedman Jones, 'Karl Marx and the English Labour Movement', in *Marx en perspective*, ed. B. Chavance (Paris, 1985).

B. Wolfe, *Marxism: 100 Years in the Life of a Doctrine* (London, 1967) Pt. 3.

第二部分



马克思思想导论

第一章

异 化



评 论

马克思的异化范畴直接来源于黑格尔，尽管它的根源更早。在黑格尔看来，现实就是精神实现自身。后来精神觉察到这个世界就是它自身的创造。只存在于它的生产活动中并通过该活动而存在的精神，逐渐意识到它自身在外化和异化着。在黑格尔看来，异化就存在于意识不到这一点：世界并不是外在于精神的。因此，当人们明白自己的环境和文化都是精神的造物时，异化就终止了。当人们明白这点时，他们就自由了，这种自由是历史的目的。马克思把他所认为的黑格尔的观点概括如下：



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相反地，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本质说来，不过是真正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的现象。^[1]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核心批判在于，异化不会随着外部世界的假想废除而终止。在马克思看来，外部世界是人的自然的组成部分，关键的是要建立人与自己的环境的适当关系。



对象性的存在物具有客观的效果，只要它的存在不包含对象性的因素，它就不具有客观的效果。它所以能创造和设定对象，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的。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2]

因此，马克思拒绝“精神”这一范畴，而是以人与自己的社会存在的对立来取代假想的精神与外部世界的对立。

尤其是在他的早期著作中，马克思讨论了异化的几种类型，在类似于一切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思维的急速世俗化过程中，从宗教异化发展到哲学异化和政治异化，并最终发展到经济异化。因为劳动是人的基本活动，所以马克思认为最后一种异化是基本的异化。在所有这些领域，共同的观念是，人已经丧失了某种对其本性是基本的——主要是对受他自身活动控制、对构成历史过程的开创者是基本的——东西。在各种不同的异化形式中，某种其他实体包含适合于人的东西。

例如，在宗教中，篡夺人自身位置的就是上帝；宗教执行着补偿痛苦和投射人的最深欲望的双重功能。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3]。马克思的结论是：“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4]

哲学——这里马克思所想到的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也可以构成一种异化。思辨哲学将历史和人还原为一种精神过程，将理念放在上帝的地位，并不比世俗化的神学好多少。“在黑格尔看来，”马克思指出，“因此，对于人的对象化和异化的能力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精神中、在纯粹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5]。

马克思将类似分析运用于政治异化：国家包含对人的本性的描述，但是同时也剥夺了人实现它的机会：



政治制度从前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世间的、现实

的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这种政治领域是国家中的唯一国家领域，它的内容同它的形式一样，是类的内容，是真正的普遍性；但与此同时，因为这个领域同别的领域相对立，所以它的内容也成了形式的和特殊的内容。现代国家中的政治生活是人民生活的经院哲学。君主制是这种异化的完整的表现。共和制则是这种异化在它自己的领域内的否定。〔6〕

马克思最详细谈论异化的段落包含在《巴黎手稿》中，在那里他首次将这一范畴运用到经济学。在该书的“异化劳动”一节中，马克思将工人在资本主义下的异化情形划分为四个方面。



工人〔马克思写道〕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他生产的对象不属于他，却反而统治他，并且最终只是增加他的贫困。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劳动过程和生产活动本身中。工人在劳动中感到并不自在，他只是把劳动看作满足其他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是一种直接同他对抗的活动，它不依赖于他，也不属于他。并且，异化劳动成功地使人同自己的类相异化。类生活，生产生活，创造生活的生活，都变成一种维持工人个人生存的纯粹手段，人同自己的同类者即人相异化。最后，自然界本身同人相异化，人因而丧失了自身的无机器官。

尽管上述段落涉及工人，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明显的异化部分，马克思还是把这种异化状态看成是该社会的所有成员所共有的。在《神圣家族》中，他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7〕

异化概念仍然是一种构成马克思的著作之核心的概念。他试图少用这个现成词汇，可能是由于它的独特的哲学内涵。诚然，在《共产党宣言》中，他蔑视德国文学界“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异化’”〔8〕。然而，这一概念对《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显然也是基本的，在那里马

克思关注强调的“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9]。

同一概念在《资本论》的起始部分，是以“商品拜物教”的标题重现的。马克思说：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10]

由于有几位作者认为“异化”只是马克思在其哲学的青年时代才使用的术语，所以注意它在《资本论》中不断重现就很重要。^[11]诚然，就这一概念意指人与人的关系已为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而言，可以说它构成《资本论》的基本主题之一。例如，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12]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术语的问题：《资本论》的内容也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延续。《资本论》第一卷的重要讨论依赖于劳动和价值的等式，这可以追溯到作为创造人自身和人的生活条件之存在的人的概念——一个《巴黎手稿》中所概括的概念。在《巴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看来，在与他人的合作中，正是人的本性不断发展出人自身和有关他的世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是这种作为历史过程的开创者和控制者的人的基本角色，如何被转变或异化，以及它如何从属于资本的非人道的力量。异化的人的对应者，即《巴黎手稿》中非异化的或“总体的”人也出现在《资本论》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机器和现代工业”一章中，马克思根据人的潜能的发展，对异化的生产方式和非异化的生产方式的效果做了同样对比。他写道：



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13]

事实是，在《资本论》中，这一结论是以对进步技术的效果的详细分析来支持的，它不会模糊这一连续性。

然而，最能显示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核心地位的著作，是《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即马克思将之用作《资本论》的基础但在1941年之前仍未出版的上千页手稿。《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只是其中部分的详细阐述——是马克思著作的中心饰品。它是这样一部基本著作，该著作认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名序言所做的概括。因为《资本论》只是马克思想要扩充其经济学的六卷中的第一卷，他用来指称自己的巨著（magnum opus）的标题，论及的是人通过资本和国家而异化。

《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范围比《资本论》要更宽泛，最好将马克思的思想看成一种论述始于1844年论题的连续沉思，其中沉思产生的最高点是在1857—1858年。《巴黎手稿》和《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之间的连续性是明显的。马克思本人就把《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说成是“十五年研究的成果，因而是我一生中的辉煌时期”。这封信写于1858年11月，正好是他于1843年11月到达巴黎之后的15年。在1859年的序言中，他还说：“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14]这只能指1844年的《巴黎手稿》和1850—1852年的伦敦笔记。马克思不断使用同时也不断修改来自早期的材料，例如，写作《资本论》时，就使用了自己的1843—1845年的笔记。

从外部证据看，《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内容只能用来确认平常的东西，即论述资本这一章的开头，几乎是逐字重新创作了《巴黎手稿》中论述这些问题的许多段落：人的需要、作为类存在的人、作为社会存在的

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界作为人的躯体的观念、宗教异化和经济异化之间的一致以及乌托邦的或者说几乎是千年至福的因素，等等。有一点尤其强调了这种连续性：《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像《巴黎手稿》一样带有黑格尔的色彩，两者的核心概念仍是异化。^[15]

文 本

买卖是一种外化的实践。一个受着宗教束缚的人，只有把他的本质转化为外来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客体化，同样，在利己主义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外来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实际创造出物品来。

——*On the Jewish Question* (1843); KMSW, pp. 61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51页)

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

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己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个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本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

——*1844 Manuscripts*; KMSW, pp. 78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第42卷,91~92页)

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不言而喻,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这一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这要看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中还是在外部世界中进行,这种生活更多地是观念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

——1844 *Manuscripts*; KMSW, pp. 89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21页)

扬弃作为吸收外化的对象性的运动。——这是在异化的范围内表现出来的关于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的见解。这是异化的见解,它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同样,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作为人的财产真正人的生活指明,也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换言之,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

——1844 *Manuscripts*; KMSW, p. 10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4~175页)

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你生产,就像你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生产一样。我的生产的结果本身同你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你生产的结果同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即不是社会的生产。因此,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作为人能够处于享受另一个人的产品的地位。因此,我们的交换也不可能是那种证明我的产品是为你而生产的产品的中介运动,因为我的产品是你自己的本质、你的需要的物化。问题在于,不是人的本质构成我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交换只能导致

运动,只能激发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产品从而对另一个人的产品的态度。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产品中只是看到自己的物化的自私需要,从而在另一个人的产品中另一个人的、不以他为转移的、异己的自私需要的物化。

当然,你作为人同我的产品有一种人的关系;你需要我的产品。因此,我的产品对你来说是作为你的愿望和意志的对象而存在的。但是,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对我的产品来说却是软弱无力的。因此,这意味着,你的人的本质,因而也就是同我的产品必然有着内在联系的本质,并不对我的产品拥有权力和所有权,因为我的产品所承认的不是人的本质的特性和权力。相反,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在使你依赖于我方面,更是一种束缚,因为它们使你对我的产品处于一种依赖地位。它们根本不是一种赋予你支配我的生产的权力的手段,倒是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

——1844 *Manuscripts*; KMSW, pp. 119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34~35页)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确认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无产者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被唾弃的,并对这种沦落表示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由此可见,在这种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The Holy Family* (1845); KMSW, p. 13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44页)

活动的社会特征、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分享,在这里都同作为异己的、物的东西的个人相对立;这并不存在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行为中,而存在于他们对这些关系的从属中,这些关系是不以他们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就类似于一种物。

在交换价值上,个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联系,个人的权力转化

为物的权力。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权力越小，它们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那些交换的直接需求的联系越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权力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每个人以物的对象的形式拥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这种物的对象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执行人支配人的这种权力。

个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首次发展了普遍的社会交换的体系，导致普遍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和普遍的能力。建立在个人的普遍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权力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社会随着商业、奢侈、货币和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正像现代社会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

——*Marx's Grundrisse* (1857—1858); pp. 66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103~104页]

同活劳动力相对立的价值独立的自为存在——

从而价值作为资本的存在——

劳动的客观条件对同活劳动力的客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莫不相干性、异己性，达到如此地步——

这些条件以资本家的个人（作为具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人格化），同作为个人的工人相对立，这是一种所有权的绝对分裂和分离（即劳动的物质条件与活劳动力的绝对分裂和分离）；这些条件同作为异己的财产、作为另一个法人的现实、作为这种法人的意志的绝对领域，是相对立的——

而且——

(2) 劳动则表现为同资本家中人格化的价值相对立的异己劳动，即同劳动条件相对立的异己劳动——

财产同劳动之间，活劳动力同它的实现条件之间，物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价值同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绝对分离——

从而还有劳动内容对工人本身的异己性——

这种分裂现在也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的物化。

因为通过新的生产行为本身（这种行为只是证实了在它之前发生的资本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剩余劳动，从而剩余价值，剩余产品，总之，劳动的

(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总的结果,都被确立为资本,被确立为独立地、莫不相干地同活劳动力和它的使用价值相对立的交换价值。

劳动力只能接受必要劳动的主观条件——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即劳动力纯粹作为同它的实现条件相分离的劳动力的再生产的生活资料——而且劳动力使这些条件本身变成以异己的、威权主义的人格化的形式而同劳动力相对立的客体和价值。

劳动力离开这种[生产]过程时不仅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反而更穷了。这是因为,不仅劳动力创造的必要劳动的条件从属于资本,而且潜藏在劳动力身上的创造价值的可能性,现在也作为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产品而存在,总之,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的统治,作为赋自己力量和意志的价值而存在,并同抽象的、无目的的、纯粹主观的劳动力的贫穷相对立。劳动力不仅生产了异己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内在财富同自身作为贫穷的关系,通过消费这种贫穷,财富使自身获得新的生命力,并使自身重新富有成果。这一切都来源于劳动力用自己的活劳动换取一定量物化劳动的交换,除非这种物化劳动——存在于劳动力之外的劳动力的生存条件和这些物质条件的独立的外在本性——表现为劳动力本身的产品。这些条件尽管是由劳动力本身设定的,它们既表现为劳动力自身的客体化,又表现为它自身力量作为不以它为转移的、而且统治它的,即通过它自身的活动统治它的存在的客体化。

——*Grundrisse* (1857—1858); KMSW, pp. 366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448~449页]

这种关系在它的简单形式中就已经是一种颠倒,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因为这个形式和以前一切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资本家不是通过他所具有的任何个人品性来统治工人,他只是在他是“资本”的范围内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

但是,这种关系所以变得更加复杂,显得更加神秘,是因为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这些直接物质的东西(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从使用价值来看,它们是劳动产品,又是劳动的物的条件;从交换价值来看,它们是物化的一般劳动时间或货币)起来反对工人,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就连社会地发展了的劳动的形式——协作、工场手工业(作为分工的形式)、工厂(作为以机器体系为自己的物质基础的社会劳动形式)——都表

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因此，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还有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事实上，协作中〔劳动〕的统一，通过分工达成的劳动的组合，除劳动产品之外，机器工业中自然力、科学之用于生产目的，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客观的东西，纯粹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正如劳动资料本身在它们作为材料、工具等简单可见的形式上，作为资本的职能，因而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同单个工人相对立一样。

……

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生产部门，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以其抽象的精华表现出的总的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事实上，它们同单个工人的技能和知识是分离的——尽管从它们的源泉来看，它们也是劳动的产物——无论它们进入劳动过程的哪一地方，它们都表现为被并入资本的东西。使用机器的资本家不必懂得机器。但是，在机器中实现的科学却表现为与工人相关的资本。事实上，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劳动产品的广泛应用，这些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应用，它们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从而作为属于资本的力量同劳动对立。资本使用这一切手段，当然只是为了剥削劳动；但是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生产中使用这些手段。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为，对这种行为单个工人不仅只能保持消极态度，而且这种行为是直接反对单个工人的。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1862); KMSW, pp. 393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I，420~4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由资本家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

所决定的。

——*Capital*, vol. III (1864—1865), p. 31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294页)

资本不是物。资本是一定的、属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相互关系……资本意味着为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意味着独立于人类存在中的活劳动力并同它们对抗的劳动的产品和物质要求，这些劳动的产品和物质要求在资本中被这种对抗人格化了。资本不仅意味着工人的不依赖于其自身的、转化为社会力量的产品（这些产品已成为它们自身的生产者的统治者和买者），而且意味着以生产者的产品的属性形式同生产者对抗的力量和社会关系——这一劳动的各种形式。因此，在这里，我们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生产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确定的、乍一看来极为神秘的各种因素之一的社会形式。

——*Capital*, vol. III (1864—1865); KMSW, p. 49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920页)

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来实现其功能的；他就是人格化的资本。与此相类似，工人只是劳动的人格化……因此，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关系与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遇到的宗教关系是完全一样的：客体变成了主体，并且反过来也一样。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种颠倒是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是通过大多数人并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创造这样的财富所必需的，由于只有社会劳动才能构成一个自由的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所以这种财富的创造也就是社会劳动的无限创造力。反对这种对立形式是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人类一开始就将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自主的力量而树立为自己的对立面，从而为其赋予一种宗教的形式。

这就是人类自身劳动的异化过程。从一开始，工人就比资本家优越，因为资本家植根于他的异化过程并完全是满足于此，而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患者，发现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这个过程的状态之中，并且觉得这个过程是一种奴役的过程……资本的自我增殖——剩余价值的创造——是资本家决定性的、至高无上的和主导性的目的，是其活动的完全动机和满足，是理性化的守财奴的本能和目的。这种可怜的满足表明，资本家同样受着资本的奴役。当然他是在相反的方向上受奴役的。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1865); KMSW,

pp. 508 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9卷，48~49页)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资本按照其剥削的需要，调节着这种劳动力本身的生产，即受剥削的大众的生产。这样，资本不仅生产着资本，还生产着正在增长的工人大众，通过这种物质，它本身就能起到追加资本的作用。结果，不仅劳动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和与自身相对立的条件下以资本的形式创造了劳动条件，而且资本还在不断增长的规模上创造了为劳动所需要的具有创造力的雇佣劳动者。劳动创造了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资本创造了作为实现资本的手段和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仅是这种关系的再生产，它还是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的再生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也提高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与工人相对立的财富增长了，并被作为资本来控制。在他面前，展开的是财富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异化的，压制着他，他的贫穷、羞耻和人身依附也相应地增加了。他的赤贫与这种富有是相关的。同时增加的是资本的活的生产资料即劳动的无产阶级。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KMSW, p. 5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9卷，123页)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像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Capital*, vol. I (1867); KMSW, p. 4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88~89页)

[注释]

[1] KMSW, p. 10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65页)

- [2] KMSW, pp. 103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67页)
- [3] KMSW, p. 6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2页)
- [4] KMSW, p. 6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页)
- [5] KMSW, p. 10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61页)
- [6] KMSW, pp. 29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283页)
- [7] KMSW, pp. 134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44页)
- [8] KMSW, p. 2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9页。“人的本质的异化”在中文版中译为“人的本质的外化”)
- [9] KMSW, p. 38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360页]
- [10] KMSW, pp. 435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88~89页)
- [11] 例如，可参见《资本论》1937年伦敦版的索引。讨论马克思思想在异化概念方面的连续性的著作有：R.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New York, 1958) pp. 103ff., and E.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1961) pp. 50ff. and 69 ff. 也可参见奥尔曼(Ollman)和塞格尔(Seigel)的著作
- [12] *Capital I* 4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73页)
- [13] *Ibid.*, 4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535页)
- [14] KMSW, p. 38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5] 特别参见 KMSW, pp. 365ff. and pp. 371ff.

参考文献

- D. Bell, 'The Debate on Alienation', in *Revisionism*, ed. L. Labedz (London, 1962).
- D. Braybrooke, 'Diagnosis and Remedy in Marx's Doctrine of Alienation', *Social Research* (Autumn 1958).
- D. Braybrooke, *Meeting Needs* (Princeton, 1987).
- A. Buchanan, *Marx and Justice: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 (Totowa, 1982) Ch. 3.
- L. Easton, 'Alienation and History in the Early Marx',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December 1961).
- L. Easton, 'Alienation and Empiricism in Marx's Thought', *Social Research* (Autumn 1970).
- A. Heller,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London, 1976).
- K. Löwith, 'Self-alienation in the Early Writings of Marx', *Social Research* (1954).
- S. Lukes, 'Alienation and Anomie',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3rd series, ed. P. Laslett and W. G. Runciman (Oxford, 1967).
- E. Mandel and G. Novak, *The Marxist Theory of Alienation*, 3rd ed. (New York,

1973).

M. Markovic, 'Marx's Critique of Alienation and Its Emancipatory Consequences', in *Marx en perspective*, ed. B. Chavance (Paris, 1985).

D. Mcllellan, 'Marx's View of the Alienated Society', *Review of Politics* (October, 1969).

B. Ollman, *Alienation: Marx's Critique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 1971).

J. O'Neil, 'Alienation, Class Struggle and Marxian Antipolitics', *Review of Metaphysics* (1964).

J. O'Neil, 'The Concept of Estrangement in the Early and Later Writings of Karl Marx',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September, 1961).

J. Plamenatz, *Karl Marx's Philosophy of Man* (Oxford, 1975) Pts 1 and 2.

P. Roberts and M. Stephenson, *Karl Marx's Theory of Exchange, Alienation and Crisis* (Stanford, 1973) Ch. 6.

N. Rotenstreich, *Alienation: The Concept and its Reception* (Leiden, 1989).

R. Schacht, *Alienation* (London, 1971).

L. Seve, *Man in Marxist Theory* (Hassocks, 1978) Pt2.

还可参见总的参考文献中所引用的 Avineri, Fromm, Mcllellan 和 Tucker 的著作。

第二章

历史唯物主义



评 论

恩格斯说过，他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包含三个因素：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在德国哲学中，康德谈论过到达一种自由与和平社会的进步，费希特曾将人类历史作为一种合理的发展来思考。但是，只有黑格尔才最系统而完备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各种抽象的“原则”——文化、宗教和哲学——的发展和冲突。在这种发展中，他谈到“否定的力量”，认为在一切现存的事物状态和正在变易的东西之间，永远存在一种张力：各种事物状态都包含着它自身毁灭和向更高阶段转化的种子。每一阶段都是一种超越那些已超越阶段的进步，包含着源自它们的因素。这一过程被黑格尔称作辩证法，一个马克思接受但使之头脚倒立的观念。与抽象的原则相反，马克思认为，社会变化的经济基础——以及它所产生的社会阶级——是把握人类历史之展示的关键。

在法国，巴贝夫（Grachus Babeuf）在1796年就试图通过革命行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由另两位思想家详细阐述过。傅立叶（Charles Fourier）鼓吹过人本善良，对人的情感的这一自由表述，现在已被使人的劳动非人化的工业所挫败，也被限制性的驱动和使妇女处于从属状态的婚姻所挫败。傅立叶的解决方案是建立称作法郎吉（phalanges）的小规模的共同体，在那里人们可以和谐地发展他们自己的所有能力。另一方面，行为古怪的贵族圣西门却欢迎工业的降临，幻想生产资料是为了被剥夺民众的利益而以“社会基金”的方式被掌握，并受由国家指派的银行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政府管理。

在英国，马克思全面使用了那里现成的研究资本主义的资料。亚当·斯密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运转作过解释。李嘉图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使马克思能够证实社会中一个阶级受另一个阶级的剥削。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从未被马克思使用过的术语，他对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表述甚至并不感到愉悦。他宁愿说“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唯物主义的生产条件”，即它更多是被看作一种方法或研究，而不是一种充分发展的观念体系。马克思思想的实验性本性已经为1857年“导言”的结尾的一段有意思的话所表明，在那里马克思问道：为何古典艺术——它的经济基础是一种奴隶社会——“仍然构成我们美学享受的源泉，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不可企及的标准和模式而流行”^[1]。早在马克思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撇开评论古希腊人曾是人类的儿童以及每个人都热爱孩子不论，这一手稿已展现了答案。这一唯物主义观的核心观念就是，社会变化的钥匙应该在人生产自己的共同生活的途径中去寻找。这种生产活动是基本的，而人用来解释和组织这种活动的观念和概念——政治的、哲学的和宗教的——是次要的。举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法国革命和美国的宪法所宣布的人权，并不是恰好在特殊时代发现的关于人的本性的永恒真理；只有在需求的背景中考虑，它们才能被新商业团体所充分理解——这个团体所追求的是终止封建束缚和经济事物的自由竞争。正是在声称要服务特殊阶级利益的观念这种意义上，马克思通常使用“意识形态”的术语。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些观念是以一种简明的形式提出的：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物质存在的条件、人们的社会生活、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理解吗？

观念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特征，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观念始终都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观念。^[2]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头部分，这一理论以尽量长的篇幅得到描述，而对它的最佳概括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之中。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截然不同于主张只有物质存在的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强烈地批评18

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他们在其关于物质条件的影响的学说中,没有说明人的因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条中,他写道:“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3]

因此,历史既不被视为偶然性的结果,也不被视为受伟大人物行为铸造的结果,甚至也不被视为超自然力量铸造的结果,而是被视为人的毫无意识的创造,它从属于可客观观察的规律。当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一些试图过分强调这些规律的必然性和前定论的因素。恩格斯后来写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要受到责难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4]资产阶级有时也被描述为摧毁自身的不自觉的代理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将自己指挥棒下挥动的必然性与自然科学中获得的规律的必然性进行比较。他们在自己的书信中,也谈论自己关于社会的观念与达尔文关于自然进化的观念的相似性。

历史中的最终决定因素经常被马克思说成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有时候,这种决定因素又被限制为现实的生产工具,就像这一陈述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6]概括这类词句和将“技术决定论”的理论归结于马克思,显然是不恰当的。对马克思思想的某些最尖锐的批评,一直专注于暴露,一切将基础与上层建筑分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都是无效的,因为任何对基础的描述都涉及上层建筑的因素——例如,如果没有某些统治和义务的观念,就不可能设想一种经济的社会组织。^[7]当然,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异议,但它怀疑的是,马克思是否在他的批评者归咎于他自身的意义上,已经把他的理论阐述为一种严格的因果理论。马克思有时把工人本身也包括在生产工具之列,甚至把革命阶级称作“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生产力”^[8]。

他还清楚地表明,生产工具从来不能与它们的社会背景分离。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核心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统一,这些主客观因素是现存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们要通过历史而不断展现,以便进化能够接近它们。“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

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还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

马克思还平和地强调，他的观念在其对西欧发展的研究中，都可以找到根源，如果不作进一步的思考，是推断不出来的。在这里，他关于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尤其击中要害。当他的追随者试图把他的理论满怀激情地运用到俄国时，他反对歪曲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性框架，将其变成关于一般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无论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任何民族都注定要遵循这种一般道路”，接着宣布，“将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它的最高道德在于超历史性——作为万能钥匙来运用”，就永远不能理解历史。^[11]

恩格斯劝告一位询问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者去阅读《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对马克思思想的最好理解，可以通过考察他自己对这种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而获得，例如，在《法兰西阶级斗争》或者《资本论》第一卷的后半部分中。

文 本

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

——1844 *Manuscripts*; KMSW, p. 9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22~123页)

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能力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片面的唯物主义的或者不如说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

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

——1844 *Manuscripts*; KMSW, pp. 93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28页)

并不需要多大的洞察力，从关于人性本善和人的智力天分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唯物主义学说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如何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从他所获得的感觉和经验的世界中吸取自己的一切知识，那就必须这样安排经验的世界，使人在其中体验和获得真正适合人的东西，使他意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一切道德的原则，那就必须使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通过逃避这种或那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通过维护自己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该惩罚个人的犯罪行为，而应该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应该向每个人提供表现其存在的生命力的社会空间。既然人是由他的环境塑造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社会的力量为准绳。

——*The Holy Family* (1845); KMSW, p. 15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66~167页)

我们所由开始的前提不是任意的前提，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形成抽象的现实前提。它们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生活的物质条件，包括他们发现已经存在的和他们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式来检验。

当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人类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要确立的事实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的真实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在其中发现自身的各种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任何历史的记载都应该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的行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开始生

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通过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现实的物质生活。

人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在存在中发现的和必须再生产的现实生活资料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该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虑。宁可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是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的本性取决于决定他们生产的物质条件。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p. 160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6~68页)

这种历史观取决于我们的这一能力：从生活的物质生产本身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并为这种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解释意识的所有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从该基础出发追溯它们的起源和发展；这样当然就能够按其整体描述整个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的历史基础上；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神灵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而是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某种物质结果：某种生产力的总和，某种历史地创造的个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一代一代从前一代传下来的；一方面，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条件确实要被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某种发展和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p. 172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92页)

那种论述环境的改变和教育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正由人来改变的，教育者本人受教育是基本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将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 15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9页；另外，在KMSW中，本段引文出自*Theses on Feuerbach*是正确的，但这里注为出自*The German Ideology*，是不对的)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特定的政治环境。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前一代人的产物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1847); KMSW, p. 192. (参见《马克

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特定的政治环境”在中文版中是“相应的政治国家”；另外，在KMSW中，本段引文出自*Letter to Annenkov*是正确的，但这里注为出自*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是不对的)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合作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互相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因此，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特别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不同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1849); KMSW, p. 25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345页)

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

(1) 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现象，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

(2) 以往各种唯心论的历史叙述的方法同实在论的方法的关系，即同所谓文明史的关系，这种所谓文明史全部是宗教和国家的历史。在这种关系中，关于至今为止历史叙述所使用的各种不同方法，可以谈几种。所谓客观的方法。主观的（伦理的和其他的）方法。哲学的方法。

(3) 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所接受的或转移来的生产条件，总之，非原生的生产条件。国际关系的影响应该在这里引入。

(4) 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特性的种种非难。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

的关系。

(5) 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具体差别。

(6) 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总之,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理解艺术等等的的不平衡还不像理解实际社会关系中的不平衡那样重要和困难。例如美国教育同欧洲教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

(7) 这种发展的概念表现为意味着必然性。另一方面承认偶然。怎样。(自由和其他论点。)(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8) 在主观和客观地表现在部落、种族等的一定事实中,肯定能够发现起点。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有直接关系的,因而也不是同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和骨骼结构有直接关系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民族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谁都承认:当此类艺术一旦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普遍的划时代的形式创造出来;换句话说,在艺术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形式的相互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被确定,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让我们举例说明希腊艺术同我们自身的关系以及莎士比亚时代的艺术同我们自身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成长的土壤。在自动化机器、铁道、机车和电报的时代,这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形成希腊人的幻想、从而使希腊艺术成为可能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人们征服了这些自然力,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砧玛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通过流行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也不是对自

然（自然包括一切对象，因而也包括社会）的任何偶然的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诞生的土壤或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希腊艺术决不能产生于一个排除一切对自然做神话解释、排除一切对自然的神话态度的社会，也决不能产生于一个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的社会。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灭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把握这一观点：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是结合在一起的。困难的是，要理解它们为何仍然构成我们美学享受的源泉，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不可企及的标准和模式而流行。

一个成年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每一个时代的性格不是纯真地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儿童时代，在它发展得最灿烂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后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社会秩序的原始特征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种社会秩序的原始特征的产物，是应该归功于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出现的那些未成熟的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事实。

——Marx's Grundrisse (1857—1858); KMSW, pp. 358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47~50页]

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关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但是，荒谬的是把这种单纯物的关系解释为同个性的本质（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内在于个性的本质的自然关系。这些关系是个人的产物，而且是历史的产物。它们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关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质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这些个人仍在参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开始那种社会生活。这是个人在一定的、狭隘有限的生产关系内的自然的、自发的相互关系。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关系，服从于他们自己的集体控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

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的全面性虽然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异化，但是也首次产生出个人的关系和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的关系的丰富性，并且还没有把这种关系作为同他自身对立的权力和独立的社会关系来确立。试图复归于那种原始的丰富性是可笑的，因为这等于相信那种原始的丰富性的彻底消耗具有连续的必然性。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

——*Marx's Grundrisse* (1857—1858), pp. 70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108~109页；另外，本书所著的英文版页码 pp. 70f 也有误，经核对原书，英文版页码应为 pp. 161~162]

但是，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现实中，意识的这个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当然，发展不仅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就是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这个基础本身的最高发展，这个基础变成的花朵的关节点（但这仍然是这个基础，是开花的这株植物，因此，开花以后和开花的结果就是枯萎），是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一旦达到这一点，任何进一步的发展就会在新的基础上开始。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表现为同有限的、一定的共同体形式相一致，因而也同有限的、一定的个人形式相一致，这种个人具有组成这种共同体所需的品质和同样有限的发展。

——*Marx's Grundrisse* (1857—1858), pp. 120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34~35页，译文略有不同；另外，本书所著的英文版页码 pp. 120f 也有误，经核对原书，英文版页码应为 pp. 540~541]

完全由于偶然的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Marx to Engels* (1858); *MESC* p.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50页)

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发展方法和黑格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是这点将我的方法区分开来。

——*Marx to Kugelmann* (1868); *MESC* p. 19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2卷，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现在，哪种适用于俄国的东西能够使我的批评者理解这种历史框架？只能是这样：如果俄国想要在西欧几国的例子之后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在最近的几年里它朝这个方向发展时正遇到不少麻烦——只要她不首先把农民中优秀的部分变成无产者，她就不会取得成功；而这之后，一旦走向资本主义王国的怀抱，她就会像其他世俗的民族那样经历自己无情的规律。事情就是这样。但是，对我的批评者说来，那是太简单了。他认为，他绝对必须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框架变成每个民族注定要行走的一般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而不管这个民族发现自己处于其中的历史环境如何，为的是它最终达到能够保证——连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扩张——人的最全面的发展的经济形态。但是，我只好请求他谅解。（他既是抬举我，也是在过分羞辱我。）让我们举个例子吧。

在《资本论》的几个部分中，我间接提到侵袭古罗马的平民的命运。他们开始都是自由农民，自己耕种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在罗马历史的进程中，他们被剥夺了。将他们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开来的同一运动不仅涉及大地产的形式，而且也涉及大货币资本的形式。因此，一个上午的光景就可以发现，一方面是除自己的劳动力之外被剥夺了一切的自由民，另一方面是为使用这种劳动而拥有一切既得财富的那些人。结果怎么样呢？罗马无产者没有变成雇佣劳动者，而是变成比美国南方从前的“穷白人”更可怜的什么也不做的暴民，除此之外，发展出一种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因此，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惊人的类似事件导致的是完全不同的结果。通过分别对每个这种进化形式进行研究和比较，人们能够很容易找到这种现象的线索，但是人们永远也不能通过把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通过把构成具有超历史性的至高德行用作自己的万能钥匙而达到

这一步。

——*Reply to Mikhailovsky* (1877); KMSW, pp. 571f. (中译本未收录这封信)

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在俄国建立自己的统治,俄国的绝大多数人民,即俄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必然要被变为雇佣劳动者,并最终会因初步废除共产主义所有制而受到剥夺。但是无论如何西方的先例对这个过程的“历史的不幸”根本不证明任何东西。

在这个西方的运动中,我们关注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人们承认还是否认这种转变的必然性,提出赞成或反对这种转变的理由,都和我对资本主义统治的起源的分析毫无关系。我们至多只能推断,从绝大多数俄国农民的现状来考虑,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

正当人们吸着公社的血、蹂躏它、耗尽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贫瘠的时候,“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却以嘲弄的口吻指出,公社蒙受的创伤正是它自发的、无可怀疑的衰老的征兆,并认为公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缩短它的临终的时间是一件好事。这不再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问题只不过是要战胜敌人。因此,这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Drafts of letter to Vera Zassoulitch* (1881); KMSW, pp. 577, 58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477、441页)

[注释]

[1] KMSW, p. 36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49页]

[2] KMSW, p. 23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1~292页)

[3] KMSW, p. 1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5页)

[4]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pp. 399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8页;在作者所引英文版第一句话中的“要受到责难的”,在中文版中是“应当负责任的”)

[5] KMSW, p. 38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页)

[6] KMSW, p. 20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42页)

[7] 特别参见: J. Plamenatz, *Man and Society* (London, 1963) II, pp. 274ff. and a defence in G.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Oxford, 1978)

[8]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p. 16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194页)

[9] *The Holy Family*, p. 1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2卷, 118~119页)

[10] KMSW, p. 30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8卷, 121页)

[11] KMSW, p. 572. (此处引文来自1877年马克思致米凯洛夫斯基的信, 中译本未收录此信)

参考文献

H. Acton, *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 (London, 1955).

H. Acton and G. Cohen, 'Some Criticism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70).

W. Adamson, *Marx and the Disillusionment of Marxism* (Berkeley, 1985) Ch. I.

M. Bober *Karl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2nd ed. (New York, 1965)

G.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1978).

M. Cohen et al. (eds), *Marx, Justice and History*, Pt II, (Princeton, 1980).

J. Farr, 'Marx's Law', *Political Studies*, vol. 34 (June 1986).

J. Ferraro, *Freedom and Determination in History according to Marx and Engels* (New York, 1992).

H. Flescher, *Marxism and History* (London, 1973).

D. Gandy, *Marx and History: From Primitive Society to Communist Future* (Austin, 1979).

A.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1981).

S. Himmelweit, 'Reproduction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 Feminist Critiqu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x*, ed. T. Carver (Cambridge, 1991).

F. Jakubowski, *Ideology and Superstructure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1976).

Z. Jordan, *The Evolu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1967).

S. Lukes, 'Can the Base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uperstructure?', in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Theory*, ed. D. Miller and L. Siedentop (Oxford, 1983).

W. McBride, *The Structure of Marx's World View* (Princeton, 1978).

R. Miller, 'The Consistenc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4. (1975).

P. van Parijs, *Marxism Recycled* (Cambridge, 1993) Pt. I.

J. Sanders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London,

1969).

M. Seliger, *The Marxist Concept of Ideology* (London, 1976).

W. Shaw,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1978).

S. Smith, 'Considerations on Marx's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65 (December 1984).

A. Wetherly (ed.),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Avebury, 1992).

I. Zeitlin, *Marxism: A Re-examination* (New York, 1967).

还可参见第一部分第六章中的参考文献。

第三章

辩证法



评 论

对古希腊人——芝诺和苏格拉底——来说，辩证法是借助于提问和回答来讨论问题的艺术，是借助于此类讨论来发展一种平衡的观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以种种形式表达了经由否定的辩证的进步观念。^[1]这两类概念变成了黑格尔的历史观的核心，它们转而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自身的辩证概念。正如他谈到法国革命时所说的，黑格尔是从这一信念开始的：“人的存在在其头脑中，即在理性中有自己的中枢，在它的灵感下，人构筑了现实的大厦。”在他的最伟大的著作《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追踪了心灵或精神的发展，重新将历史运动引入哲学，并断言认得人的心灵可以达到绝对知识。他分析了人的意识的发展，从它对当下的直接感知到自我意识的阶段——一种允许人分析世界和因此确定自己行动的理解。接此而来的是理性的阶段本身——对现实的理解——在此之后，借助于宗教和艺术，精神达到了绝对知识，一种人在世界上认可其自身的理性阶段的水平。黑格尔把这些阶段称作“异化”，因为它们都是人的心灵的创造品，却被认为独立于和高于人的心灵。这种绝对知识同时是对人的精神的一种扼要重述，因为，随着它超越这些阶段，每一个连接的阶段同时保留了先前阶段的因素。黑格尔把这种既超越又保存的运动称作“扬弃”（Aufhebung），一个在德语中有着这种双重意思的词语。黑格尔还谈到“否定的力量”，认为在一切现存的事物状态和正在变易的东西之间，永远存在一种张力。因为一切现存的事物状态都处于被否定的过程中，并变成某种其他东西。这个过程就是黑格尔用辩证法所指的含义。

马克思后来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

般运动形式”^[2]的思想家。重要的是要明白,当马克思旨在让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以足立地时,通过按照后来由恩格斯开创的传统来设想一种辩证唯物主义^[3],是做不到这点的。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唯物辩证法基本的,能够以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渗透和量转化为质的“规律”来概括。似乎毋庸置疑,马克思也假定存在一种自然界的辩证法;而那恰是黑格尔所认为的。马克思很愿意提到这一事实,即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货币中量的增长能够使它从质上转变为资本,就像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的例子那样。^[4]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他认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是对个人的、以所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开始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5]。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的辩证法是从属于精神的普遍中介的;而在马克思那里,任何对自然界的辩证知觉是服从于历史实践的辩证法,即人和自然之间的辩证法的。

黑格尔当然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但劳动在黑格尔那里总是精神性的,它在马克思那里则是物质的——被设计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在马克思看来,人和自然之间的辩证交换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造成的,该生产方式本身又会生产出新的需要和满足它们的手段——甚至人的本性自身也从属于社会交换的辩证法。这转而产生出一种具有新的需要和相应增长的生产力的社会劳动组织。因此,人既不是他们的环境的消极产品,也不能随意地自由改变他们的环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

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一般框架是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建立的,在那里,马克思花了很长一章的篇幅用于“对黑格尔的一般辩证法的批判”。在那里,马克思宣布,黑格尔的《现象学》的伟大就在于“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7]。诚然,黑格尔没有把劳动设想为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是,“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的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变成自身的媒介”^[8]。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就在于精神逐渐洞识外部世界并超越它。在黑格尔看来,从辩证法的两个同等现实的对立极去看,更成问题的是建立人和自然之间的适当关系。

这种适当关系——共产主义——借以实现的方式,构成了马克思毕生研究的对象。辩证法作为创造的否定性的意义,将《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联系起来:《资本论》第一卷论述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

中诞生的一章，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优秀例证。因为，正像他于1872年所写的，辩证法

在对事物的现存状态的理解和肯定的认可中同时还包含对该状态的否定的认可，即对事物的现存状态的必然终结的认可；辩证法把每一种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式都看作变动不居的运动，因而只是把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式的暂时性解释为瞬间的存在；因为辩证法不让任何东西强加给自己，并且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9]

但是，还有一种精致说法：在1844年的马克思看来，思维的抽象一直被视为某种要避免的东西，就像被视为不能把握现实世界的东西，或者至少是被视为只能以某种片面的方式把握现实世界的东西一样。但是，在马克思写作《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之前，马克思是相信，政治经济学要想成为科学，只有用类似于价值、劳动等抽象概念，才能把握现实世界——由它的现象渗透到它的本质。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写的：“如果事物的外在表象和事物的本质直接一致，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0]本质与现象的这种区分，至少部分是来自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不是对《现象学》的更新了的兴趣。但是，尽管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和《资本论》中对于他的描述是辩证的，这种辩证法并不只是诸种概念之一^[11]：由于历史的运动是辩证的，因而对这种运动的自我意识的理论本身也必须是辩证的。马克思所指的“科学辩证法的秘密”，是要把经济范畴当成“与物质生产发展的特定阶段相对应，对历史生产关系的理论表达”^[12]。这种辩证法之所以是科学的，是由于通过抽象的过程，它超越了市场关系的表面现象，并按照生产关系的“本质”来解释这些现象。所谓生产关系，也就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在马克思看来，它是辩证法的基本形式。

文 本

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产物——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设想为一个过程，把对象化设想为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对这种外化的超越。因此，

这意味着,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真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的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自身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表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是可能的:人把自己的类的力量全部用于创造(这又是只有通过人的合作和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人使自己同作为对象的类的力量保持关系,而这首先又是只有以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

——1844 *Manuscripts*, KMSW, p. 10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63页)

既然我们在逻辑范畴中发现了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发现了绝对方法,它不仅解释一切事物,而且还包含一切事物的运动。

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方法是任何对象所不能抗拒的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在每一个对象中重新发现自身、认可自身的倾向。”(《逻辑学》第三卷)既然一切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每一种运动、每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由此自然得出结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

那么,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条件下的运动。抽象条件下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又存在于何处?存在于它形成自身,把自身跟自身对峙,并且调解自身;存在于它把自身表述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进一步说,存在于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在特定的范畴中怎样进行自我肯定、形成自身?这已经是理性自身及其辩护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身作为正题形成,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跟自身对峙,分裂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彼此之间互相平衡,互相中和,互相制约。这两个矛盾思想的融合,就构成一种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裂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转而又融合为新的合题。由这番艰辛诞生出一个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这个思想群遵循着同样的辩证运动,它也有一个与

自己矛盾的群作为反题。由这两个思想群中又诞生出一个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诞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诞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诞生出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从纯粹理性的精神中新形成的成果，好像这些范畴凭借辩证运动的活动才互相形成、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读者不应该对这种形而上学以及它的范畴、群、系列和体系的整个脚手架感到惊讶。尽管蒲鲁东经历各种麻烦想爬上这种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简单的正题和反题的头两级；甚至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解释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后面我们要看到蒲鲁东在将它归结为极低劣的均衡时是如何成功的。黑格尔认为，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头脑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只不过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从来不存在“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存在“观念在理解中的顺序”。他认为他正在通过思想的运动构造世界，其实，他只是用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重构和分类而已。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KMSW, pp. 200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42~143页)

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考察一个特定的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阶级划分、人口在城市、乡村和近海的分布以及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职业开始；因而我们研究该国的输出和输入、年度生产以及商品的消费价格等等。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中，从成为整个社会生产活动的基础和创造者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这种阶级又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这些因素转而意味着交换、分工、价格，等等。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们从人口出发，我们用某种混乱的整体的概念才能做到这一点，并且通过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将逐渐达到更简单的观念；因

而我们将从想象的具体达到越来越不复杂的抽象，直到我们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一旦这点达到，我们又要开始返回的路程，直到我们最终回到人口，但是这次，人口不是作为整体的一个混乱的范畴，而是作为一种既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前一种方法是政治经济学在一开始已经采纳的方法。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活生生的总体——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达到一些最主要的抽象原则，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用抽象的推理确定下来，就会产生出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简单概念出发并以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告终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结合，即各种不同要素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观察和观念的起点。通过前一种方法，完整的观念变成抽象的定义；通过后一种方法，抽象的定义在推理过程中导致具体主体的再现。因此，黑格尔陷入错误，把实在看作自我协调、自我吸收和自发运作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就意味着人口即在一定条件下参与生产的人口存在；它也意味着一定类型的家庭、部落或国家等的存在。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既定总体的抽象的、片面的关系而存在。

然而，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这样一种意识，即认为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世界只有当被理解了时才是现实的（而哲学意识具有这种本质），其实是误将范畴的运动当作现实的生产行为（不幸它只是从外部接受动力），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是又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的具体主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在观察和想象之外活动或驾于其上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对观察和想象进行概念上加工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总体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只对它开放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艺术精神、宗教精神和实践精神所使用的方式的。具体的主体在它被掌握之后仍然像它被掌握之前一样，继续有一种独立的存在，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思考着它。因此，在政治经济学中使用理论方法时，必须始终牢记把主体、社会作为我们出发的前提。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要看情况而定。例如，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就正确地从作为个人的最简单的法律关系的占有开始。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已经存在的关系之前，根本不存在占有这类东西。相反，如果说存在着只占有（possess）东西而不拥有（own）东西的家庭和部落，这倒是正确的。所以，在所有权方面，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一种简单的家庭和部落共同体的关系。它在社会中表现为一种发达的组织的简单关系，但却一直包含着占有的关系所借以产生的具体的土壤。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律关系。说家庭是占有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错误的。相反，占有从来意味着这种“比较具体的法律范畴”的存在。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实体可能已经实现，却并没有进入那种以具体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多重关系和方面；但是，当具体实体获得较全面的发展时，它将保留作为从属关系的同一个范畴。

——Grundrisse, introduction; KMSW, pp. 351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17~20页)

圣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专门讨论《资本论》的方法的一文中，发现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文章说：“如果对主题的外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乍看起来，马克思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中最唯心的一个，而且一直是在德国的即该词最坏的意思上。但是，实际上，在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中，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我回答这位作者的最好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精彩的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兴趣。

这位作者在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那里我讨论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那些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着一定形式和互相联系的支配这些现象的规律，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是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序列过渡到一种不同的联系序列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显示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只为一件事情烦恼自己：通过严格的科学研

究来揭示社会状况的连续的规定秩序的必然性,尽可能公正地确立那些他作为基本出发点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揭示事物的现存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的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智力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智力……既然意识要素在文明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明为主题的批判性研究,比热病和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任何形式或结果为基础。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性研究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物质现象。这种研究使自身限于将事实同另一种事实作对照和比较,而不是将观念同事实作对照和比较。对这种研究来说,重要的事情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可能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互相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要对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展示自身的连续序列、顺序和相互联系进行严格分析。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社会形成了一定发展时期的轮廓,并且由一个阶段进入另一阶段,它也就开始从属于另外的规律。总之,经济生活向我们提供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将经济规律比做物理学规律和化学规律,他们误解了经济规律的性质。而且,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表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单个器官有差别,以及这些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条件和支配它们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推论和解释资本的统治所建立的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揭示调节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起源、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所描述的是他认为实际上是我的方法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在谈到我自己对这种方法的应用时又这样有雅量,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

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描述出来。这点一旦成功做到，主题的生命一旦像在镜子中一样观念地反映出来，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纯粹的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人脑的活动过程，即他以“理念”的名义而且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而现实世界只是“理念”的外部的现象的形式。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人的头脑所反映的并变成思维形式的物质世界。

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今天在德国文化界高谈阔论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勇敢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要想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重新把它倒过来。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美化和赞扬了事物的现存阶段。辩证法，在其合理形式上，对资产阶级及其教条主义的教授们来说是一种耻辱和厌恶，因为辩证法在对事物的现存状态的理解和肯定的认可中同时还包含对该状态的否定的认可，即对事物的现存状态的必然终结的认可；辩证法把每一种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式都看作变动不居的运动，因而只是把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式的暂时性解释为瞬间的存在；因为辩证法不让任何东西强加给自己，并且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固有的各种矛盾给实际的资产阶级自身以深刻印象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性循环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种危机再一次在逼近，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行为的剧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Capital*, vol. I; KMSW, pp. 418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109~113页)

[注释]

[1] See the opening chapters of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1978) vol. I.

[2] KMSW, p. 4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2卷, 112页)

[3]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词语, 狄慈根19世纪70年代首次使用过它, 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后来普及了它。

[4] Cf. K. Marx, *Capital* (Moscow, 1954), p. 309.

[5] KMSW, p. 48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23卷, 832页)

[6] KMSW, p. 3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8卷, 121页)

[7] KMSW, p. 10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42卷, 163页)

[8] Ibid.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42卷, 163页)

[9] KMSW, p. 4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2卷, 112页)

[10] K. Marx, *Capital* (Moscow, 1971) vol. III, p. 81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25卷, 923页)

[11] 关于相反的观点, 可参见下面援引的L. Colletti的文章。

[12] MESC, p. 154.

参考文献

- C. Arthur, *Dialectics of Labour: Marx and His Relation to Hegel* (Oxford, 1987).
- L. Colletti, '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 *New Left Review*, vol. 93 (1975).
-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1978) vol. I, Chs 1 and 13.
- J. Mephan and D. H. Ruben (eds.),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y Vol. I: Dialectics and Method*, (Brighton, 1979).
- R. Norman and S. Sayers, *Hegels, Marx and Dialectic: A Debate* (Hassocks, 1979)
- B. Ollman,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 1971) Pt. I.
- B. Ollman,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1993).
- A. Rattansi, *Marx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1982).
- A. Schmidt,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London, 1971) Pts I and 3D.
- J. Seigel, *Marx's Fate: The Shape of a Life* (Princeton, 1978) Chs 10 and 11.
- L. Wilde, *Marx and Contradiction* (Avebury, 1989).
- L. Wilde, 'Logic: Dialectic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x*, ed. T. Carver (Cambridge, 1991).

第四章

意识形态



评 论

像马克思的许多其他重要概念一样，意识形态概念在法国革命中也可找到它的起源。它的发明人 D. 特拉西 (Destutt de Tracy) 是一个哲学团体的领导人，革命国民会议 (the Revolutionary Convention) 曾经特别指责这家新创立的法兰西学院 (Institut de France) 传播启蒙运动的观念。在特拉西及其追随者看来，意识形态是以理性主义的社会改良的观点对各种观念进行科学研究。然而，马克思赋予该词以一种极其否定的意义。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的这种轻蔑的意义包含两种主要成分：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是有联系的，后者作为一种哲学观，不合适地与唯物主义形成对照：在某种意义上说，一切关于世界的正确观点都必须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其次，意识形态与社会中资源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是有联系的：如果社会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也就受到怀疑。

概括出一种合适的关于社会的唯物主义理论，花费了马克思的一些时间，它因此构成他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框架。讨论社会和经济基础是怎样和为什么在本质上是冲突的，以及意识形态在这种冲突中起什么作用，花费的马克思的时间甚至更长。诚然，正像他的许多核心概念那样，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也是很不清楚的：他对意识形态的评论似乎都是附带的讲话 (obiter dicta)，他从没有提出一种连贯的解释。然而，主要轮廓是清楚的。

在他的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建立了他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借以出现的背景。一开始，他感兴趣的是揭开一些关于世界的宗教概念的面纱，以及由他的前

大师黑格尔阐述的关于国家的高度流动的概念。在这两个领域，两个同类的过程都在发挥作用：首先，代替其他近似方式，存在一种从观念到物质现实的运动；其次，这种颠倒的过程并非不自然地模糊了事物的真实本性。宗教并不明白：“是人创造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马克思继费尔巴哈之后主张，上帝的观念只不过是人的灵感的投射。只要上帝被设想为人类必须依赖其设计的世界的创造者，那么，人类的真实本性——控制其自身的命运、进行自我创造——就要受挫。但是，说宗教是唯心主义的，也不正确：它在不完善的现实中有其根源，而这种不完善的现实同时又是它帮助掩饰的。因此：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1]

在黑格尔的国家概念中，对现实的唯心主义偏见和相应的掩饰这同一个二重过程都在发挥作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是从观念开始并把经验现实当作它的表象的，黑格尔可能通过将它们视为一个和谐的理想总体的最后组成部分，而掩盖社会中现实的和难处理的冲突。

因此，马克思已经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舞台布景。他所批判的错误的宗教和政治的概念并不单单是错误：这些颠倒的概念在现实社会世界中有其基础，这种现实社会世界是如此错误地被构成，以便产生这些补偿性的幻想。所以，下一步骤是探讨这一社会世界，而这一探讨的结果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在一部批判自己的唯心主义的德国同时代人的重要著作中阐述了这点，分派给意识形态的显著地位由该书的标题——《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指明，这部马克思的包含其自己关于社会和历史的一般观点的唯一著作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展开论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试图澄清“颠倒”这一观念，该观念是他从自己对宗教和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中获得的：从人的意识开始并由此推演出对物质现实的探讨，这样做是错误的。正确的研究是其他相近的方式。问题的起源不是错误的观念，而是产生错误观念的错误形成的社会现实的本性：“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

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认为，正是人类回应自己的物质需求的方式，才决定了社会的其他内容。基本的社会过程是满足追求衣、食、住等物质需求。人类是在环绕自己的自然界中满足这些物质需求，这是一个人类为了自身的目的通过劳动过程而变革的世界。正是这种劳动过程——马克思有时称作“物质实践”——构成基本的人类活动，它是任何有效的社会科学的起点。马克思把这一思想概括如下：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个阶段表现为他们的物质行为的第一流出物。这也适用于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种现实世界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思维的产物。^[3]

因此，必须从物质实践来解释意识形态。但是，并非所有观念都是意识形态，马克思并不想简单地创造出一种对特拉西的观念科学的更加动态的颠倒。使观念变成意识形态的，是它们与突出劳动过程之特征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冲突本性的联系。归根结底，这些冲突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劳动分工，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划分开始，它预示着劳动及其产品——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的不平等分配。第二，这使私有财产的存在成为必需，也使这一情形成为必需，其中个人的利益不再与共同体的利益一致。马克思继续说：



正是由于个人的利益与共同体的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体的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个人利益和共同体的利益相分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但却是以现实的联系为基础的共同生活的形式。

这一切的结果是：



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公民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各个不同阶级彼此之间借以进行现实斗争的一些虚幻的形式。^[4]

正是它们与这种阶级斗争及其社会和经济基础的联系，才赋予一定的观念以意识形态的力量。社会实际上是由利益冲突分裂的，但是就其自身而言，为了不土崩瓦解，这些对立必须靠各种观念来掩饰，通过为不对称的社会和经济权力的分配作辩护，这些观念代表了将社会描述为连贯的而不是冲突的各种尝试。因此，马克思的著名陈述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因为那些控制经济生产和分配的人，也调节着观念的生产和分配。马克思选用来证实这点的例子是欧洲紧接封建制度崩溃之后的时期，当时没落的贵族和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都在为掌权而斗争。在这里有那么一个时期，权力是君主、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共享的，权力分离的学说在洛克和孟德斯鸠那里得到了阐述，并被宣布为良好政府的“永恒法则”。尽管实际上它只是反映了争夺权力的阶级的部署。所以，使观念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是他们隐瞒了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真实本性，从而服务于为社会中的社会和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作辩护。由此可以推断，并不是所有观念都具有意识形态性，只有那些服务于掩饰社会矛盾的观念才具有意识形态性。因此，当一切阶级（包括工人阶级）能够制造意识形态时，只是就它服务于推进统治阶级的利益时，它才是意识形态。由于社会及其阶级结构是不断变化的，同一观念可能开始时具有意识形态性，后来不再成为意识形态。

对许多人而言，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似乎破坏了一切道德的基础。所有关于正义和公正的言论都是对阶级立场的简单反映吗？——抑或马克思认为存在某种我们可以诉诸的普遍标准吗？马克思有时热衷于自己对道德言论的谴责。他把“平等的权利”描述为“陈词滥调”，并用自己的现实主义观点去反对“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共有的关于权利和其他废物的意识形态胡说”^[6]。他坚持认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律、道德、宗教……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7]。另外，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也经常充满道德概念，其中，《资本论》中大量富有攻击性的段落只是最惊人的例子。因此，可

以这样来解释：马克思在引号中使用了“正义”之类的词语，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既实践了其自身的原则，又违背了这些原则。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8]按照这种观点：“谈论自然公正是荒唐的……（经济事务的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对应、相适合，它就是公正的。只要它与那种生产方式发生矛盾，它就是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奴役是不公正的；商品质量上的欺骗也是这样。”^[9]同时，也可能认为，马克思有他自己用来判断共产主义社会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常规观点。马克思也许（过于乐观地）认为，一定的道德概念——诸如权利甚至是正义——在无冲突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再需要。但这并不预示着，他的历史观对任何道德判断完全无知。^[10]

尽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做了篇幅最长的探讨，他在自己的更成熟的著作中也提到过它，但有些人还是声称在这两者之间可以发现一种强调重点的重大变化。《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马克思还正在发展自己的思想，因此，它并不包含马克思后来做出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专门分析。它的语调是论辩式的，马克思既没有完成它，一直也没有出版它。然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的一些陈述一直被认为过于简单。例如，像这一陈述：“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11]它就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意识形态只不过是附带现象的幻想，其中每种观念是对一些真实“事物”^[12]的歪曲表述。当然，真实情况是，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著作中界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概念。在其早期的概念中，正如他的暗箱参照系统所证明的，马克思把观念思考为歪曲的或颠倒的现实，因为该现实本身是歪曲的或颠倒的。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尤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非常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形式和支撑它们的生产的本质关系之间的区别。在这里，意识形态被看作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试图掩盖生产的基本关系的（真实的）表面关系。马克思写道：



在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在表面上、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关系时所持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

本质的、但是隐藏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13]

正如在早期概念中一样，在这里，意识形态仍然服务于掩饰和颠倒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但是，除此之外，马克思现在关注意识形态借助这一形式——在这一形式中，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通日常事物处理中是联系在一起——被生产的方式，这同《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好形成对照（在该书中马克思思考的是德国知识分子的生产）。对幻想也不太强调，因为意识形态在这里被视为对某些真实事物的反映，如果肯定是局部的反映的话，而且也被视为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力量。有关这点的最惊人的例子，是单纯关注劳动市场的意识形态的力量，这种劳动市场

确实是人们的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行为者缔结契约，他们缔结的契约只不过是他们借以表达自己的共同意志的法律形式。平等！因为每个人只是作为商品的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个人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每个人都只顾自己。^[14]

在这里，我们浓缩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说明：生产关系中固有的剥削和不平等被流通领域中的自由交换的表象所掩饰，对它的关注产生了关于自由、平等典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在思考马克思的说明的困难之前，提出两个成为他的观念之核心的问题可能会有帮助。第一，在什么意义上，如果可能的话，工人阶级会有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自身的观念能构成一种意识形态吗？通过将思想的本性与那种认为所有思想都是受社会决定的观点混合一起，马克思的确偶尔也给出这种表述。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说：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

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5]

尽管一般背景可能指明，“意识形态”一词的意义意味着非常具有特殊性，最明显的意义是把意识形态等同于一般的意识。而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1859年“序言”对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作的著名概括中，马克思认为，在思考社会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时：

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确定的物质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审美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6]

这里再次表明，似乎是一切实践的观念（包括社会主义）都是意识形态。真实情况是，根本不存在马克思在观念的社会规定和意识形态之间所划的明晰界限，因而他并没有清晰指明，何种社会规定会导致意识形态的思维。而且，同样清楚的是，马克思绝不会把其自身的观念描述为意识形态：他把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描述为“共同揭示出我们的观点同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观点的对立”^[17]。他也不相信，一切社会决定的意识都是意识形态的：甚至在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1859年“序言”的段落中，他对“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测定的变革”同“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通过斗争来解决的……意识形态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研究。^[18]尽管这可能意味着，一切非科学都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轻蔑意义——它到目前为止在马克思那里是最一致的——就会取消这点。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与观念的上层建筑并不相连接，因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既包括意识形态因素，也包括非意识形态因素：例如，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当讨论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时，马克思区分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和“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19]。后一种情况的一个事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所排斥的艺术和诗歌。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观念的上层建筑中的那些因素才是意识形态的,它服务于使宗派的关系永恒化。由此可知,任何阶级都可以生产意识形态,但是,就工人阶级生产意识形态而言,它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它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而言,它就不是意识形态,因为它既不是幻想,也不限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现象。

第二个问题涉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与虚假意识概念的共同等式。^[20]必须达成的第一点是,马克思从未使用过“虚假意识”的表述:这一表述的创始者是恩格斯,他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绝非是贫乏的。对这两个概念恩格斯用的都不多,但是,在他致 Mehring 的信中,有一段常被引用的文字: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21]

第二,在马克思那里,任何将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等同的尝试,都必须依赖于同马克思的后期著作相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理由如上所述。第三,显然,虚假意识的概念对囊括马克思的意义既过于清晰,也过于一般。它既过于清晰是在于,马克思并没有使用过真/假的对立;过于一般,是由于重要的是要知道,所涉及的是何种虚假性,诚然,马克思的观念通常是,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逻辑的或经验的虚假性的问题,而是真理被断言是表面的或误导的方式。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包含几种重要的困难。第一,他的概念中的许多主要构成成分都没有被清楚界定,因而为模棱两可留下了余地。例如,围绕暗箱这一明白比喻的确切意义的辩论,就表明马克思试图通过谈论颠倒来说明意识形态是如何不明了了。这是因为,为了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显然有必要远非简单地以正确方式举证事物。马克思宣布发现了黑格尔以头立地,并要使他重新以足立地——但确切地说,那等于在马克思那里像其他事情一样引起了无数争论。这种情况对矛盾范畴也是真的,据说意识形态掩饰和重新制造了这些矛盾:矛盾概念——它乍看起来是一个逻辑概念——如何能够应用

于现实世界的问题，也是聚讼纷纭的。^[22]这种概念上的不严密部分地要归于这一事实，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非常空泛地谈论着意识形态，这部著作却又写于他的思想还在急速发展的时期，这些表述又是被置于凌乱的手稿之中，而这些手稿是要经过相当的修改才能出版的。另两处突出描述意识形态的地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1859年“序言”和《资本论》的开头——是非常扼要和从不同视角写作的，其他问题就更简略了。因此，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探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一束闪光的洞见”^[23]，而不是一种全面概括的理论。

第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其一般的唯物主义的史观的组成部分，而要精确描述它人所皆知是困难的。社会—经济因素不可能是决定的唯一形式，因为同一种社会—经济环境有差别地决定着不同的事物。如何授予社会—经济因素以特权——对作为唯物主义的史观来说，是必须授予特权的——而又不降格为一种粗鲁的还原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关键问题。马克思所用的传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带有空间性的隐喻，已经造成深刻的误导，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痛苦地要矫正它，这点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

第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史观，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他的意识形态概念，都是被设想为揭露其他人的虚幻概念的批判工具。但是他如何表明其自身就不是意识形态的？尽管马克思对这个“你亦然”（tu quoque）并不像比如说曼海姆那样开放，显然，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并不像他有时意指的那样清晰。他可能提出，通过牢固采纳无产阶级的立场可以避免相对主义，但是，至少可能引起争论的是，这一立场本身至少在好几点上证明是虚幻的。然而，更可能招致损害的是这一主张，即马克思并不怎么是无产阶级的，相反他过于中产阶级化。他的乐观主义的理性主义，他对技术的强烈强调，他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一切都是高贵的维多利亚式的资本主义的产物。正是通过把马克思的方法运用到他自身的理论，我们才能发现有什么价值存在。

文 本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都是不断地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有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个阶段表现为他们的物质行为的第一流出物。这也适用于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人们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东西出发，去达到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是从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出发，而且在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基础上，我们要证实对这种生活过程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幻影，也必然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证实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种现实世界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研究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这种研究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一刻也不放弃它们。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任何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在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的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经验论者（他们本身仍然是抽象的）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聚，也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正是真实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

方：描述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关于意识的空谈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当现实得到描绘时，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科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媒介。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的历史发展的观察中产生的最一般的结果和抽象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适用于促进历史资料的安排，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观察和排列（实际上是描述）自己的历史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解决受到种种前提的支配，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陈述的，而只有在研究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中才能澄清它。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p. 164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1~74页)

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因此，共产主义者决不是要……为了“普遍的”、肯自我牺牲的人而牺牲“私人”……

那些有时间从事历史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他们之所以著名，恰恰是因为唯独他发现了，在整个历史上“普遍利益”是被界定为“私人”的个人所创造的。他们知道，这种矛盾只是一种表面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是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所不断产生的，它决不会用独立的历史去对抗作为独立力量的私人利益——所以，这种矛盾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又消灭，消灭了又产生。因此，这不是黑格尔式的矛盾的双方的“否定的统一”的问题，而是从前的由物质决定的个人的生活方式的由物质决定的消灭，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的消失，这种矛盾连同它的统一也同时跟着消失。

……

如果像霍布斯等人那样，承认权力是权利的基础，那么权利、法律等等只不过是国家权力所依赖的其他关系的一种征兆、一种表现。那些决不纯粹依赖于个人“意志”的个人的物质生活、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分工和私有制仍然是必需的阶段上，是完

全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权力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是创造国家权力的力量。在这些条件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建自己的权力外,他们还必须赋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条件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內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就像民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的那样……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就像它们发展的那样对许多个人是共同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个人,不得不与其他人对立,而同时却主张是代表全体人的利益。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正是这些互不依赖的个人的自我肯定以及他们自己意志的确立(在这个基础上这种自我肯定和自己意志的确立必然是利己主义的),才使自我否定在法律和权利中成为必要,自我否定是在个别场合,而对自己利益的自我肯定是在一般场合(因此,把自我肯定看作自我否定的不是个人,而是“与自身一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也适用于被统治阶级,在决定法律和国家的存在方面,它们的意志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例如,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会一再地产生竞争,那么,尽管被统治阶级有废除竞争以及随之废除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他们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此外,当条件还没有发展到使意志的产生成为可能之前,这个“意志”的出现也只是存在于意识形态家的想象之中。在条件发展到足以产生这种意志之后,意识形态家能够把这种意志想象为纯粹是随心所欲的,因而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情况下都是可能的东西。

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条件斗争,和权利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的结果。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同样也就是那些在权利和法律中发现某种独立存在的普遍意志的幻想家,能够在犯罪中发现对权利和法律的纯粹违背。因此,不是国家由于统治意志而存在,而是从个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中所产生的国家也具有统治意志的形式。如果统治意志失去了自己的统治,这就意味着,不仅统治意志改变了,而且个人的物质存在和个人的生活也改变了,而且也只因为这点,个人的意志才发生变化。权利和意志要得到“继承”是可能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再是统治的了,而只是有名无实的,关于这种情况的明显例子,是由古代罗马法律和英国法律的历史提供的。我们早就看到,在一些哲学家那里,由于思想同个人以及同个人的充当这些思想的基础的经验关系的分离,才产生了纯粹思想的理论和历史。同样,在这里人们也可以使权利和它的现实基础分离,

由此获得某种“统治意志”，这种统治意志在不同的时代会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修正，并且在自己的造物即法律中具有它自己的独立的历史。由此，政治史和市民史在意识形态上就以一部接一部的法律史出现。这就是许多法学家和政治家的独特幻想……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p. 183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75~276、377~379页)

我们讨论的主题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个人的社会地决定的生产，自然构成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十八世纪的平淡的幻想。它们是鲁宾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学习文明史的学生想象的那样，描述了对极度文雅的反动和要复归到被误解的自然生活中去。这同卢梭的使天生独立的个人订立契约并通过契约来建立相互交往的《社会契约论》一样，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它们都是传奇，并且只是大大小小的冒险故事的美学上的传奇。实际上，它们是对十六世纪以来已经进入发展过程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个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的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的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有限的人类聚合体的一部分。对于斯密和李嘉图仍然站在其肩膀上的十八世纪的预言家来说，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它既构成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联合产物，也构成十六世纪以来已经发展的新生生产力的联合产物，所表现的是一种属于过去的存在的理想；它不表现为历史的结果，而是表现为历史的起点。因为这种个人似乎是同自然相一致的，是符合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的。不应该把他看作是历史地发展的，而应该看作是由自然处置的。这种幻想具有过去每一个时代都具有的特征。斯图亚特作为贵族更牢固地站在了历史基础之上并且在许多方面同十八世纪的精神相对立，从而避免了这种观点的率真性。

——*Grundrisse* (1857—1858); KMSW, pp. 345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18~21页]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评论，这部著作的导言曾经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把握，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把握，相反，它们根源于

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然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达到的并且一经获得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绝对必要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法律表述）发生冲突。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开始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自己的意识为依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种社会秩序，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仔细观察这个问题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被指定为社会经济形态中的几个演进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产生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史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Preface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 KMSW, pp. 389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33页)

从施托尔希的著作本身来看，他的“文明论”虽然有一些机智的见解，例如说物质分工是精神分工的前提，但是依然脱不掉陈词滥调。仅仅由一个情况就可以看出，施托尔希的著作必然会如此，他甚至连表述这个问题都还远远没有做到，更不用说解决这个问题了。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的空话而说的。

其次，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

最后，施托尔希所理解的精神生产，还包括统治阶级中专门执行社会职能的各个阶层的职业活动。这些阶层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职能，只有根据他们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够理解。

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像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不考虑这些，就会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十八世纪法国人的幻想。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来代替《伊利亚特》。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1862) vol. 1, pp. 284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I，295~296页)

宗教世界只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对一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来说（在这个社会里，生产者一般都是通过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和价值而互相发生关系，从而他们把自己的个人的私人劳动还原为同质的人类劳动的标准），对这样的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在古亚细亚的和其

他古代的生产方式下,我们发现,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变为商品的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随着原始共同体越来越趋于解体,它的重要性也就提高。真正所谓的从事贸易的民族在古代世界只存在于它的空隙中,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天体之间,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社会简单明了得多。但是,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发展成熟为基础(在原始部落共同体中这些个人尚未切断将他同自己的同胞联系起来的脐带),或者以直接的从属关系为基础。它们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还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因而在物质生活领域内部,人同人之间以及人同自然之间的社会关系相应地都还狭隘。这种狭隘性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崇拜和民间宗教的其他因素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向人提供的个人同自己同胞的关系以及同自然的关系是完全明白和合理的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最终消失……

只有当以物质生产过程为基础的社会生活过程被当作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并按照既定计划受他们的自觉控制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面纱揭掉。但是,这需要社会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生存条件,而这些生存条件转而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过程的自发产物。

诚然,政治经济学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完备),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劳动要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为什么劳动时间要表现为这种价值的量?这些公式表明(在这些公式上以明白无误的字母打着烙印),它们属于一种生产过程支配着人而不是人支配生产过程的社会状态,但对于资产阶级学者来说,这种公式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似乎是由自然所强加的不言自明的必然性。因此,资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形式以前的社会生产形式,就像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

——*Capital*, vol. I (1867); KMSW, pp. 441f. (此处与中译本有所不同,尤其是引文中的第一句话在中文版中不存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96~98页)

人们对社会生活形式的反映,从而他们对这些形式的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的历史发展直接相反的道路。他们是根据在他面前准备好的发展过程的结果、从事后开始的。给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这一烙印的确立成为商品流通的必要前提的那些特征,在人们试图解释它们的意义而不是它们的历史特征(因为在人们的眼里它们是永恒不变的)以前,就已经取得

了社会生活的自然的、自我理解的形式稳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规定，只有全部商品在货币上的共同表现才导致商品作为价值的特征的确立。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种最终货币形式才实际上掩盖了而不是揭示了私人劳动的社会特征，掩盖了而不是揭示了单个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我说，上衣或皮靴同亚麻布有一种关系，因为它是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普遍体现，这个陈述的荒谬性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当上衣和皮靴的生产者将这些商品同亚麻布或其他同样东西、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或银进行比较时，他们是以同样荒谬的形式表述他们自己的私人劳动同社会的集体劳动的关系。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就是由类似形式组成的。它们都是以社会的有效性表现了一定的受历史决定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和关系，即表现了商品生产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达到其他生产形式，商品的全部神秘性，像劳动产品采取商品形式那样长期围绕劳动产品而形成的所有魔法和巫术，就立刻消失了。

——*Capital*, vol. I (1867); KMSW, pp. 438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92~93页)

现在我们知道了，购买者付给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所有者的价值是怎样决定的。购买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在使用权中，即在劳动力的消费过程中才自我表现出来。货币所有者为这个目的在市场上购买一切必需的物品，如原材料等等，并且按十足的价格支付。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消费，像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因此，让我们同钱袋先生和劳动力的所有者一道，离开这个一度嘈杂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表面上发生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我们将最终强力揭开赢利的秘密。

我们正在逃离的这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之内劳动力的买和卖继续进行着——确实是人们的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行为者缔结契约，他们缔结的契约只不过是他们借以表达自己的共同意志的法律形式。平等！因为每个人只是作为商品的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个人只支配自

己的东西。边沁! 因为每个人都只顾自己。使他们相互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 是每个人的利己心, 是每个人的获利, 是每个人的私人利益。人人都只顾自己, 谁也不管别人, 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做, 所以他们都按照事物的预定的和谐, 或者说, 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 为互惠互利、共同幸福、全体人的利益而共同努力……

——*Capital*, vol. I (1867); KMSW, pp. 454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23卷, 199页)

[注释]

- [1] KMSW, p. 6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2页)
- [2] KMSW, p. 16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72~73页)
- [3] KMSW, p. 16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72页)
- [4] KMSW, p. 1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84页)
- [5] KMSW, p. 17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98页)
- [6] KMSW, p. 5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3卷, 306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7] KMSW, pp. 183, 230. (分别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3卷, 27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283页)
- [8] KMSW, p. 56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3卷, 305页)
- [9] K. Marx, *Capital* (Moscow), 1954 III 339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25卷, 379页)
- [10] 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 可进一步参见后面的参考书目, 尤其是布坎南(Buchanan)、吉拉斯(Geras)、彼夫尔(Peffer)和伍德(Wood)的著作。
- [11] KMSW, p. 16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72页)
- [12] See J. Mephram, 'The Theory of Ideology in *Capital*', in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y*, ed. J. Mephram and D. H. Ruben (Brighton, 1979) pp. 143ff.
- [13] K. Marx, *Capital* (Moscow, 1954) III 20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25卷, 232~233页)
- [14] KMSW, p. 45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23卷, 199页)
- [15] KMSW, p. 16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72页)
- [16] KMSW, pp. 389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2卷, 33页)
- [17] KMSW, p. 172. (此处所注出处有误, 据引文译出)
- [18] KMSW, p. 38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2卷, 33页)
- [19] K.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Moscow, 1954) I 28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26卷I, 296页)
- [20] See especially, M. Seliger, *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Ideology* (Cambridge,

1977), pp. 28ff.

[21] MESC, p. 4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2] See L. Colletti, '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 *New Left Review*, Vol. 93 (1975).

[23] B. Parekh,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 (London, 1981) p. 219.

参考文献

H. Barth, *Truth and Ideology* (Los Angeles, 1977) Ch. 3.

A. Buchanan, *Marx and Justice: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 (Totowa, 1982).

G.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1978) Ch. 5.

T. Eagleton,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1991) Ch. 3.

J.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1985) Ch. 8.

N. Geras, '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 *New Left Review*, vol. 150 (March-April 1985).

J. Larrain,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London, 1979) Ch. 1.

J. Larrain, *Marxism and Ideology* (London, 1983) Ch. 2.

J. McCarney, *The Real World of Ideology* (Brighton, 1980) Ch. 1.

J. McMurty, *The Structure of Marx's World View* (Princeton, 1980) Ch. 5.

J. Mepham, 'The Theory of Ideology in Capital', in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y*, ed.

J. Mepham and D. H. Ruben (Brighton, 1970).

B. Parekh,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 (London, 1981).

R. Peffer, *Marxism, 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Princeton, 1990) Chs 6 and 8.

J. Plamenatz, *Ideology* (London, 1970) Ch. 3.

J. Reiman, 'Moral Philosophy: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Ideolog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x*, ed. T. Carver (Cambridge, 1991).

M. Seliger, *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Ideology* (London, 1977).

H. Williams, *Concepts of Ideology* (Brighton, 1988) Ch. 1.

A. Wood, *Karl Marx* (Boston, 1981).

第五章

劳 动



评 论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的手段。他援引维科说：“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彩地概括了这一过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都参与的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人按照自身的协调来引起、调节和控制自身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反应……通过这样作用于外部世界和改变它，人同时也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他开发了自身的沉睡的力量，并且迫使它们按照自己的指挥而行动。”^[2]

这一概念呈现在马克思的自早期以来的著作中：实际上，他至少是部分从黑格尔那里接受它的，在《巴黎手稿》中它是马克思与黑格尔达成一致的关键。马克思赞扬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3]。然而，另一方面，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而自我生成的媒介。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4]。

先前，马克思发现最重要的异化领域是在宗教或政治方面，只是在1844年，他才得出结论，劳动过程构成人的基本异化的领域，这是一个他从未放弃过的观点。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条件做了描述，工人在那里感到，不仅他的劳动产品不属于他自己，而且实际上还逐渐拥有一种敌视他的利益的权力。由此可推断出，工人感觉不到是自由自在地处于生产的行动之中；最终人变得同自己的同事相异化和相敌视。^[5]在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还用四点勾勒出异化劳动的图景，它描绘了——虽然是以一种近乎诗歌的方式——劳动如何可能变成创造人的本质并使之丰富的核心活动。^[6]

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的本质的最明确的陈述产生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在那里，马克思将自己的立场描述为介于亚当·斯密和傅立叶之间的中间方式。在亚当·斯密看来，劳动必然是一种负担和牺牲，休闲才是人的适宜状态；而傅立叶在其对未来的理想描述中，却把工作等同于娱乐和消遣。同亚当·斯密相反，马克思指出，某种正常量的工作对任何人的存在是基本的，在其合适的视界之内，劳动的结果是“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而且，同傅立叶相反，马克思认为：“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7]

分派给劳动的确切功能并不总是清楚的：在《巴黎手稿》中，劳动似乎是——至少在理想上——与一切人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延伸的。然而，在这种联系中，《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主要论题之一是，机器和自动化的发展会给人提供如此多的自由时间，以至他们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能够发展许多才能，至今为止在某种异化的形势下，这些才能长期受到劳动的必然性的妨碍。这一论点在《资本论》中再次得到强调，马克思在那里将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进行了对比。他说，自由王国“事实上……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即使在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下，马克思继续说，人与自然的斗争“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8]。

然而，很显然，马克思认为，劳动的本质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基本上会发生变化。他甚至谈到最终“废除劳动”（abolition of labour）。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他提到，资本的能力就在于“它无休止追逐一般的财富形式”，为的是“超出劳动的自然需要的限度来驱使劳动，从而生产出为丰富的个性的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要素，这点在生产中正如在消费中一样都是普遍的，因此，劳动本身就不再表现为劳动，而是表现为活动的全面发

展,在这种活动中自然的必需以其直接的形式消失了”^[9]。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扼要地宣布:“劳动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是自由的;问题不是解放劳动,而是要废除劳动。”^[10]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基本要素之一,是他关于劳动分工的邪恶影响的观点。这一范畴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基本的。整个国家机器都是分工出现的结果,也要随着分工的消失而解散。分工的消失也会取消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界限。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社会:人们在其中“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一评论(它显然只适合于一种简单的乡村社会)也许并不为人所认真对待,尽管马克思认为,技术和自动化的进步可以使各项任务简化到只要执行和允许从一项工作转移到另一项工作的地步。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虽然没有画家,但是绝大多数人在其他活动中都在从事着艺术创作。”^[11]无论发达的技术社会提出的实际困难是什么,马克思为劳动者设计的模式仍然是《巴黎手稿》中的“全面发展的人”和《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的“社会个人”。

文 本

因此,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同生产的关系。

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但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像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产品不过是生产活动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就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劳动对象的异化不过是对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的概括。

那么,劳动的异化包括什么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痛苦,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能和智能,而是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是一个局外人。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自在,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自在。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强制的、强迫的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一种需要,

而只是满足需要自身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是如何异化的从这一事实明显表现出来，只要不存在肉体的强制和其他强制，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在这一事实中表明了自身，即它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它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正像在宗教中，人的幻想的自身活动，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活动，是作为某种异己的神灵或魔鬼的活动独立地对个人起作用一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自己的自然活动。它属于别人，是他自身的丧失。

——1844 *Manuscripts*; KMSW, p. 8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93~94页)

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像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压力下生产，而人甚至没有肉体需要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他因此而自由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能够自由地将自身同他的产品区分开来。动物只是按照他所属的那个种的标准和需要来塑造事物，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事物。

因此，正是在对客观世界的塑造中，人第一次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因为他不仅在心灵中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在现实中能动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可以看到他的映像。

——1844 *Manuscripts*; KMSW, p. 8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96~97页)

可是，劳动力的表现即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够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劳动就是牺牲他的生活。劳动是他已经转让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

产品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黄金，也不是他建成的宫殿。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宫殿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一个工人用12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12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坐在酒吧里，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另外，在他看来，这12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挣钱，挣钱使他能够吃饭、喝酒、睡觉。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1849); KMSW, pp. 250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35~336页)

更进一步的分工使1个工人能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5倍、10倍乃至20倍。工人不仅通过将自己出卖得比别人便宜些来进行竞争，他们还通过1个人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来进行竞争；资本所引入的和不断扩展的分工就这样迫使工人在自己之间进行竞争。

其次，分工越扩展，劳动就越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变得毫无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需要使用紧张的体力或智力。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

因此，劳动越是令人不满意，越是令人厌，竞争也就越扩展，工资也就越减少。工人想维持自己的工资总额，就得多劳动，多工作几小时或者在一小时内生产更多的产品。因而，工人受需要驱使，就会进一步扩大分工的恶果。结果就是：他工作得越多，他所得的工资就越少，而且因为这一简单的原因，他同他的工友们的竞争就会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因而使得他的工友们变成如此众多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也像他本人一样按照同样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所以，他归根结底是同他自己竞争，是同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自己竞争。

机器通过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在更大范围内也造成同样的结果。每当哪个地方新引入机器，将大批手工工人抛向街头，每当哪个地方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代替，并将工人一批一批地排挤出去，机器就在哪里造成同样的

结果。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1849); KMSW, pp. 265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60~361页)

对特定种类的劳动的不关心，意味着存在一种高度发达的不同的具体劳动种类的总体，在这些不同的具体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通常只是产生在最高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特征似乎为许多东西所共同拥有，对一切东西都是共同的。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外，劳动的这一抽象只不过是不同种类劳动的具体总体的结果。对特定种类的劳动的不关心，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这种转移使得哪种特定种类的劳动为他们所共有，对他们说来是无关紧要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它不再以某种特殊方式同个人相结合。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可以发现这种事物状态的最发达的形式。也只有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才在实际上成为现实。所以，这个被现代政治经济学确定为起点的、表现出一种可以回溯到古代却又在一切社会形式中流行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真正表现为现实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说，在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对特定种类的劳动的不关心——在俄罗斯人那里，比如说，就表现为自发的天然的规定。但是，不管是野蛮人具有天然的预先规定使他们同样适用于一切事物，还是文明人将自身运用于一切事物，都使世界上的一切具有了差异。此外，俄罗斯人对他们从事的劳动的这种不关心，同他们仍然被固定在一项十分确定的职业的轨道上的传统实践是相适应的，直至他们由于外部的影响从这种传统实践中解脱出来。

——*Grundrisse* (1857—1858); KMSW, pp. 354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42~43页]

大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大工业所依赖的基础——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不再构成或创造财富；与此同时，直接劳动同样不再是生产的基础，这既因为直接劳动越来越变成看管和调节的活动；也因为产品不再为单个直接劳动所创造，而是源自社会活动的结合的结果。“随着分工的发展，几乎每

个人的劳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没有任何东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人们发现，在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中，直接的个人劳动是在某个特殊产品或产品的一部分中实现的，而它的共同的社会性质——诸如一般劳动的对象化和一般需求的满足——只有通过交换才被确立。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则发生相反的情形：一方面，一旦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达到自动化过程的水平，其前提就是自然力服从于社会的智力，另一方面，个人劳动以其直接形式变成社会劳动。于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另一个基础就消失了。

——*Grundrisse* (1857—1858); KMSW, p. 38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22~223页]

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生产成本的最小化和降到最小化）；但这种节约与生产力的发展是同一的。所以，节约决不意味着放弃乐趣，而是意味着发展力量和生产能力，因而既是发展享受的能力，又是发展享受的资料。享受的能力是享受的条件，因而是享受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因而是生产力的发展。节约劳动时间意味着增加自由时间的数量，即增加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全面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的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被视为固定资本的生产；这种固定资本是人自身。也很显然，直接劳动时间不可能同自由时间永远处于抽象的对立中——就像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所看到的那样。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傅立叶的最大价值在于，他宣布最终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产方式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自由时间——它既包括闲暇时间也包括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享受它的任何人都变成一个不同的人，而正是这个不同的人进入直接的生产过程。正在塑造中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戒律，而对已被塑造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就是实践，经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可自我对象化的知识，他在自己的头脑中包含了积累的社会智慧。在劳动要求实际操作和自由运动这个程度上说，这两种人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就像在农业中那样找到了锻炼。

——*Grundrisse* (1857—1858); KMSW, pp. 383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25~226页]

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睿智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从废除农奴制后产生的

自由劳动或雇佣劳动出发，那么机器只能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作为一种敌对的力量和异化的财产，才能发展，也就是说，它们必然作为资本同工人对立。但是同样很容易看出，一旦机器变成了比如说联合的工人的财产，它们就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中介。但是，在第一种情形中，机器的分配手段（实际上它们并不属于工人）本身就是雇佣劳动得以建立的生产手段的条件。在第二种情形中，一种改变了的分配手段将从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新的、改变了的生产基础中派生出来。

——*Grundrisse* (1857—1858); KMSW, pp. 385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362页]

工人自己的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说，工人自己的社会劳动的形式，是完全不以单个工人为转移而形成的关系；工人由于从属于资本，变成了这些社会构成的要素——但是这些社会构成并不属于他们。因而，这些社会形式，作为资本本身的形态，作为属于资本的、不同于工人的单个劳动力的、从资本中产生并被并入资本的结合，同工人相对立。并且这一点随着下述情况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实在的形式。这些情况是：一方面，工人的劳动力本身变得如此受这些形式改变，以至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时，也就是说，处在这种资本主义关系之外时，就变得无能为力，它的独立的生产能力被摧毁了；另一方面，随着机器的发展，劳动的条件似乎也在工艺方面统治着劳动，同时它们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1862); KMSW, p. 39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I，420页)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的独自努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实验的价值不能过高估价。工人不是通过辩论，而是通过行动表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的要求进行的生产，在不存在雇用这些“手”的雇主阶级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要取得成效，劳动资料就没有必要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勒索劳动者本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繁荣的形式，在联合劳动以自愿的手、轻松的精神和愉悦的心情辛勤劳作之前，它注定要消失。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劳动者尝试的实验，实际上是那些并非由谁发明而是在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与实际

结果。

——*Inaugural Address* (1864); KMSW, p. 536. (此处与中译本有所不同,特别是“对这些伟大的社会实验的价值不能过高估价”这句话,在中译本中是“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可能英文本有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12页)

让我们换一个方面为自己描绘一个自由个人的共同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在这种劳动中,所有不同个人的劳动力都被自觉地当作共同体的联合的劳动力来使用。在这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特征又重现了,但却是带有这种差异,即它们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个人性的。鲁滨逊所生产的一切只是他自己个人劳动的结果,因而只不过是他人本人的使用对象。我们的共同体的总产品是一种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被重新用作生产资料,但仍然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共同体成员消费。因此,在他们之间进行这种比例的分配是必要的。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共同体的生产组织和生产者所达到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的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单个的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按照一定社会计划进行的劳动时间的分配,就会在应做的不同种类的劳动和共同体的不同需要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另外,劳动时间又充当了每个人所承担的共同劳动部分的尺度,因而也充当了指定给个人消费的总产品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无论在有关个人的劳动还是劳动的产品方面,既然单个生产者的社会关系都是完全简单明了的,那么它在不仅有关生产而且有关分配方面也应该是完全简单明了的。

——*Capital*, vol. I (1867); KMSW, pp. 440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95~96页)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都参与的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人按照自身的协调来引起、调节和控制自身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反应。人自身作为他自己的自然力之一与自然相对立。为了以适合他自身需要的形式占有自然的产物,人就使臂和腿、头和手这种他身体上的自然力运动起来。通过这样作用于外部世界和改变它,人同时也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他开发了自身的沉睡的力量,并且迫使它们按照自己的指挥而行动。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那些令我们想起纯粹动物的原始本能的劳动形式。将人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带到市

场上出售这种事物状态同人类劳动仍然处于自己的最早本能阶段那种状态分离开来，已经有了一段不可估量的时间。我们以某种打上其烙印的形式把劳动设想为只是人的劳动。蜘蛛行使的操作类似于织工的操作，蜜蜂在建筑蜂房方面令建筑师都惭愧。但是，使最蹩脚的建筑师与最灵巧的蜜蜂区别开来的是这点：建筑师在实际上建立自己的结构之前，他在想象中就创立了它。在每一次劳动过程结束时，我们得到的是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的结果。他不仅使他劳动的物质对象发生形式的变化，他也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即赋予他的做法以规律，并且他必须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于这个目的。但这种服从绝不仅仅是临时的行动。除了行使身体器官之外，这一过程要求：在整个操作中，工人的意志必须牢固地与自己的目的相一致。这意味着集中注意力。工人越不被劳动的性质和实现它的方式所吸引，从而他越不把它作为某种给他的身体和精神力量带来娱乐的东西来享受，他的注意力就越是被迫要集中。

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是：(1) 人的个人活动，即劳动本身，(2) 劳动的对象^①，(3) 劳动工具。

给人提供现成的必需品或生活资料的处于原始状态中的土地（在经济学上说，也包括水），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并且是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所有那些劳动仅仅使之从与人的环境的直接联系中区别开来的东西，都是自然自发提供的劳动的对象。例如我们从自然的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和捕获的鱼，我们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以及我们从矿藏中开采的矿石。另外，如果劳动的对象可以说是通过以前的劳动过滤了的，我们就称之为原料，例如，已经开采出来和准备洗的矿石。一切原料都是劳动的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的对象都是原料；劳动的对象只有在经历了劳动资料的某些改变之后，才变成原料。

劳动的工具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的对象之间、充当自己的活动的传导者的物或物的复合体。他利用某些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特性，以便使另一些物质服从于自己的目的。撇开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不论（在采集果实时，人自身的肢体充当了劳动的工具），劳动者自身拥有的第一件东西并不是劳动的对象，而是劳动工具。因此，自然变成了他活动的器官之一，一种他附加在他自身的躯体器官上的器官，从而不顾圣经的训诫而延伸了自身的肢体。正如地球是他的原始食品库一样，地球也是他的原始工具

^① 原文是 the subject of that work，下面“对象”一词均是 subject 的中译。——译者注

房。例如，地球提供石头给他投、磨、压、切等等。地球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的工具，但是当它在农业上被用作劳动的工具时，则是以一系列的其他工具和一种劳动的较高的发展为前提的。一旦劳动经历一点发展，它就需要专门准备的工具。因此，在最古老的洞穴中，我们就发现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类历史的初期，被驯服的动物，即有目的饲养的、已经经过劳动资料改变的动物，连同专门准备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一道，也曾作为劳动的工具起着主要的作用。劳动的工具的使用和制作，虽然以萌芽状态存在于某种动物之中，但却是人类劳动过程的专门特征，所以富兰克林把人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正如化石骨对探索灭绝的动物物种所起的作用那样，过去的劳动工具的遗物对探索灭绝的社会的经济形态具有同样的意义。使我们能够区分不同的经济时代的，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工具生产。

——*Capital*, vol. I (1867); KMSW, pp. 455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201~204页)

[注释]

- [1] *Capital*, p. 3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09~410页注释)
- [2] KMSW, p. 45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201~202页)
- [3] KMSW, p. 10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63页)
- [4] Ibid.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63页)
- [5] Cf. KMSW, pp. 78ff.
- [6] Cf. KMSW, pp. 121f.
- [7] KMSW, p. 3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113页]
- [8] KMSW, pp. 496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926、927页)
- [9] *Marx's Grundrisse*, pp. 85f. (查该书英文版，第85页没有这段引文，疑页码有误，这里照引文译出)
- [10] *The German Ideology*, p. 22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23页)
- [11] KMSW, p. 19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5页。在中文版中，这句话是：“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参考文献

C. Arthur, *Dialectics of Labour. Marx and his Relation to Hegel* (Oxford, 1986).

- S.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1968).
- R. Beamish, *Marx, Method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llinois, 1992).
- D. Braybrooke, 'Diagnosis and Remedy in Marx's Doctrine of Alienation', *Social Research* (Autumn 1958).
- J. Elster, 'Self-realization in Work and Politics: 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the Good Lif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vol. 3 (Spring 1986).
- J. Mepham and D. H. Ruben (eds.),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y*, vol. I: *Dialectics and Method* (Brighton, 1979).
- J. Miller, *History and Human Existence: From Marx to Merleau-Ponty* (Berkeley, 1979) Ch. 3.
- B. Olman, *Alienation: Marx's Critique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 1971).
- L. Seve, *Man in Marxist Theory* (Hassocks, 1978), end of Pt2.
- I. Walliman, *Estrangement: Marx's Concep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Westport, 1981).

第六章

阶 级



评 论

阶级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显然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的公开口号是：“至今一切现存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是基本的社会集团，借助于它们的冲突，社会按照它在经济基础中的变化而发展。在过去马克思认为，当一个阶级能够使自身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认同时，革命就会发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写道：“每一个企图取代它之前的统治阶级的新阶级，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才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进行革命的阶级……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社会全体的代表出现的。”这些“认同”（identifications）在过去证明是非常短的时期；但是，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的地位，这既是由于阶级系统的简化，也是由于它的纯粹成员结构。因此，从时间上看，下一场革命会开辟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阶级像国家和异化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一种描述其充分程度的暂时现象。^[1]

从阶级观点对马克思的重要性来考虑，可能有人会奇怪，他对该概念并未提供系统的分析。他试图这样做的唯一地方，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然而，由于他逝世而中断，它本身并不完整。^[2]马克思通过提问而开始这一段落：有多少阶级存在？他回答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三大阶级——雇佣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然而，通过这一主张他直接限定了这点，即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阶级的分层并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甚至中等和中间的阶层就消弭了到处都存在的界限（尽管难以比较这种界限在农村

地区比城市要小)”。然而,通过产生两个并且只有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迅速简化了形势。不仅“中等和中间的”阶层被挤压出来,地主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所有工人最终变成了雇佣劳动者,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增加了某些人的财富,并迫使其余人降格为无产者。

因此,马克思询问第二个问题:什么使上述三个集团变成三大社会阶级?他的回答是:“乍一看,好像就是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三大社会集团的成员,即形成这些集团的个人,分别靠工资、利润和地租来生活,也就是分别靠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资本和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来生活。”他接着提出异议,例如,这个标准使医生和公务员都变成分离的阶级;对上述提到的三大阶级内部的其他集团,同样情况也是真的。然而,由于手稿在此中断,异议得不到回答。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不大系统的陈述可能有助于回答《资本论》中提出的这一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运用了两种阶级的模式:“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资产阶级被界定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雇佣劳动的雇主,无产阶级被界定为不拥有生产资料和靠出卖自己的雇佣劳动而生活的人。因此,属于一个阶级的标准是人们在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中的地位。

正是这种两种阶级的模式成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悲惨化的观念的理由。马克思从未主张,无产阶级会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变得悲惨化。^[4]这种观念与他关于人的需要以社会为中介的观点是不协调的。他所主张的是,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和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之间在资源上的鸿沟会扩大。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他对房屋和宫殿的比喻,已经使这点很清楚:



一座房子可能大也可能小;只要周围的房子都是同样小,它是能满足对住房的一切社会需求的。但是,如果让一座宫殿耸立在这座小房子的近旁,它就会由小房子缩成茅舍了。这座小房子现在表明,它的拥有者只能有极低的要求或者决不能有什么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在文明的过程中扩张得多厉害,只要临近的宫殿以同样的或者甚至更大的程度增长,那座相对小的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服,越发不满意,越发受压抑。^[5]

但是,这种两种阶级的模式并不是马克思对“阶级”一词的唯一用法。他还将这个词汇运用于其他经济集团,特别是运用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这些集团似乎使得《共产党宣言》中的整洁分界不再适用,因为按照他们雇用多少工人或他们拥有多少土地,这两大集团显然归于资产阶级。马克思甚至预见,随着机器使用的增长和服务业的增加,会降生一种新中产阶级,他还批评李嘉图忘记了“介于工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6]。

还存在一些其他的仍是较为居间的集团:例如,农业劳动者似乎就是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站。尽管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常规描述只适用于产业工人,然而他有时也说,无产阶级包括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因此也必须包括农业劳动者。在1875年对巴枯宁的评论中,他谈到这样一种情形的可能性:“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7]在同一评论中,他还认为,有时甚至拥有土地的农民也属于无产阶级,尽管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抵押自己土地的负担意味着,他并不真正拥有它,结果他只能是为某些其他人工作。如果因此把农民看成是无产阶级和作为资本家的地主,那么,我们就是又运用了那种两个阶级的模式。因此,马克思认为农民政治上是一个反动的集团,而不愿意以都市无产阶级来归集他们:最近西欧的农民运动具有封建的或专制的倾向。

马克思分析时感到困难的第二个居间集团,是他本人隶属的这一集团——知识分子。他经常将他们指称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和代言人”。“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8]。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把知识分子称作资产阶级的“带薪的雇佣劳动者”,尽管显然在某种意义上不同于无产阶级所属的那种。马克思还认为,撇开他们的阶级背景不论,一定的知识分子至少在社会的一定方面能得到某种客观评价,特别是他们信任古典经济学者(如李嘉图)或英国工厂巡视员具有这种客观观点。

实际上,马克思经常把知识分子指称为“意识形态的阶级”,这表明,他有时是在不特别参考某个集团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而使用这一表述的。例如,马克思把“中间阶级的下层”说成由“小商人、店主、手工业者和农民”组成。^[9]在英国,马克思谈论过“统治阶级”,他甚至走得如此之远,说什么金融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构成两个不同阶级”。在社会等级的另一个终端,存在一个马克思所谓“流氓无产阶级”的阶级。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

克思把他们描述为“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其组成部分都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屑生活的分子，无一定职业的人们，即游民，没有家庭生活和无家可归的人”^[10]。换句话说，流氓无产阶级是社会中逃避现实社会的人，他们在社会发展中没有利害关系，因而不能扮演历史的角色。他们常常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愿意向资产阶级出售自己的服务。

不仅随着他的思想的发展，而且甚至在同一时期，马克思的阶级定义似乎也极其不同。马克思经常把这一词汇——按照他的时代的共同用法——用作派别或集团的同义语。

然而，可以得出两点一般论点：将社会划分为资本家、无产阶级和地主三个阶级，是马克思最通常的用法。他本人并不考虑去分析一种稳态的社会，他有时用来指称“阶级”的许多集团实际上在迅速消失。在马克思看来，甚至土地拥有者阶级最终也分解为资本家阶级或无产者阶级，这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仅有的两个阶级。

另外，马克思在自己的阶级定义中还有一种动态的或主观的因素：一个阶级只有当它意识到自身时才存在，这永远预示着对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共同敌视。一个阶级总是视自身的利益与其他集团的利益为对立的，并必须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反对它们。因此，马克思有时甚至对资本家是否构成一个阶级也很犹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谈到它们时说：“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作为竞争者又是相互敌对的。”^[11]同一情况也适用于无产者：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把乌托邦社会主义说成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无产者尚未发展到足以使自身形成一个阶级，因而无产者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不具有政治特性”。在同一著作中马克思谈到无产者时还说：“这批人已经是一个同资本对立的阶级，但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12]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则说：“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本身之间的竞争而受到破坏。”^[13]后来在1866年，马克思说第一国际（the International）是“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14]的工具。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法国农民时，他最清楚地提出了这一点：



就数百万家庭生活同样的经济条件之下，而这些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文化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文化各不相同并互

相敌对而言，他们形成一个阶级。就这些小农之间只存在一种地域的联系，并且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任何共同体，形成任何民族联合，形成任何政治组织而言，他们又不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强化自己的阶级利益。^[15]

必须注意，在这一联系中，尽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工人没有祖国，但他用过“民族阶级”的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他还说：“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16]

因此，马克思在运用“阶级”一词时有许多标准，但并不是它们全都适用于一切时代。两个主要标准是同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关系，以及某一集团作为具有服务性政治组织的阶级对自身的意识。马克思绝对不主张对发现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存在或阶级斗争抱任何信念：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做到这点。马克思视为自己观念中新奇的东西是，他认为自己表明了阶级存在同生产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有联系，以及阶级斗争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和无阶级社会。^[17]

文 本

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

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要夺取这种解放者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

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要使人民革命同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完全一致，要使一个等级被承认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陷就必定相反地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定成为引起普遍不满的等级，成为普遍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定被看作是整个社会中昭彰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个等级真正 [par excellence] 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等级就必定相反地成为公开的奴役者等级。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消极普遍意义决定了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积极普遍意义。

——*Introduction to a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1844); KMSW, p. 7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2~13页)

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社会集团解体的社会集团，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这个阶级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地位，而只能求助于人的地位。它不是同德国政治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全体处于全面的对立。最终，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它是对人的全面拯救。这种社会的解体，作为一个特殊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Introduction to a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1844); KMSW, pp. 72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4~15页)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

这个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 17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98~99页)

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自卫都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的开辟，使一些分离的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市民的许多地域性团体中，知识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同现存关系相对立并由于这些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便成了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对立所决定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同样的条件、同样的矛盾、同样的利益，必然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习惯。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由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既存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同时资产阶级把早期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迄今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作为竞争者又是相互敌对的。另一方面，阶级转而对个人来说又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因此，这些个人发现自己的生存条件是预先确定的，因而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他们每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至于个人隶属于阶级怎样同时发展为隶属于各种各样的观念，等等，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了。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pp. 69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17~118页)

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

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 1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90页)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基本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创造。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母体中所能产生的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的统治呢？不是。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资产阶级秩序的第三等级的解放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和一切秩序一样。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在这期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达到最高的表现，就是总体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的社会最终将出现严酷的矛盾、将导致肉搏的冲突，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的事物秩序中，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1847) pp. 214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97~198页)

海因岑先生对“政治和社会条件之间的联系”及“阶级关系”同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系进行如此深刻的说明之后，得意扬扬地宣布：“我已经避免了把人分为阶级或是按照他们的职业将他们对立起来的‘共产主义者的局限性’。我认为这一‘可能性’是悬而未决的，即‘人性’不总是由‘阶级’或‘钱

包的大小’来决定的。”粗俗的常识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的大小’，把阶级对立变成了行业之间的争吵。钱包的大小纯粹是数量上的差别，它恐怕可以使同一阶级的任何两个人发生对抗。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行会是在职业的基础上使人们彼此对立的。但是大家也知道，现代的阶级差别绝不建立在职业的基础上；相反，分工在同一阶级内部造成完全不同的工种。

特殊的个人在自己的态度上并不总是受他所从属的阶级影响，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移到 tiers état [第三等级] 方面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而且就在这时，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个阶级，即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然而，海因岑先生却硬要看到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庄严的思想面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认为，以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并在相互对立的关系中受这些条件制约的全部阶级，可以靠一切人所固有的“人性”的品格而超越出自己的现实关系，那么，某一个君主靠“人性”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权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职业”，该是多么容易啊！

——*Moralising Criticism and Critical Morality* (1847); KMSW, p. 2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343~344页)

至今一切现存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性重建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更早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被复杂地安排为不同的秩序，看到社会等级被划分为多种多样的阶层。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学徒、农奴；而在几乎所有这些阶级中又有一些附属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毁灭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建立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以代替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个不同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KMSW, p. 22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2~273页)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本身之间的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自身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特别利益。因此，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获得通过。

旧社会的阶级间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进程。资产阶级发现自身卷入了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发现自己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拉进了政治舞台。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提供给了无产阶级，换言之，资产阶级给无产阶级装备了用来反对自身的武器。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了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这些也给无产阶级提供了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关键时刻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实际上也是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呈现为一种剧烈的、耀眼的特征，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自身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较早时期的贵族中的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KMSW, pp. 228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1~282页)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 KMSW, p. 31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217页)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Marx to Weydemeyer* (1852); KMSW, p. 3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47页)

[注释]

[1] KMSW, p. 1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2、100页)

[2] Cf. KMSW, p. 506.

[3] KMSW, p. 2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3页)

[4] 正如在更宽泛的语境中表明的，在这一方面通常援引的《资本论》中的这段话只涉及大批不断增加的失业者。

[5] KMSW, p. 25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9页)

[6] KMSW, p. 40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6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7] KMSW, p. 561. (此处引文与英文原著在文字上有所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6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8] *The German Ideology* p.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53页)

[9] KMSW, p. 2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0页)

[10] K. Marx,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MEW I 15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28页)

[11] *The German Ideology*, pp. 48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18页)

[12] KMSW, pp. 212, 2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57、196页)

[13] KMSW, p. 2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1页)

[14] Marx to Kugelmann, MEW XXXI 5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533页]

[15] KMSW, pp. 317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217页)

[16] KMSW, p. 23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1页)

[17] Cf. KMSW, p. 3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8卷，509页)

参考文献

- E. Andrew, 'Class in itself and class against capital: Karl Marx and his classifier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1983)
- E. Balibar, *Masses, Classes, Ideas: Studies i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before and after Marx* (London, 1994).
- L. Benson, *Proletarians and Parties* (London, 1978) Ch. 1.
- S. Bloom, *The World of Nations*, 2nd ed. (New York, 1967) pp. 57 ff.
- A. Carter, *Marx: A Radical Critique* (Brighton, 1988) Ch. 4.
- G. Cohen,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January 1968).
- R. 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1959) Ch. 1.
- H. Draper, 'The Concept of the Lumpenproletarian in Marx and Engels', *Cahiers de l'Institut de Science Economique Appliquée* (December 1972).
- J. Elster, 'Three Challenges to Class', in *Analytical Marxism*, ed. J. Roehmer (Cambridge, 1986).
- K. Graham, 'Class—a simple view', *Inquiry*, vol. 32. (1989).
- D. Hodges, 'The Intermediate Classes in Marxian Theory', *Social Research* (1961).
- K. Kumar, 'Can the Workers be Revolutionar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6 (1978).
- M. Levin, 'Marx and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Autumn 1980).
- S. Lipset and R. Bendix, 'Karl Marx's Theory of Social Classes', in *Class, Status and Power*, ed. Lipset and Bendix (Glencoe, Ill., 1953)
- H. Mayer, 'Marx, Engel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easantry', *Études de Marxologie* (1960).
- M. Nicolaus, 'Proletariat and Middle Class in Marx', *Studies in the Left* (1967).
- B. Ollman, 'Towards Class Consciousness Next Time: Marx and the Working Class', *Politics and Society* (1972).
- F. Parkin,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London, 1970).
- J. Roeh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Pt. II, (Cambridge, 1986).
- H. Rosenberg, 'The Pathos of the Proletariat', *Kenyon Review* (1949).
- W. Wesolowski, 'Marx's Theory of Class Domination', in *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 ed. N. Lobkowitz (Notre Dame, 1nd, 1967).

第七章

政 党



评 论

同他在阶级观和国家观方面所做的相比，马克思对他认为为工人阶级所必需的政党，并没有提供较系统的说明。他从未创立过一个政党，许多年里只是任何党组织的一个成员。尽管从很早开始，他把无产阶级看作社会变革的行动者，他总是将自己的政治活动建立在现存的组织基础上，特别是在他晚年的岁月中，他对正在成长中的工人政党提出了许多告诫。在说明马克思的观点方面固有的两个困难是：第一，只是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现在意义上的政党观念才得到发展；第二，马克思本人是在极其不同的意义上运用这一词汇。马克思最活跃的两个时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1847—1852年）和第一国际时期（1864—1873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6 年发起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不是政党，只是在欧洲城市中的革命群体之间交换思想的媒介。在致蒲鲁东的一封信中描述这一组织时，马克思说，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1]。然而，在 1847 年邀请领导人时，马克思变成了正义者同盟的一员，尽管他认为它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小的国际密谋组织的特征。他后来还多次写道：“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屏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2] 1847 年，它被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完全民主的宪章，该宪章规定，所有官吏都由成员选举产生，并一直对成员负责，领导机构是年度大会。

正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中勾勒了自己的共产党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者要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要求，既不是基于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分离的利益，也不是基于与他们自身的任何宗派主义的原则。“共产党人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1）在不同国家的无产者的民族斗争中，共产党人指出和重视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2）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3]因此，他们既是工人阶级的“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而且“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大批无产者的地方在于他们清楚地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路线、条件和最终的一般结果”^[4]。至于其他对立的政党，当向自己的成员灌输自身阶级利益的排他性时，共产党人“支持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任何革命运动”。在法国他们支持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瑞士支持激进派，在德国支持自由资产阶级，等等。尽管其纲领被称作《共产党宣言》，在1848—1849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从未作为一个真实的政党发挥作用，即使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使用该词的含义上，在当时环境下它也不能这样做：它至多只有300名成员，并且总是被迫以半秘密的方式活动着。在1848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似乎已被马克思解散，因为他宁愿通过出版界而工作；1849年4月，当马克思首次发现一个独立的有组织的工人政党的需要和潜能时，已经太晚了，因为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意味着革命的终结。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以伦敦为中心得到重新组织。在它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马克思对从中央委员会到各个团体的好几个指示负有责任。其中最重要的是写于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the Address），号召建立一个“独立的、秘密的和公共的工人政党组织”。这个政党将同其他对立的政党分离，并从已经存在的工人协会的核心中建立，这些协会通常具有社会或教育的本性。约莫在这个时期，马克思终止了与布朗基的流产的联盟，他的共产党观念完全不同于布朗基：在马克思看来，政党应该旨在成为一个群众的党，既不应该通过革命暴动得到权力，也不应该是高度集中的；他还警告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工人要达到阶级意识。他写道：“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5]到1850年夏季，马克思已经相信，一场直接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在这一问题上，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为两部分：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希望继续从事旨在促进一场直接革命的活动，而马克思

告诫工人，在他们准备革命之前，他们可能要经历五十年的内战。马克思随后把共产主义者同盟说成“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6]。

从1850年早期开始到1860年中期，马克思并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1851年5月他向恩格斯写道：“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作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7]然而，马克思是在两种意义上继续指称自己的“党”。第一，当他谈论“重新恢复我们党”或“坚持党的原则”时，他指的是自己的隐秘追随者的小团体，它经常被自己的熟人称作“马克思党”。第二，马克思是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例如在致弗莱里格拉特(Freiligrath)的信中，当时他“是在重要的历史意义上理解‘党’”，或者像后来把巴黎公社说成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8]。

马克思作为某个政党的成员活动的第二个时期是以第一国际为契机的。在这里，马克思的政策对有关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观点予以了公正的指明。工人国际协会并不是马克思创造的；它是自发成长起来的，它的主要目的起初是保护英国工会不受外国劳工进口的冲击。它绝不是一个共产党，马克思的追随者在其中也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团体。即使是在联合的权利尚不存在的国家，马克思也反对在第一国际内部有秘密团体。他宣布：“这种组织形式妨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为这些团体不是对工人进行教育，而是要工人服从束缚工人的独立自主和模糊他们意识的那些强制性的和神秘的法规。”^[9]马克思想要的协会的规则具有尽可能广的范围，例如，包括蒲鲁东和拉萨尔的追随者。正如他在致库格曼(Kugelmann)的信中所写的，他只希望第一国际处理这些事情：“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10]。甚至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已经相信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需要更多的纪律和独立，他仍然不迫切要求第一国际进一步集中化：1871年伦敦会议要求“把工人阶级组成政党”，只是指独立的民族政党。与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争吵导致第一国际的终结，那只是一场关于组织而不是关于意识形态的争吵：马克思要求一种在年度会议上由多数投票做决议的民主的、开放的组织，而巴枯宁却赞同具有等级制组织的秘密社会。在第一国际后来的岁月中，由于国际外部反对势力和国际内部破坏性因素的增长，马克思被迫为一种更有效的中央

控制而斗争。

马克思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先驱者的评论表明了同样的关注。他批评拉萨尔的追随者创造了一个过分强调纪律和教条主义的政党。但是，就他对1875年的《哥达纲领》（它统一了至当时为止德国工人的对立的两翼）的疑虑而言，马克思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甚至指称它为“我们党”。在他关于这一论题的最后声明之一中，马克思于1879年给该党的领导人发了一份通告，劝告他们防止该党受到各种外国价值的污染。^[11]

总之，马克思的政党概念从不是某种理想制度，而是一直建立在政治组织已经存在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他的确坚持，这种政党必须有一个完全民主的内部组织；它必须是工人自身的独立创造；它必须不同于对工人阶级的目标的理论理解；它的组织通常不是作为任何其他政党的一部分，或是依赖于这些组织。

文 本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本身之间的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自身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特别利益。因此，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获得通过。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KMSW, pp. 228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1~282页)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对立的孤立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自身的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1. 在不同国家的无产者的民族斗争中，共产党人指出和重视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2. 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 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 在实践方面, 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中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 是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 在理论方面, 他们胜过大批无产者的地方在于他们清楚地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路线、条件和最终的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直接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直接目的一样的: 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KMSW, p. 23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285页)

革命的工人政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 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 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 工人政党都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

——*Addres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Communist League* (1850); KMSW, p. 2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367页)

从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来, 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去了在这个短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一切权利: 新闻出版、言论自由和结社权, 也即失去了党组织的种种合法手段。尽管在反动时期, 资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都还是能在它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中通过彼此联合和或多或少促进它们拥有的共同利益找到亲善的可能性, 但在1849年以后, 正如同在1848年前一样, 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部署中只有一种手段: 秘密结社。这就是为什么从1849年以来, 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社团, 警察当局破获它们, 法庭迫害它们, 判处监禁解散它们, 而形势又不断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

……

因此, “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一个阴谋家团体, 而是一个秘密地进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团体, 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被公开地和强制地剥夺了出版、言论和结社的权利。如果这样一个团体也进行密谋, 那么, 这只能是在蒸汽和电密谋反对现状的意义上来说的。

不言而喻, 这种不是把组织未来的执政党而是组织未来的反对党作为自己的目的的秘密团体, 几乎不可能吸引那些企图在密谋的戏剧斗篷下显得自己的个性无效的个人……

——*The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1853); *MEW* VIII, 458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521~522页)

“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

在“党”这个词语上，我是在重要的历史意义上理解“党”。

——*Marx to Freiligrath* (1860); *MEW* XXX, 489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4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我第一次逗留巴黎期间，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但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在布鲁塞尔（是基佐把我放逐到那里去的），我曾同恩格斯、威·沃尔弗等人成立了一个到目前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同时，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杂拌儿，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在公开的演讲里，我们强调，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

——*Herr Vogt* (1860); *MEW* XIV, 43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4卷，464~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产生工会的社团，不仅作为组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表现在下面这个事实上：甚至有选举权和共和国的美国工人也还是少不了工会——，而且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联合权除此而外还是警察统治和官僚制度的一个缺口，它可以摧毁奴仆规约和贵族对农村的控制；总之，这是使“臣民”变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进步党，也就是说普鲁士的任何资产阶级反对党，只要没有发疯，都会比普鲁士政府，尤其是比俾斯麦政府快一百倍地表示同意！与此相反，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合作社的帮助——凡是了解普鲁士情况的人，都预料得到，帮助的规模必然是很小的——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扩大监护制，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深信随着“新纪元”的到来政权会因摄政王

的恩典而落在自己手里，才使自己出了丑并且落到了目前这步田地，同样，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失所望。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但是，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

——Letter to Schweitzer (1865); MEW XXXI, 445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450~451页)

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计划都应当将以下问题作为出发点：展开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规定标准工作日；工人阶级在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工人阶级应该为整个社会解决这一任务）的事业中有计划地进行国际合作。

——Article in the *Social Democrat* (1868); MEW XVI, 3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358页)

如果工会希望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就永远不要依附于政治协会或接受其指导；那样做将使它们自己遭受致命的打击。工会是社会主义团体。工人们正是在工会里进行自我教育并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因为他们亲眼见到与资本的斗争每天都在发生。任何政治团体，无论其本质如何，都无一例外地只是对群众保持短暂的热情，都是暂时性的；相反，工会则以一种更为持久的方式掌握群众；它们自己就能代表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党派，并形成对抗资本权力的堡垒。无论属于哪个学派，广大工人群众至少理解，他的物质境况一定会改善，他献身于子女的教育，他的妻子儿女无须去工厂做工，他本人能更多地开发自己的心灵，更好地保养自己的身体，他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Speech to a delegation of German trade unionists (1869); KMSW, p. 538. (此段引文由英文译出，无中译本可对照)

不要让他 [即维莱 (Verlet)] 给他想成立的新的组起一个宗派主义的名字——无论是共产主义的名字还是其他别的什么名字，都不要用。在国际协会里，我们必须避免宗派主义的“标签”。工人阶级的总目的和倾向来自它确认自身所处的真实状况。因此，尽管这场运动反映在他们的头脑里有着千

差万别的形式，或多或少是想象的，并且或多或少与这些状况相一致，但是这些目的和倾向则存在于整个阶级之中。如果有些人——共产主义者——深刻地理解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阶级斗争的隐含意义，他们就不会犯同意或助长宗派主义的错误。

——Marx to Paul and Laura Lafargue (1870); *MEW* XXXII 671. (此段引文由英文译出，无中译本可对照)

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例如，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用罢工等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而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末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

——Marx to Bolte (1871); *MESC*, pp. 270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无产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废除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这个阶级在它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所掌握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并奴役劳动，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Decision of London Conference* (1871); *MESC*, I 388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455~456、454~455页)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质。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候是有其理由的。个别思想家批评社会对立，并幻想出一些解决方案，对这些方案，工人大众只能接受，宣传并付诸行动。按其本性来说，由这些创始者所建立的党派都是空想主义

的 (absentionist), 反对一切现实的行动、政治、罢工、联合, 总之, 反对一切集体运动……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 正如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为使国际的成立成为可能, 无产阶级就应该超越这个阶段。

面对空想的和相互对立的宗派组织, 国际是所有国家无产阶级的现实的和战斗的组织, 他们在反对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及其在国家中的阶级特权的共同斗争中联系在一起了。

国际的条例也只承认单纯的“工人”协会, 它们都追求同一个目的, 并接受同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仅限于简单描绘无产阶级运动的主要特征, 而将理论细节留给实际斗争的必然性所承担的推动力, 留给发生在宗派内部的思想交流。这些思想交流毫无区别地允许所有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机关中和自己的大会上进行争论。

——*The Alleged Splits in the International* (1872);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ed. J. Freymond (Geneva, 1962) II 28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8卷, 35~36页)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这只是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 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 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 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实行了。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1875); *MESW* II 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9卷, 26页)

至于我们, 那末, 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 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 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 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 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 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 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 不能自己解放自己, 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Circular Letter* (1879); *KMSW*, p. 5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9卷, 189~190页)

[注释]

- [1] Marx to Proudhon, 5 May 1846, *MEW XXVII* 44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464页)
- [2] Marx to Blos, 10 November 1877, *MESC*, p. 3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28页)
- [3] *KMSW*, p. 23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5页)
- [4] *KMSW*, p. 23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5页)
- [5] *KMSW*, p. 28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75页)
- [6] Marx to Freiligrath, 29 February 1860, *MEW XXX* 4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481页)
- [7] Marx to Engels, II February 1851, *MEW XXVII* 184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205~206页)
- [8] Marx to Kugelmann, 12 April 1871, *MEW XXXIII* 20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207页)
- [9] Speech to the London Conference of 1871, *MEW XVII* 6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703页)
- [10] Marx to Kugelmann, 9 October 1866, *MEW XXXI* 5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533页)
- [11] Cf. *KMSW*, pp. 573f.

参考文献

- E. Balibar, 'Marx and Engels on the Party', *Marxist Perspectives*, vol. 2 (1979).
- K. von Beyme, 'Karl Marx and Party Theor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20 (Winter 1985).
- J. Braunt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London, 1967) pp. 44ff., 85ff.
- H. Collins and C. Abramsky, *Karl Marx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London, 1965).
- R. Garaudy, *Karl Marx: the Evolution of his Thought* (London, 1967) pp. 190ff.
- R. Hunt,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Pittsburgh, 1974) vol. I, Ch. 8.
- M. Johnstone, 'Marx and Engels and the Concept of the Party', *Socialist Register* (1967).
- A. Lozovsky, *Marx and the Trade Unions* (Calcutta, 1975).
- C. Magri, 'Problems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Party', *New Left Review*, vol. 60 (1970).
- J. Molyneux, *Marxism and the Party* (London, 1978). Ch. I.

B. Nicolaevsky,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956).

J. Paastela, *Marx's and Engels's Concepts of the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Tampere, 1985).

B. Wolfe, *Marxism: 100 years in the Life of a Doctrine* (London, 1967) esp. Ch. II.

第八章


国 家



评 论


国家在许多方面对马克思来说是人的异化条件的最富特征的组织，他第一次被引导去阐述关于国家的观点，是由他早期的新闻工作经验引起的。国家作为检察官对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上的文章进行抨击。同当代普鲁士国家相反，马克思按照黑格尔的模式幻想在一个作为理性之化身的理想化的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人的真正自由的协会。

到1843年夏季之前，有两个因素导致马克思修改这一观点：一是他读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哲学的批判，二是他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的实践经验，它向马克思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在立法背景中的重要性。带着思想中的这种认识，马克思在一部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长篇手稿中详细阐述了他关于国家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在逻辑上是先于、在伦理上是优越于它的两个构成因素：家庭和市民社会。马克思着手表明，设想国家能够具有一种使市民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变得和谐并在更高水平上统一它们的普遍特征，这只是一种幻想。通过描述国家先于任何对市民社会的分析，黑格尔预先设定了它们之间的鸿沟，因而必须创造出制度沟通这一鸿沟。然而，所有这些制度——君主制、代议制议院、官僚制度——实际上在市民社会中都是特殊利益的掩护者：国家只不过是创造隶属于共同体之幻想的空洞的理想领域。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这种对立具有资产阶级时代的特征，而不是具有中世纪的特征。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举荐的政府形式是这样一种形式，在那里，不存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它直接与“社会化的人的本质”是相适应的。他称之为“真正的民主”，并把它概括如下：




在一切不是民主制的国家中，国家、法律、宪制是统治因素，但并没有真正在统治，就是说，并没有从物质上贯穿在其他非政治的领域中。在民主制中，国家、法律、宪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特定内容，因为它们就是一种政治制度。^[1]

随着1844年他向共产主义转变，马克思得出结论，国家本质上是对人的否定。在《巴黎手稿》中他宣布，国家是对类似于宗教、法律和道德的人的异化的一种表述，同样是建立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之上的。但是，同时，国家并不包含肯定的因素。马克思这里的分析类似于他对宗教的分析，它在许多方面都充当了他的政治观点的范式。马克思认为美国是“现代国家的最完美的例子”，甚至说：



至于现实生活，政治国家甚至在它尚未自觉地灌输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方，也在它的一切现代形式中包含了理性的需求——在它的共和形式内部，政治国家代表了一切社会斗争、需求和真理。^[2]

因此，像宗教一样，马克思把国家视为对人的理想目标的一种陈述，也是对这种理想目标未能实现的一种补偿。国家之所以有限，是因为它的目标仍是理想的。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学说中发现了对自己的观点的证明，这些学说主张，要把人作为一种政治公民来解放，而让他作为一个人，或者作为市民社会即经济社会的成员而受束缚。正是这一悖论使马克思在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进行了分析，其中他对自由主义提出了最易接受的批判。1844年在他反对卢格的文章中，马克思甚至说，国家越政治化，它就越构成一个分离的领域，就越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要消除在行政机关的任务、它的善良意愿和它能够采取的手段之间的矛盾，国家就必须消灭自己，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以这个矛盾为基础的。

国家是建筑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对立上，建筑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的对立上的。因此，行政机关不得限于形式上的和消极的活动，因为哪里有了市民生活和市民活动，行政机关的权力就要在哪里告终。

因此：



现代国家要消灭自己的行政机关的无能，就必须消灭当代的私人领域，因为国家只是作为私人领域的对立面而存在。^[3]

1844年马克思实际上为一本政论性质的书籍签了约，该书由《黑格尔国家哲学批判》(*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the State*)^①和读法国革命的材料整合而成；但是，他似乎只提出了目录。

尽管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没有放弃国家作为补偿、作为异化的社会权力的思想，但他越来越专注于对国家在社会中的功能的分析。而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曾试图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鸿沟，后来他把国家视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他对这一观点的详细阐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该书的一开始，马克思这样阐述了自己的分析纲要：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都是不断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不受他们的活动制约的物质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4]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国家连同其他社会制度的起源追溯到劳动分工：国家同所有社会成员的真实利益处于矛盾之中，它构成一种虚

① 中文版一般都将该书名译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译者注

幻的共同体，是要充当由彼此反对的阶级发动的现实斗争的保护屏。在历史进程中，每种生产方法都产生了扩大统治阶级利益的典型的政治组织。现代资本主义的大规模产业和普遍竞争，已经创造了其自身的政治组织——因税收和公共信贷而依赖于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这种现代国家转而铸造了其他社会制度：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维护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一个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国家在一切共同机构的形态中是作为调节者来行动的，国家赋予这些共同机构以某种政治形式。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就是说，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意志、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样，权利转而被归结为成文法。^[5]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概括的观点是：“现代国家的行政机关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委员会罢了。”^[6]然而，应该注意，马克思本人将经济基础和政治形式之间的这种相关性看作是一种非常松散的相关性：例如，尽管他认为英国在经济上是最先进的国家，但在他看来，法国政治上在许多方面都更先进。

对自己将国家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一般描述，马克思承认有例外，这点尤其体现在他对当代事件的惊人分析的两本著作中——《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有时认为，国家不需要代表某个阶级的整体，而只需要代表该阶级的一部分（例如，路易·菲利普统治下的金融家）；或者是，一个阶级可以为了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控制国家（例如，英国代表中产阶级的辉格党）。在相对落后的国家（阶级在那里还发展得不充分），马克思认为，国家可以扮演独立的角色；在欧洲处于由封建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变的绝对君主制国家，也是如此。马克思谈到路易·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兰西时，在与他的前任进行对比后说：“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7]

然而，波拿巴并不是受农民控制，也绝不是唯一以他们的利益来统治。诚然，马克思说过，在北美国家只是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才发现：“在那里，国家与一切其他民族结构不同，它一开始出现时就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生产。”^[8]

在马克思那里，相对于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第二个明显例外，出现在亚洲社会——印度、中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俄国。由于缺乏土地私有制，“在那里，专制暴君表现为无数小共同体之父，因而展示了全部共同体的同一性”^[9]。

马克思把官僚制视为这种现代国家机器的最本质的组成部分。他关于官僚制度的观点，主要包括在1843年写的《黑格尔国家哲学批判》和1851年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在后一著作中，马克思把官僚制度描绘成是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兴起而产生的，因而一开始就是作为摧毁中世纪社会的各种社团的进步力量，是为集中化和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而创立的。在1843年中，随着他的目光主要关注普鲁士，马克思描述了官僚制度如何最终变成一种要求通过高等教育而拥有的等级制，垄断了对国家利益的解释。官僚制度，如果看到它本身受到自己一开始培育的平等精神的挑战，那么它本身就已经变成了一种中世纪社会的社团，在神秘、等级制和权威的三位一体中寻求庇护。马克思认为，在法国，官僚制度——它已经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准备好出路——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自己控制的工具，尽管它们保留了趋于独立的倾向，不像英国和美国的官僚制度，那里议会更强大，官僚制度在从封建主义转变时不可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在路易·波拿巴的统治下，由于资产阶级的弱点，官僚制度可以控制国家，而不止是与构成波拿巴政权之基础的分离的农民相一致。这一观点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修订稿中得到扩展。^[10]

任何成功的革命都必然要卷入破除国家的权力及其官僚制度。1871年，马克思让库格曼（Kugelmann）回想一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一段话，在那里马克思谈到了摧毁官僚军事（bureaucratic-military）机构，并把它描述为“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11]。在1872年，他又写道：



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由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统治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12]

这里所划定的“统治”(government)和“管理”(administration)的界限,马克思从未全面阐述过,但是他似乎思考过,废除国家至少涉及它的最典型的形态——官僚制度、军队和司法的消亡。在这一联系中,经常令人想起的词句是“国家不是被废除的,是它自己衰亡的”,尽管这一词句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提出的。然而,马克思用来指称国家消亡的术语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产生任何确切含义,最常使用的术语实际上是“废除”。^[13]

马克思关于国家未来作用的概念都只是从顺带的评论中零星地拼接的。马克思的某些陈述似乎暴露出一种“权威的”态度,而这些通常都是论述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些方面。例如,当他在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说这些时,是在向一个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国家推荐政策:“工人……不仅要坚持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并且还要坚决使这个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14]

至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国家观点,有两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论,包含在他的《法兰西内战》中。这篇文章不能被当作完整代表了马克思的思想,因为它直接写于巴黎公社的血腥失败之后,因而不得不带有一种辩护的尝试。而且,所发生的起义与马克思的劝告是相反的,他认为公社的多数领导人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后来甚至说,公社的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在那种环境下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15]。然而,公社的有些政策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可,他也认为公社具有重要的潜能。马克思欢迎公社的方案是,所有官吏(包括法官)都由普通投票选出,并且可以随时撤换;支付给官吏的是与工人同样的工资;用武装的人民替代常备武装;剥夺了警察和神职人员的政治影响。马克思还认为,公社的创造性可能产生一种非集中化的、联邦制的政治结构,以及一种建立在由共同计划统一的合作社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然,在第一国际内部的争论时期,马克思拒绝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但是这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即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威权主义者。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统治观点的第二个主要来源,存在于《哥达纲领批判》中。在那里他断言:“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16]。在评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时,马克思只是说,至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存在何种类似于当代国家功能的社会功能,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马克思唯一进一步的陈述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将存在“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7]。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要将“专政”一

词加以任何特定政治含义的曲解是很困难的。

在马克思写作却连一半也未完成的题为《经济学》的文稿中，第四卷是用来论述国家的；正是所缺的这一卷构成马克思后期著作的巨大裂隙。它的构成的一般轮廓，必须从谈论别的主题片段评论中才能得到重构。

文 本

既然官僚制度就本质而言是“作为形式主义的國家”，那么就目的而言它也是这样。于是，国家的真实目的对官僚制度说来就呈现为反國家的目的。所以官僚制度的精神就是“形式的國家精神”。因此，官僚制度把“形式的國家精神”或实际的國家无精神变成了绝对命令。官僚制度自认为是國家的最终目的。既然官僚制度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所以它就处处同“现实的”目的相冲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國家的目的成了官僚政客的目的，官僚政客的目的成了國家的目的。官僚制度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委托下层洞察个别情况，下层则将洞察一般情况的任务留给上层，因此他们彼此互相欺骗。

官僚制度在现实的國家之外组成一个幻想的國家，它是國家的唯灵论。因此任何客体都有两重意义，即现实的意义和官僚制的意义，正如同知识也是两重性的——现实的和官僚制的一样（意志也是如此）。但官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本质、根据彼岸的唯灵论的本质来对待现实事物的。官僚制度在自己的领地上掌握了國家的本质，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的本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官僚制度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神秘。保守秘密和保持神秘在官僚制度内部是靠等级制，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的本性。因此，公开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心理，对官僚制度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心理状态。但在官僚制度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劣的唯物主义，变成了消极服从、迷信权威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國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他追求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1843); KMSW, p. 3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301~302页)

民主制是对一切國家制度之哑谜的解答。在这里，國家制度不仅在本质

上,而且就其存在和现实性说来也不断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其自身的任务。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也许有人会说,在一定意义上,这对君主立宪制也是有效的,然而民主制的独有的特点就是,在它那里,国家制度不过是人民的存在之中的一个要素,政治制度显然不能组成国家。

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国家的主体性方面;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正如同基督教对其他一切宗教的关系一样。基督教是最纯粹的(par excellence)宗教,是宗教的本质,是作为特殊宗教的神化了的人。同样,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的人;它对国家制度其他一切形式的关系,正好像类对自己的各个种的关系一样,并且只有在这种情形中,类本身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所以对其他不适合于这种本质的存在说来,它表现为一个特殊的种。民主制相对于其他政治形式,它就是《旧约全书》。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法律是一种人的存在,而在其他政治形式中,人只是一种法律的存在。这就是民主制的基本特征。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1843); KMSW, p. 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281页)

完美的政治国家,就其本质来说,是和人的物质生活相反的人的类生活。这种自私生活的一切前提不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的市民社会中,而且是市民社会特有的。当政治国家实现了自己的真正完满时,人不仅在思想和意识中,而且在现实和生活中,都要过一种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无论在将赋予他以共同存在之价值的政治共同体中,还是在他作为私人而活动的市民社会中,他过着的都是一种生活,即把他人当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异化权力的玩物。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现存世界秩序内,它无疑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大家应该理解,我这里谈论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

但是,我们不要在政治解放的限度方面欺骗自己。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并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而是它的完成,因此,政治解放并没有废除,甚至也不想废除人的实际的宗教情感。

——*On the Jewish Question* (1843); KMSW, pp. 45f. (参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28~430页）

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还原为市民社会的成员，还原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还原为公民、道德人。

现实的个人应该让抽象的公民回到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关系中，成为类存在；人应该把自己的力量认可为社会力量，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从而不再以政治力量的形式使社会力量同人自身分离。只有当这点实现时，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On the Jewish Question* (1843); KMSW, p. 5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43页)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国家和任何社会的组织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国家就是社会的组织。就国家承认社会弊端的存在来说，国家是在任何人的力量都不能控制的自然规律中，或是在不依赖于国家的私人领域中，抑或是在依赖于国家的行政机构的不适中寻找它们的根源……

要消除在行政机关的任务、它的善良意愿和它能够采取的手段之间的矛盾，国家就必须消灭自己，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以这个矛盾为基础的。国家是建筑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对立上，建筑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的对立上的。因此，行政机关不得限于形式上的和消极的活动，因为哪里有了市民生活和市民活动，行政机关的权力就要在哪里告终。诚然，面对由这种市民生活、这种私有制、这种商业、这种工业、这种不同市民团体的相互掠夺所产生的各种后果，面对这些后果，无能成了行政机构的自然规律。因为这种分裂、这种卑鄙龌龊、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是现代国家借以存在的自然基础，正如奴隶制的市民社会是古代国家借以存在的自然基础一样。国家的存在和奴隶制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古代国家和古代奴隶制——率直而公开的对立——并不比现代国家和现代纷争的、伪善的基督教种种对立的世界结合得更紧密。现代国家要消灭自己的行政机关的无能，就必须消灭当代的私人领域，因为国家只是作为私人领域的对立物而存在。

——*Critical Notes on 'The King of Prussia and Social Reform'* (1844); KMSW, pp. 124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79~480页)

一个国家越是强大，因而政治性越强，那么它就越不倾向于在这个国家自身，也就是说，越不倾向于在现存的社会组织（该组织的能动的、自觉的和正式的表现就是国家）中寻找社会疾苦的原因，从而理解它们的一般本质。政治理智之所以为政治理智，就因为它是在政治的界限以内思考。它越敏锐、越活跃，就越没有能力去理解社会疾苦。典型的政治理智时代就是法国革命。法国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在国家中寻找社会缺陷的根源，相反地，他们却在社会缺陷中发现了政治混乱的原因。因此，罗伯斯比尔在极贫和极富中所看到的只是对纯粹民主的妨碍，因此他想建立一种普遍的斯巴达式的朴素生活。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政治理智越是片面，因而越是完备，它就越相信意志的万能，就越分不清意志的自然界限和精神界限，因而也就越不能发现社会疾苦的根源。

——*Critical Notes on 'The King of Prussia and Social Reform'* (1844); KMSW, p. 12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80~481页)

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同样也可以说，正如古代国家把奴隶制作为自己的自然基础一样，现代国家把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中的人作为自己的自然基础，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而同他人发生依赖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生的奴隶，自己以及他人的自私需求的奴隶。现代国家在普遍人权方面已经把这点认作自己的自然基础。而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其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现在就通过宣布人权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

——*The Holy Family* (1845), pp. 152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45页)

因此，实际情况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是不断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不受他们的活动制约的物质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 16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1~72页)

正是由于个人利益和共同体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体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个人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生活的形式，而这始终是在现存于每个家庭和部落集团的现实联系——诸如血肉、语言、较大规模的分工以及其他利益——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在每一个这样的人群中分离出的，即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所有其他的阶级。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公民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各个不同阶级彼此之间借以进行现实斗争的一些虚幻的形式。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 1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4页)

如果像霍布斯等人那样，承认权力是权利的基础，那么权利、法律等等只不过是国家权力所依赖的其他关系的一种征兆、一种表现。那些决不纯粹依赖于个人“意志”的个人的物质生活、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分工和私有制仍然是必需的阶段上，是完全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权力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是创造国家权力的力量。在这些条件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建自己的权力外，他们还必须赋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条件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内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就像民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那样。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 18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77~378页)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这个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中世纪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例如在法国）；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半封建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总之，实际

上是大君主国的基础；最后，由于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建立，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国家的行政机关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委员会罢了。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KMSW, p. 2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4页)

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对付它的个别成员和被剥削阶级的相互保险的公司，由于统治被剥削阶级日益困难，这种保险必然会日益昂贵，几乎日益脱离资产阶级社会而趋于独立。

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消灭国家只具有一种意义，即它是阶级压迫的必然结果，如果阶级压迫消失了，一个阶级也就必然不需要组织政权来压迫另一个阶级了。

——Review of E. Girardin, *Socialism and Taxes* (Paris, 1850); MEW VII 28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338~339页)

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而不可能创始一个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统治阶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农民是第二帝国的消极经济基础；那个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它最后的一次胜利的。只有因对全社会负有新社会使命而得到鼓舞力量的无产阶级，即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使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够粉碎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是集中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

——Drafts for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1871); KMSW, p. 55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587页)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式很简单，像一切伟大事物一样……。

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

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

——Drafts for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1871); KMSW, pp. 555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588~590页)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 *mandat impératif*（正式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代表，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代表进行管理。民族的统一不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并通过消灭那种独立于民族之外、凌驾于民族之上却又声称体现民族统一的国家政权，而成为一种实体。与这种实体不同，那种国家政权只不过是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它的合理职能应该从从前显贵们所篡夺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中夺取过来，复归于社会的负责的代表。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做一次决定，让统治阶级的成员在议会中向人民说假话，而应该是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投票是为任何个别的雇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和管理者。大家知道，公司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知道如何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1871); KMSW, pp. 542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359~360页)

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达到以后，……国家政权就会消失，统治职能就转变为单纯的管理职能。

——*The Alleged Splits in the International* (1872);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II 29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53页)

巴枯宁：德国人大约有4 000万。难道4 000万人全都将成为政府成员吗？

马克思：Certainly（当然啦），因为事情是从公社自治做起的。

巴枯宁：全民都将成为统治者，而被统治者也就没有了。

马克思：按照这个原则，当一个人自己统治自己时，他就不是统治自己；因为他只是他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

巴枯宁：那么就将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如果有国家，就会有统治者和奴隶。

马克思：这只是说：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Marx on Bakunin* (1875); KMSW, pp. 562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696~699页)

[注释]

[1] KMSW, p. 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282页)

[2] KMSW, p. 3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17页)

[3] KMSW, pp. 124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79、480页)

[4] KMSW, p. 16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1~72页)

[5]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p. 47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32页)

[6] KMSW, p. 2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4页)

[7]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KMSW, p. 3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216页)

[8] *Marx's Grundrisse*, p. 48. (此段引文在中译本中不存在，此处据引文译出)

[9] K. 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1964) p. 69. (此段引文在中译本中不存在, 此处据引文译出)

[10] 参见本书英文版第 218 页的最后一段引文。

[11] Marx to Kugelmann, 12 April 1871, *MEW XXXIII* p.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33 卷, 206 页)

[12] K. Marx, *The Alleged Split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ed. J. Freymond (Geneva, 1962) II. 29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18 卷, 53 页)

[13] Cf. M. Evans, 'Marx Studies', *Political Studies* (December, 1970). 也可进一步看本书第九章。

[14] *Address to the Communist League*, *KMSW*, p. 28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7 卷, 297 页)

[15] Marx to Domela-Nieuwenhuis, 22 February 1881, *KMSW*, p. 59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35 卷, 154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16] K.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KMSW*, p. 56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 版, 第 3 卷, 313 页)

[17] *KMSW*, p. 56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 版, 第 3 卷, 314 页)

参考文献

R. Adamiak, 'The "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 A Re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February 1970).

S. Avineri, 'The Hegelian Origins of Marx's Political Thought', *Review of Metaphysics* (1967).

S. Bloom, 'The 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41).

N. Bobbio, 'Is there a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 *Telos*, vol. 35 (Spring 1978).

A. Carter, *Marx: A Radical Critique* (Brighton, 1988) Ch. 5.

H.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I: *The State and Bureaucracy* (New York, 1977).

G. Duncan,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 in *Marx and Marxism*, ed. G. Parkin (Cambridge, 1982).

J. Foster, 'Marxian Economics and the State',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46 (Autumn 1982).

G. Hunt,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in Marx',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8 (Summer 1987).

J. Hyppolite, *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 (London, 1969) Ch. 5.

M. Levin, 'Marx and Engels on the Generalized Class Stat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6 (Winter 1985).

M. Lieven, 'Marx and Engels's Account of Political Power: The Case of British Factory Legisla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9 (Winter 1988).

J. McMurty, *The Structure of Marx's World View* (Princeton, 1978) Ch. 4.

R. Miliband, 'Marx and the State',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V. Perez-Diaz, *State, Bureaucracy and Civil Society: 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1978) Ch. 4.

M. Rubel, 'Marx's Concept of Democracy', *New Politics* (1962).

J. Sanderson, 'Marx and Engels on the Stat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December 1963).

J. Sanders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London, 1969).

M. Shaw,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Politics: A Central Paradox of Marxism',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3 (November 1974).

R. Tucker,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 (London, 1970) Ch. 3.

第九章 革 命



评 论

马克思关于革命的观点是他关于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结果，也即，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的。他写道：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以前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法律表述）发生冲突。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开始了。^[1]

因此，可以称革命为“历史的推动力”^[2]，他在其他所有领域的研究都是用于揭示这种“推动力”的根源。

当在以往历史中，生产关系的羁绊被发展着的生产力突破时，所引起的革命只能是局部的革命。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之一中写道：



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

普遍解放。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3]

马克思这里特别想到的是法国革命，对于这场革命他就像他的同代人一样着迷。诚然，在他成长的岁月，他用来研究法国革命的时间比其他事情要多得多，他的整个思想都可以被看作对这一问题的尝试性回答：为什么看似如此进步的法国革命却完全不能治疗社会的罪恶，尤其是不能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马克思很明白，法国革命中积极的東西是：它摧毁了封建主义，废除了社会地位在政治中的形式的重要性；主张人在共同公民权上的平等。但是——这也是马克思集中批判的——从社会方面来看，人们在国家中拥有共同的公民权，对他们的反社会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在这里，“自由”“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的联合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有限的个人限制自身的权利”^[4]。“平等”只不过是対这种自由的平等权利。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的原则和公民的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一种“纯政治的”革命的特征。在他 1844 年对卢格的抨击中，他写道：



政治智慧之所以是政治的，仅仅是因为它在政治的限度内思考。它越是敏锐，越是活跃，就越不能把握社会罪恶。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们没有在国家中看到社会缺陷的源泉，而是在社会缺陷中看到了政治灾难的源泉。^[5]

因此，尽管纯粹政治革命的理论认为，它是向每个通过变成资产阶级而解放自身的人开放的，但是本质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社会中的一个集团受另一个集团剥削。

下一场革命的重要特征是，它将是社会的而不是纯粹政治的：它不仅宣布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才拥有的抽象权利，而且通过渗透到人的现实生活——他的社会—经济生活而实现一种普遍解放。这将是涉及社会整体的第一次革命：



从前的一切历史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和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我们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6]

因此，革命的激进主义依赖于实现它的阶级：无产阶级能够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它是这样一个社会，阶级对抗因强化而被简化到这一程度，以至于允许废除它们。在讨论他声称为“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7]的巴黎公社时，马克思返回到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这种划分。

马克思痛苦地指出，他并没有把革命设想为经济力量冲突的机械结果；它是某种还必须被人类实现的事情：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母体中所能产生的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8]

但是，在马克思眼里，革命不单单是无产阶级要执行的任务，它还是它们自我教育的手段。在制造革命时，无产阶级也改变自身，因为革命要求自身行动者的巨大变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



无论为了这种共产主义意识的广泛产生，还是为了事业本身的成功，对人进行广泛的改造是必需的，这种改造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能发生；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成功地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变得适合于重新建立社会的基础。^[9]

马克思赋予这种包含主客观因素的活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名称，是“革命实践”。他这样来概括这点：“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10]由此可推断出，在成功的革命可以预期之前，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是必需的：无产阶级必须变成一个“自为”阶级。

由于不是一位预言家，马克思并没有详细涉及他认为即将来临的革命的确切本性和环境。他的确没有说过，他认为什么时候会有革命，它在哪里爆发，以及它是否是暴力的。

谈到制造成功革命所必需的条件时，马克思多少是乐观的，所根据的是他亲自在其中发现的历史形势。在1848年革命时期，马克思的期望达到最高点，除了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时期有过短暂复活外，以后是逐渐地消退。1846年，在他与魏特林争吵时，据报告马克思说过：“现在还不能谈论共产主义的开始；资产阶级首先还在掌舵。”^[11]在1848年革命的前夜，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12]甚至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1850年3月，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仍然赞同“不断革命”这一观念：在达到小资产阶级的目标后，工人的任务就是不断革命，“直到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被迫放弃权力，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13]。《告同盟书》以这样的词句而告结束：“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困难的是使这种乐观主义的探讨与政治制度依赖于社会的经济基础逐渐发展的观念相调和，这是马克思在1850年9月的最后发言中仍遵循的一种观念：“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14]。

在1850年期间，在决定革命的可能性上，马克思已变得相信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当年的经济学研究使他得出结论，一场成功的革命只能是严重经济危机的结果：“新的革命只是作为新的危机的结果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这种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15]马克思对此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当共产主义者联盟似乎要落入维利希（Willich）——他信仰不管经济形势如何都可以尝试革命——这样的人之手时，他准备要解散该联盟。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都期望危机能够激发革命。后来，他对革命的经济原因持一种更长远的观点。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给人以这一印象，即在资本主义利用完自动机器的巨大可能性的能力之前，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法兰西内战》的手稿和马克思对巴枯宁的评论也表明，马克思设想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进行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与该问题相联系的是革命首先在哪里爆发的问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史观似乎指明，最发达的工业国家是那些革命条件最成熟的国家。然而，他明白，欧洲革命正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一般的世界形势。在1859年致恩格斯的信中，他提到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远东的开发，并继续说：“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16]但是，马克思也思考过，在某些不发达国家（例如，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可能引发后继的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在他的生活中，他逐渐相信，俄国可能证明是革命的起点，“这一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17]在他逝世的一年前，他还探讨俄国：“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8]

马克思肯定意识到了殖民剥削对即将来临的革命的重要性。在描述英国工业对印度的影响之后，他勾勒了这会提供一场世界范围的革命的前景：“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9]

马克思认为革命不会在最先进的国家发生的理由之一是，他认为在某些这样的国家共产主义可以通过和平手段产生。在1872年，他说过他相信在美国、英国和荷兰实行和平革命的可能性。1879年，当他写作如下话语时，他遵循的是同一思路：“只有当该社会中的掌权者不用暴力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例如，如果在英国或美国，工人阶级在议会或国会里取得多数，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来取消阻碍其发展的法律和设施”^[20]。在这一形势下，马克思继续认为，一切暴力会从另一方面发生。然而，在1871年，他责备巴黎公社不愿意发动一场内战，并于同年向第一国际代表大会宣布：“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21]可是，马克思可能想得更多的是，有时暴力是革命的助产婆，他从不（除在1848年革命的短暂时期和俄国沙皇专制的条件下）赞同使用革命恐怖。他强烈批评了雅各宾派在法国革命中使用恐怖；在他看来，恐怖的使用是革命虚弱和不成熟的一种信号，该

革命被迫通过纯粹暴力强加社会中尚不具备的东西。马克思写道：“在特殊的自我意识的因素中，政治生活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因素，并试图使自己成为人的真实的、和谐的生活。但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对抗，宣布革命是不断的，才能做到这一点……”^[22]因此，如果社会一经济条件不适宜，革命必然会导致一种恐怖的统治，期间，革命政权试图从上而下重组社会。

然而，与恐怖相反，如果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条件达到这一地步，可以使物质力量的使用成功，在马克思看来，它就是一种完全可以接受的革命武器。马克思认为，继一场成功的革命之后，将要建立的统治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其纲领中最详细的信息包含在《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结尾处记录的尝试性的十条论点之中。这一表述很少为马克思所用，在公开出版的文献中则从未使用过。在致他的朋友魏德迈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将它宣布为自己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之一，因而它证明，“（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3]。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写道，当资本主义社会被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时，将会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4]。也必须注意，“专政”一词对马克思并不像对我们那样有着同一含义。他主要将它与罗马独裁机关联系起来，在那里，在危机时代的有限时期内，一切权力都被合法地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尽管马克思很少讨论这种政府颁布的措施，最全面的描述就是《共产党宣言》勾勒的十条论点，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十分温和的纲领。

马克思还有一个观点是，如果局限于某一国家，革命要想成功——至少最终——是不可能的。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批评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幻想“他们也以为能够在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存的情况下在法国国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25]。但是，同样的道理，创造国际革命所必需的工人阶级组织的水平，只能在现存国家内部创建工人阶级政党才能实现。马克思坚决赞同德国和意大利的联合，赞同波兰民族主义的觉醒。

文 本

政治革命把市民生活分成几个组成部分，但对这些组成部分本身并没有实行革命和进行批判。它对市民社会、需求的世界、劳动、私人利益和私法的态度是，它们都是自己存在的基础，是不需要进一步证明的自身的前提，

因而是自己的自然基础。最后，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是真实的人，是和公民不同的人，因为他是有感觉的、单个的、直接的存在意识上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虚构的人，是作为寓言的人和法人的人。只有以利己主义的个人形式认可的人才是现实的人，只有以抽象的公民形式认可的人才是真实的人。

——*On the Jewish Question* (1843); KMSW, p. 5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43页)

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

如果说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不是同义语就是废话，那么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却是合理的思想。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解除从前的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特殊目的、它的灵魂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壳。

——*Critical Notes on 'The King of Prussia and Social Reform'* (1844); KMSW, pp. 126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88~489页)

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方式，它只是涉及对这种活动进行不同的分配，涉及对其他个人进行劳动的重新分配的问题，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以往活动的方式，消灭劳动，并废除任何阶级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实质上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无论为了这种共产主义意识的广泛产生，还是为了事业本身的成功，对人进行广泛的改造是必需的，这种改造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能发生；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成功地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变得适合于重新建立社会的基础。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 17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90~91页)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 1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5页)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科学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本身尚未带有政治性之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能够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之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临时凑成各种各样的体系并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按照历史是发展的以及随着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斗争会变得日益明显这一标准，他们不再需要在自己的头脑中寻找科学；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成为它的代言人。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还处于斗争的起点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和破坏的一面。但是从这一刻开始，作为历史运动的产物的科学，便已经自觉地把自身同历史运动联系起来，它不再是空头学术，而是变得具有革命性。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1847); KMSW, p. 21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57~158页)

每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那些作为“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哲学家的反抗，但在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到的效果和影响中却丝毫不会因此而受到干扰。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整个现存制度的基础。如果全面革命的这些物质因素还不存在（也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现存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迄至那时为止的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迄至那时为止的“生活的生产”本身、反抗那种社会所依据的“总体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就实际发展说来，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革命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它绝对是空洞的。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 173. (参见《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92~93页）

从前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从前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从前的各种其他占有方式，才能掌握社会的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和巩固；他们的使命是摧毁从前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从前的一切历史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和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我们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KMSW, p. 2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3页)

当然，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如燃烧弹，具有魔力的破坏性器械，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等。

——Review of A. Chenu, *The Conspirations* (Paris, 1850); MEW VII, 2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321页)

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使革命永远持续，直到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被迫退出他们的统治地位，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手中。

——*Addres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Communist League* (1850); KMSW, p. 28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68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变革自己和各种事物并创造某种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 KMSW, p. 30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85页)

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Th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1853); KMSW, p. 3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73页)

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猾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好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当然，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Vehmgericht”

(“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Vehm”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Speech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Paper* (1856); KMSW, pp. 338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法律表述)发生冲突。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开始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Preface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 KMSW, pp. 389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33页)

由此就会出现彻底的经济革命。一方面,这个过程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创造现实的条件,完善它们,并给予它们一种充足的形式;另一方面,在以牺牲工人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以及生产和循环的条件之内,这个过程还带来了一种新生产方式的现实条件,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立形式,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也即新型社会的物质基础。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186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9卷,126页)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

——*Speech at Amsterdam* (1872); KMSW, pp. 594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179页)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他们知道，这种经济变革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会因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抵制而被废止和受到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他们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Drafts for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1871); KMSW, p. 55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594页)

凡是大批农民仍然是私有财产所有者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构成重要的绝大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为雇佣劳动者所代替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因为农民土地私有者不属于无产阶级，甚至当他们自身的地位表明他们不属于农民土地私有者时，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属于无产阶级）必须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本质上能够促进私人所有权向集体所有权的过渡，以便农民能够因经济原因而改变自身；但是无产阶级不应该同农民发生公开的冲突，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所有权；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地主已经剥夺了农民，而且真正的土地劳动者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阶级雇佣工人、因而直接有了共同利益的地方，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所有权。

——*Marx on Bakunin* (1875); KMSW, p. 56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694~695页)

巴枯宁：一旦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它将统治谁？

马克思：这意味着，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它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使用强制措施，因而采用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所依赖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变革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变革的过程。

——*Marx on Bakunin* (1875); KMSW, p. 56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694页)

小学生式的胡说！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能够 *mutatismutandis* [变通的] 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至少要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自己革命时为当时存在的农民所做的事情那样多。想得真妙，工人的统治包括对农村劳动的镇压！

但是，这里恰好暴露了巴枯宁先生内心深处的思想。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含了对劳动者（不论雇佣工人、农民等等）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上的欧洲的社会革命要在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上来进行。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

——*Marx on Bakunin* (1875); KMSW, pp. 561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695~696页)

[注释]

- [1] KMSW, p. 38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33页)
- [2] KMSW, p. 172. (此句话在中译本中不存在，此处据引文译出)
- [3] KMSW, p. 7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2页)
- [4] KMSW, p. 5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38页)
- [5] KMSW, p. 125. (此段自英文译出，无中译本可对照)
- [6] KMSW, p. 2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3页)
- [7] KMSW, p. 54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588页)
- [8] KMSW, p. 2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94页)

- [9] KMSW, p. 17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91页)
- [10] *The German Ideology*, p. 2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3卷, 234页)
- [11] Hess, *Briefwechsel*, p. 151. (此信中译本未收录, 此处据引文译出)
- [12] KMSW, p. 2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307页)
- [13] KMSW, p. 28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368页)
- [14] KMSW, p. 2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 第7卷, 618页)
- [15] KMSW, p. 29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471页)
- [16] MEW, XXIX 359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29卷, 348页。中译本标明此信的写作时间是1858年10月8日, 与本文中所述1859年有出入)
- [17] MEW, XXXIV 29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34卷, 275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8] KMSW, p. 58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251页)
- [19] KMSW, p. 3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773页)
- [20] MEW, XXXIV 4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2版, 第25卷, 338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正文中所述此段引文的写作时间有误, 实际上应为1878年)
- [21] MEW, XVII 6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7卷, 700页)
- [22] KMSW, p. 4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卷, 430~431页)
- [23] KMSW, p. 3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28卷, 509页)
- [24] KMSW, p. 5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9卷, 31页)
- [25] MESW I 1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7卷, 20页)

参考文献

- S.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1968).
- F. Bender, 'The Ambiguities of Marx' Concepts of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and "Transition to Communism"',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2 (Winter 1981).
- S. Bloom, *The World of Nations* (New York, 1941) Ch. 8.
- A. Buchanan, *Marx and Justice: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 (Totowa, 1982) CH. 5.
- A. Buchanan, 'The Marxist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Socialism',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vol. 3 (Spring 1985).
- H. Draper, 'Marx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Études de Marxologie*, VI (1962).
- H.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77).
- H.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3: *The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 (New York, 1986).
- R. Edgley, 'Revolution, Reform and Dialectic', in *Marx and Marxism*, ed. G. Par-

kinson (Cambridge, 1982).

G. Friedman, 'Marxism, Violence and Tyranny',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vol. 3 (Spring 1986).

A. Gilbert, 'Salvaging Marx from Avineri', *Political Theory*, vol. 4 (1976). (也可参见 Avineri 在同一期杂志上的答复文章: 'How to Save Marx from the Alchemists of Revolution'.)

D. Gordon, 'Marx, Dictatorship and the Abolition of Rights',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vol. 3 (Spring 1986).

O. Hammen, 'Marx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1972).

E. Hobsbawm, 'Revolution in the Theory of Marx', in *Marx en Perspective*, ed. B. Chavance (Paris, 1985).

S. Hook, 'The Marxist Theory of R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April-June 1973).

R. Hunt,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Pittsburgh, 1974) vol. I Chs5-7.

M. Johnstone, 'Marx, Blanqui and Majority Rule', *Socialist Register* (1982).

P. Kain, 'Estrangement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Political Theory*, vol. 7 (November 1979).

R. Miller, 'Democracy and Class Dictatorship',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vol. 3 (Spring 1986).

S. Moore, *Three Tactics. The Background in Marx* (New York, 1963).

J. Sanders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London, 1969) Ch. 5.

A. Schaff, 'Marx on Revolution and Viole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April-June 1973).

R. Tucker,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 (London, 1970) Ch. I.

E. Voegelin, 'Formation of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 *Review of Politics* (1950).

第十章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评 论

重要的是从一开始要强调，马克思不是“预言家”，他极少谈论他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这点毫不奇怪：像他的大师黑格尔一样，他对预见未来极为谨慎，并且经常为“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的唯心主义预言而严惩他们。^[1]这是因为，如果一切观念都是当代社会现实的产物，那么将这些观念详细地投射到一种遥远的未来就注定会引起唯心主义——由于缺乏经验参照而完全是想象的观念。马克思也许完全同意黑格尔的评论：“设想任何哲学超越自己的当代世界，就如同设想个人可以跨越自己的时代一样，是十足的愚蠢。”^[2]

然而，马克思描绘的图景的大致轮廓是足够清晰的。经常令人想起的词句之一，是国家的“消亡”。实际上，这是恩格斯的一个表述，他比马克思更乐于描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类似。马克思更多的是谈论国家的“超越”（一个带有哲学味道和黑格尔式口吻的术语）和“废除”。^[3]在马克思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中，重要的是要记住，在他写作的时代，国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发挥作用：实质上还没有什么社会服务可提供，工业还都控制在私人手中，国家的教育机构还刚刚开始，因此还很不适于“消亡”。马克思关于这一主题的观念无疑受到圣西门的影响，后者早就宣布了从“对人的统治”转变为“对物的管理”。^[4]有关这一转变的核心一段，可以在《共产党宣言》中发现：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巨大的全国联合体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真正所谓的政治权力，只不过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5]

净化公共权力的“政治”方面所指的事物之一，是废除它的“官僚制的”因素。这一论题在圣西门反对非生产的统治阶级的不断论辩中，也可以找到它的起源。自他早期作为一位政治编辑以来，官僚制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已讨论过的问题：在他 1843 年的手稿中，他就强烈地批评黑格尔的官僚制观点是一种国家和市民社会间的调和因素^[6]，并发现至少是巴黎公社预示了对该问题的解决。当然，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公共权力，但是，“当阶级统治消失之后，就不会再有国家这个词现在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了”^[7]。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废除建立在阶级界限基础之上的国家涉及废除一种独立的国家机器，凭借这种国家机器，不负责任的行政和司法权确保了官僚制的不受伤害。巴黎公社对马克思来说，意味着摧毁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8]。马克思两次用“联合”（association）一词描述后续社会，一次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在那里他说，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在《神圣家族》中，他还说，工人阶级将建立“一种联合，这种联合排除了阶级划分，并且将不拥有恰当表达的政治权力”^[10]。

在《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对巴枯宁的《国家主义和无政府》（Statism and Anarchy）的批判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结构当然看起来是极其集中化的，在 1850 年 3 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呼吁共产主义者“不仅要力求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且还要极其坚决地把这个共和国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正如 1793 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11]。当然，这也适用于紧随革命之后的时期，尽管很显然，大量的集中化的措施是执行那种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来建议的措施所必需的，这是一个《巴黎手稿》和《哥达纲领批判》都涉及的不完备的共产主义的阶段。国家的消失是为这一时期储备的，到那时“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12]，“政

治”权力的执行不再因经济压力而成为必要。《法兰西内战》则描述了一幅稍微不同的图景，在那里，巴黎公社因宣布了一种很不同的非集中化的统治而受到赞扬；尽管对这一点总是受到公开质疑：马克思实际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巴黎公社采取的措施？当写作一份讣告时，他如何感到不得不节制批评？

所以，问题可以这样提出：在这种“联合”中，公共权力将不得不执行什么样的职能？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中央政府只会给它留下“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13]。这些职能确切是什么，马克思从来概括得不精确，因为他考虑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仍将保留什么社会职能，即保留一些现在国家执行的什么职能”的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14]。似乎是，暴力不为共产主义统治所需要，当然也不需要表面的暴力，因为如果不是国际的，革命就等于零；甚至在国内也不需要暴力，因为惩罚将是“对侵犯自身的审判”。

当然，这些问题就像那些涉及马克思关于婚姻和家庭、废除货币^[15]以及按需分配社会产品的问题一样，最终都依赖于他的那种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占优势的人性的类概念。这是因为，如果人现在显示的许多反社会的趋势是能够最终根除的，那么很自然，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完全可以不同于任何当前能够轻易想象的东西。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难道马克思不能设想人的驱动可以为社会情形所修改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足够的余地。在那里，马克思区分了不变欲望（“它一切环境下都存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只能改变它的形式和趋向”）和相对欲望（“它将自己的起源仅仅归于社会的特殊形式，归于生产和交换的特殊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前者只能被改变和为正常发展提供机会，而后者却因被剥夺它们的生存条件而被毁灭。马克思继续说：“在共产主义组织中，哪种欲望被改变，哪种欲望被消解，只能以实际方式并通过真实和实际的欲望的改变，而不是通过同早期的历史环境进行历史比较而决定。”他进一步提到了几种欲望（其中有吃的欲望）作为不变欲望的例子，并继续说：“共产主义者也不关注废除欲望和需求的固定不变性……他们的目标是以这种方式组织生产和交换，以便使对一切欲望的正常满足，也即对仅仅受限于欲望自身的满足成为可能。”^[16]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本性的这些变化和对欲望的调节，通过人对他早期著作中指称为人的本质的恢复，都是能够做到的。这种本质就是共同的创造性，事实是，人控制着自身的自我创造过程和他与自然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组成部分。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将是劳动者：“随着劳动的解放，每个人都变成了劳动者，生产劳动不再具有

阶级特性。”^[17]这一范畴对马克思是多么基本，可以用这一事实来衡量，即马克思认为，对它的普遍接受能够导致人类的永恒难题——战争的解决。在《法兰西内战》中，他在谈到这一社会时就说：“它的国际规则就是和平，因为它的自然统治者到处都是同样的——劳动。”^[18]

尽管他拒绝对“未来的食堂开出食谱”^[19]，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的总轮廓是清晰的。对产业储备武装的使用、使用潜藏在大多数个人身上的多方面才能的能力，都将使共产主义社会更丰富。生产将是共同的，不再需要通过货币来调节，但是要根据它的质来评价；时间的使用将会有计划，以便每个人能够享有最大化的自由时间用来发展为“一般个人”。与他之前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把这种社会视为历史运动的必然产物。《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的几段话表明，在许多方面，机器和自动化的引入是这场运动中的关键因素。

文 本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是作为人的完全的、自觉的复归的共产主义，这种复归为作为社会的即人的存在的人自身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对抗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1844 *Manuscripts*; KMSW, p. 8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20页)

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作为人的财产的真正人的生活的指明，也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换句话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

——1844 *Manuscripts*; KMSW, p. 10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4页)

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否定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

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否定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代表了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中的肯定因素，因而代表了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在人的发展的这一环节既是现实的，也是必然的。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形式和动力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

——1844 *Manuscripts*; KMSW, pp. 95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31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独占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他希望的任何部门内实现自己，社会调节着总的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只要我有想法，就不会永远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超乎我们之上、不受我们控制、阻碍我们的期望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客观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 1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5页)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 17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7页)

正像经验上所确立的，随着现存的社会状态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废除，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来说是如此困惑的力量也将被消除；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将按照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尺度而实现——显然，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只有那时，分离的个人才能从种种民族障碍和地域障碍中解放出来，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占据获得享受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的创造）之能力的地位。全面的依存关系，这种个人的世界历史性合作的自然形式，将被这种共产主义革命变为对这些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迄今为止

却作为异化于人们的力量而威慑和统治他们。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p. 171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9~90页)

施蒂纳设想，所谓劳动组织者希望把每一个人的全部活动都组织起来，其实，正是他们把应当组织起来的直接生产劳动和非直接生产劳动区别开来了。至于讲到后者，当然，这不是他们的看法，正如施蒂纳所设想的，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而其中任何有拉斐尔的潜能的人都应当能够不受阻碍地得到发展——艺术天才专门集中于一些特殊个人，与此相联系，这种艺术天才在广大群众中受到压抑，都是分工的结果。即使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每个人都是优秀的画家，但是这决不排斥其中每个人也可以成为原创性画家的可能性，因此，“人的”和“唯一者的”劳动的区别在这里就等于十足的胡说。无论如何，伴随着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的来临，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就会消失，艺术家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他因此而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他的活动的称谓表达了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根本没有画家，充其量只有在其他活动中参与绘画的人们。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 KMSW, p. 18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459~460页)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公共目的。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交通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拥有的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
10. 对公共学校的儿童实行免费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

动。把教育同工业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全部生产集中在整个民族的庞大联合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有组织地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权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迫于环境的压力而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因此消灭旧的生产条件，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条件的同时，就从总体上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的存在条件，从而也就废除了它作为一个阶级所拥有的优越性。

为了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及其各阶级和阶级对立，我们将拥有这样一个联合体，在其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KMSW, pp. 237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3~294页)

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像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同一劳动部门的单个人劳动，以及不同种类的劳动，不仅在量上不同，而且在质上也不同。物只在量上不同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它们的质的同一性。因此，从量上计量劳动，其前提是它们的质的同类型性，同一性。

——*Grundrisse* (1857—1858); KMSW, pp. 361 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120页]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末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

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

——*Capital*, vol. II (1869) pp. 318 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4卷，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1871); KMSW, pp. 544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362页)

马克思：Asine〔蠢驴〕！这是民主的胡说，政治的空谈！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即使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也是这样。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

巴枯宁：由全民选举人民代表和“国家统治者”的普选权，和目前意义上的全民是一样的东西，都是幻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民主学派的最新成就，——都是谎言，它掩盖着少数管理者的专制，更危险的是，它好像是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

马克思：在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就会消失，而让位与合作社的真正意志。

巴枯宁：因此结果是：少数特权者管理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

马克思：在哪里说的？

巴枯宁：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

马克思：就像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

巴枯宁：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们将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想管理人民的“野心”。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

马克思：如果巴枯宁先生哪怕是对工人合作工厂的管理者的地位有所了解，他关于统治权的一切狂想就彻底破灭了。他会不得不问自己：在这种工人国家（如果他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的基础上，管理职能能够采取什么形式。

——*Marx on Bakunin* (1875); KMSW, p. 56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699~700页)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

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算。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1875); KMSW, pp. 568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1~23页)

[注释]

[1] 参见《共产党宣言》的章节，KMSW, p. 243。

[2] G. Hegel, *Werke* (Berlin, 1832 ff.) VIII 18.

[3] 黑格尔的影响方面在 S. Avineri 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1968)] 中得到了很好的勾勒。有关批评, 可参见 M. Evans 发表在《政治研究》(*Political Studies*, 1970) 上的文章。

[4] 参见 F. Manuel 的《圣西门的世界》(*The World of Henri Saint-Simon*, Cambridge, 1956)。

[5] KMSW, pp. 237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294页)

[6] Cf. KMSW, pp. 30ff.

[7] KMSW, p. 363. (此处所注出处有误, 此处据引文译出)

[8] KMSW, p. 5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7卷, 355页)

[9] KMSW, p. 2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294页)

[10] *The Holy family*, p. 57. (中译本中没有这句话)

[11] KMSW, p. 28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1卷, 373页)

[12] KMSW, p. 5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9卷, 23页)

[13] KMSW, p. 5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7卷, 359页)

[14] KMSW, p. 56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版, 第3卷, 314页)

[15] 特别参见《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部分。

[16] *The German Ideology*, pp. 282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3卷, 287页)

[17] KMSW, p. 54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7卷, 362页)

[18] MESW I 490. (此句出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而不是正文中所说的《法兰西内战》,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17卷, 8页)

[19] *Capital*, I 1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 第23卷, 19页)

参考文献

R. Adamiak, 'The "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 A Re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1970).

R. Berki, *Insight and Vision: The Problem of Communism in Marx's Thought* (London, 1983).

S. Bloom, 'The "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46).

W. Booth, 'Gone Fishing: Making sense of Marx's Concept of Communism', *Political Theory*, vol. 17 (May 1989).

A. Buchanan, *Marx and Justice: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 (Totowa, 1982), pp. 169ff.

G. Cohen, 'Self-ownership, communism and equality', *Supplementary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vol. 64 (1990).

H. Draper, 'The Death of the State in Marx and Engels', *Socialist Register* (1970).

R. Dunayevskaya,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2nd ed. (Illinois, 1991).

I. Fetscher, 'Marx, Engels and Future Society', *Survey* (1961).

M. Foster, 'Marx on the Communist State: A Partial Eclipse of Political Realit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4 (Winter 1980).

K. Graham, 'Self-ownership, communism and equality', *Supplementary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vol. 64 (1990).

A. Harris, 'Utopian Elements in Marx's Thought', *Ethics* (Jan 1950).

D. MacGregor, *The Communist Ideal in Hegel and Marx* (Toronto, 1984).

H. Mayer, 'Marx on Bakunin: A Neglected Text', *Cahiers de l'ISEA* (1959).

D. McLellan, 'Marx's View of the Unalienated Society', *Review of Politics* (1969).

R. Nordahl, 'Marx and Utopia: A Critique of the "Orthodox" View',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0 (December 1987).

B. Ollman, 'Marx's Vision of Communism: A Reconstruction', *Critique*, vol. 8. (1977).

P. van Parijs, *Marxism Recycled* (Cambridge, 1993) Pt. 4.

J. Sanders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London, 1969). Ch. 6.

A. Walker, *Marx, His Theory and Its Context* (London, 1978) Chs 15 and 16.

A. Yassour, 'Communism and Utopia: Marx, Engels and Fourier',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vol. 26 (October 1983).

结 论



马克思的遗产

据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最著名的格言之一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他是正确的。确实，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是恩格斯（和俄国革命者）。这一过程受到了这一事实的鼓励，即马克思在其生活的时代发表的东西相对较少。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 13 年，他保留了马克思的档案，编辑了马克思的卷帙浩繁的手稿。作为一名天才的通俗化者（在该词的最恰当的含义上说），恩格斯通过系统整理和澄清他的已故朋友的密集的、有时是含混的文本，给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打上了自己的印记。这种澄清之所以受到广泛欢迎，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 19 世纪 90 年代变成了一种群众运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销售得比马克思的任何著作都要多。对马克思手稿的零星的、常常是带有政治动机的出版，也进一步阻碍了他的遗产。《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已使对马克思的解释革命化，但是前者只是在 1932 年才出版，后者只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才变得便于利用。

随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的胜利，马克思遗产的政治足球很大程度上为其苏联的自称捍卫者所拥有。对于列宁是否是马克思的真正追随者，现在有不少争论。^[2]但是，有两件事情很清楚：首先，列宁给他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先锋队政党和帝国主义两种学说。正是这两种学说使马克思主义变成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在很大程度上对它在俄国的成功以及后来诉诸第三世界负有责任。但是，这两种学说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都只有最脆弱的基础。其次，按照马克思的心境，他是类似于以赛亚意义上的预言家，但他绝不是先知，除了预期世界小小角落中的革命的习惯，特别是在他的早

期著作中，他并不热心于开出“未来饮食店的良方”。一旦掌握政权，当列宁和他的同伴们发现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什么指导时，实际上不得不像他们进行的那样去创造它。

因此，无论在冷战中马克思与苏联政策的同一性如何受到双方欢迎，但有各种理由让人相信，对马克思来说，苏联的瓦解既不令人惊讶，也不是沮丧的来源。马克思认为，俄国的一切革命要想成功，关键依赖于推翻西方的资本主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观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厄运。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站在资本主义的肩膀上而建立的，如果你不经历那种特殊的炼狱，你就不能达到共产主义。所以，东欧和苏联的资本主义的重建，只不过是似乎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议程所呼唤的东西。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阅读，1989年底的事件实际上是让历史回到它的轨道，即曾经被马克思本人所勾勒的原初的轨道。

诚然，有人会争辩，马克思的观念现在更多是与俄国的当代公民相关，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从属于苏联的统治。

因此，苏联的瓦解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清马克思本人。伴随这种瓦解的有三种重要学说：第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在形而上学和哲学的意义上提供了对世界的总解释：各种规律支配着事物中从量变到质变的一切，直至下一次革命的日期。这种建立在对世界的粗俗的唯物主义解释之上的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从未受到过最有思想的人们的认真对待。但是，无论如何，它却是某种受到广泛宣传并在一定程度上大约为成千上百万人民所接受的东西，就像那些极其简单的宗教版本曾经有过的情形。第二是先锋队政党的学说——一个党可以假定某些观念并将它们付诸行动，这些观念建立在一些并不源自工人阶级本身的理论之上，一个党可以有各种计划和政策。这个党是一种先锋队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即它走在那些尚意识不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的工人的前面，并且为了工人的未来利益而行动。第三是这一范畴，即一种命令经济、一种高度集中化和高度计划化的经济，至少在目前发展的水平上能够提供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解答。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观念没有一个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第一个观念应该归于恩格斯，第二个观念应该归于列宁，第三个观念应该归于斯大林。

在马克思本人的观念中，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参见本书第二部分第二章）一直有着持久影响。当然，在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中也存在各种难题：它缺乏预见能力；对生产力的增长抱有狂热，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环境问题相对缺乏敏感性；它比较忽视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如民族主义或

宗教。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参见第二部分第六章），无论如何强调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经济剥削，它没能关注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然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力量确实在于它强调物质力量、强调经济因素，在于马克思坚持认为，如果你想以各种最可能令人满意的方式变革社会，那么你就不得不在分配社会的物质资源的意义上说明经济因素。任何简单地依赖于道德词句或法律或者只是依赖于政治权利的扩大的变革，似乎都没有认真考虑这一问题的基础：社会中的大量个人缺乏经济权力，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出原子化和混乱状态。这一强调对理解国家的运行（参见第二部分第八章）和这种运行合法化的方式（参见第二部分第四章），都是基本的。马克思在西方的 20 世纪的追随者在后两个领域繁荣起来，这绝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的丰富概念（参见第二部分第一章）和他关于共产主义未来的观点（参见第二部分第十章），无论多么乌托邦，都代表了一种衡量当代社会的批判尺度。无疑，马克思最脆弱的地方是向我们表明了一种到达那里的方式，因为他的革命期望（参见第二部分第九章）到目前为止已证明是幻想。由于在他达到群众政党之前一直在写作，马克思关于领袖、政党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参见第二部分第七章）是粗略的。任何人——从列宁主义者设想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先锋队政党领导工人，到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政治权力应该直接归属于工人大会——都只能无须担心辩驳地主张，他们都遵从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的最著名的格言可能是镌刻在他的墓碑上的格言：“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的观念确实被用来改变历史——但并不总是用他所设想的方式。但是，在当代社会科学中，他对历史的解释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参照点。如果没有对社会的合适解释，我们如何能够希望改变它呢？

[注释]

[1] Engels to Bernstein, K. Marx and F. Engels, *werke* (Berlin, 1967) vol. 35, p. 3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5 卷，38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 See N.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Macmillan, 1977) 2 vols.